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尚全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副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曾培炎 (005)

“香港中美论坛”专题

罗马诺·普罗迪 福田康夫 卡洛斯·古铁雷斯

卡拉·希尔斯 董建华等 (008)

· 国际经济 ·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与对策

陈炳才 (027)

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变局和亚洲经贸合作

张燕生 逯新红 刘向东 (043)

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构效应分析

倪红福 范子杰 (056)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政策框架、政府职能与启示

尹振涛 范云朋 费 洋 (074)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及其应对策略

于 畅 邓 洲 (089)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大趋势与新变化 马盈盈 崔晓敏（102）

中等强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重点对象 丁 工（114）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CONTENTS

Abandon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Ideological Prejudice to Correctly Treat and Handle China-U. S. Relations	<i>Zeng Peiyan</i> (005)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ial Security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s Rise	<i>Chen Bingcai</i> (027)
Global Changes and Asi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Zhang Yansheng, Lu Xinhong, Liu Xiangdong</i> (043)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China-U. S. Trade Frictions	<i>Ni Hongfu, Fan Zijie</i> (056)
Korea’ s Regulatory Sandbox Mechanism: Policy Framework,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Enlightenments	<i>Yin Zhentao, Fan Yunpeng, Fei Yang</i> (074)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ountermeasures Driven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Yu Chang, Deng Zhou</i> (089)
Th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General Trends and New Changes	<i>Ma Yingying, Cui Xiaomin</i> (102)
Middle Powers Are the Key Targets for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Ding Gong</i> (114)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曾培炎

摘要：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完全错误的。首先，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其二，时代变化颠覆了“修昔底德陷阱”立论的基础；其三，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不是挑战者和破坏者；其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希望通过重启和完善中美多层次交流机制积累互信，通过重塑中美经贸关系夯实互信，通过全球治理合作深化互信，实现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关键词：冷战思维 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 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近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存在战略疑虑和焦虑，认为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必然成为一种“威胁”，两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以这种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首先，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任何制度和模式的形成，都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条件。中美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由两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也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等理念深深融入在民族血脉之中。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过侵略和压迫，历经探索实践，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

^{*} 本文为作者在 2021 年 1 月 26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香港中美论坛——当前的中美关系：方向与路径”上的讲话。

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历来主张求同存异，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中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而是丰富多彩、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完全可以做到和平共存、共同进步。

其二，时代变化颠覆了“修昔底德陷阱”立论的基础。“修昔底德陷阱”论断适用的背景，是在当时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人类社会自然经济占据主流，国家之间通过战争或者殖民掠夺土地、人口、粮食等资源，获得利益甚至建立霸权。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给人类留下深重灾难和沉痛教训，追求和平与发展、反对战争和霸权是民心所向。随着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品、技术、人力、资本、数据等要素实现了大规模跨境流动，形成了全球要素的大市场、大循环和大平衡，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和彼此依赖。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取代战争，成为国家间利益平衡的主要方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存在，更是使世界形成“战略武器之威慑”，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玩火将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毁灭性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为应对共同挑战，推动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这顺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特征和客观规律。中美应跳出这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零和思维模式，共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其三，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不是挑战者和破坏者。二战后确立的现行国际秩序，使世界总体维持了安宁、进步、繁荣，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也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的时期，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获益最大的时期。我们没有理由去推翻和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当然，我们也看到，现行国际秩序存在一些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地方，但中国主张的是对其改革和完善，绝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就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下，为更多国家共同发展进行的探索和尝试。

其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是美国的 1/6。我们用有限的资源使 14 亿人口摆脱贫困，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进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而非威胁。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同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同样，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9.4%，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2020 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连续 1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从中美来看，两国建交 40 多年来，双边贸易增长 250 多倍，目前美国有 260 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创造；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到近 2400 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 90% 以上实现盈利。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后，产能和销量高速扩张，2021 年产量有望突破 50 万

辆，占其全球产量的 50%。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预计未来十年进口商品总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一个 14 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既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世界发展的机遇所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拜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希望美方能够以此为契机，调试思维和行为模式，同中方相向而行，增进战略互信，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一是通过重启和完善中美多层次交流机制积累互信。中美双方应抓紧恢复两国高层领导战略对话，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利用此前建立的各类对话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建设性对话，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把对话磋商作为解决问题和弥合分歧的基本渠道。国家友好，根在人民。美方应取消在中美人文交流领域“筑墙”、设限的做法，为两国各领域交往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双方应积极开展民间机构、企业、智库的“二轨”对话，以及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二是通过重塑中美经贸关系夯实互信。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近几年遭受重创，这损害了中国和美国利益，也损害了全球经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合作共赢。2020 年 11 月，中国与其他 14 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欧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充分表明中国推行结构性改革和制度性开放的决心。中美应秉持积极合作的态度，在全面客观评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经贸谈判，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相互加征的高额关税，取消不合理投资限制，抓紧重启双边 BIT 谈判，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三是通过全球治理合作深化互信。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传统的全球公共产品体系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建设更为公平公正的规则制度刻不容缓。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疫情防控、稳定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粮食安全、网络安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既肩负着共同责任，又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应加强协调，构建合作框架，与各国一起携手解决好紧迫的全球问题和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50 年前，基辛格博士访华，打破坚冰，促成了中美建交，给两国都带来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也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们又处在这样一个关键十字路口，要有同样担当的勇气和远见的智慧，共同努力，开辟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前行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李 蕊

“香港中美论坛”专题

编者按：2021 年 1 月 26—28 日，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联合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了“香港中美论坛——当前的中美关系：方向与路径”。本期本刊专论整理了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等 12 位嘉宾，在论坛上围绕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前景、贸易与经济、科技与全球挑战、人文交流等主题的发言，特别刊发。

中美欧三个经济体应进行平等对话

罗马诺·普罗迪

笔者之前曾分别在中美两国的大学任过教授，因此对中美关系有一些体会。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笔者不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太大的变化。目前美国政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会对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双边对话，双方都需要强化交流与沟通。多年以来，欧洲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占据欧洲的榜首。但是 2020 年，欧洲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欧美之间的贸易量，这在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2020 年，欧盟和中国达成了非常重要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是一个互惠关系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也印证了中欧之间贸易关系的重要变化。美方对这个协定的签定有一些激烈的反应。当然这个协议还需要欧洲议会最终通过，欧洲议会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也包括从政治上进一步审视这个协定。但这是中欧双方关系向前推进的很好的机遇。

当今世界的竞争格局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疫情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使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归到正常的贸易状态。但笔者相信，

全球化还会继续推进。各个经济体会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恢复状态，中美欧三个经济体需要重塑全球产业链。在未来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包括同技术有关的摩擦，一些新的竞争形态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摩擦。因此，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进行平等的对话，需要新的进一步的讨论。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未来的环境问题。《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现在欧洲、中国和美国共同在环保领域开展合作，这是全新的合作视角。环保问题有可能可以促成中美欧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所以，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有担忧，也有挑战，但是笔者更相信会有合作，首先可以在环保领域开展合作，这也会带来全球的合作。未来可能只顾及双边关系的时期也会结束，世界主要的大国都会在国际合作方面发力。

（作者为意大利前总理）

中美两国应发挥领导作用

福田康夫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的背景之下，美国从特朗普政权平稳过渡到了拜登政权。拜登新总统任职之后，面临着内忧外患，无论是国内与国外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协调和稳定，以避免分裂。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首先，美国必须要解决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问题。截至 2021 年 1 月底，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累计超过了 2500 万人，死亡人数在 40 万人以上，疫情肆虐。其次，各国为应对疫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会对今后的经济运行产生困扰。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过程中，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呈现负增长的态势，生产和消费都逐渐萎缩，世界经济在逐渐萎缩。美国目前可能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帮助其他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依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应当肩负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及金融领域其作用尤为突出。再次，外交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新总统拜登今后与中国习近平主席将如何构建中美两国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十分显著，根据经济研究机构的估算，预计在 2027 年中国的 GDP 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届时中美两国的 GDP 总额将超过全世界的 40%。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

美两国肩负的责任也是巨大的。作为稳定世界局势不可或缺的国家，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中美两国存在的贸易摩擦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应该通过某种途径，采取某种方式解决。此外，还有安保等一系列问题也急需解决，两国需要经谈判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中美两个大国，目前可以说占据着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不仅是对中美两个国家，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两国需要在不同阶段向世界呼吁，并且能发挥各自的领导作用。

（作者为日本前首相）

中美不能继续持对抗心态

卡洛斯·古铁雷斯

第一，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常态，应该是个例外。过去的四年不应被视作是未来前进道路的一个范式，也没办法来塑造中美之间的关系和未来。笔者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战略的对手，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笔者也不相信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新一届拜登政府有哪些新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中美脱钩是不可能实施的战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为整个世界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是没办法脱钩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一件好事，中国推动了世界经济贸易的繁荣，应该欢迎中国的崛起。

第二，必须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避免技术上的冷战。中美两个经济体在技术上也是没法脱钩的。技术上的脱钩会让中国成为孤岛，会让中国割裂；也会让美国成为孤岛，让美国割裂。这对任何一方来讲都是不利的。笔者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拥有技术霸权和持久的创新力，但不要以中国的技术进步受阻为代价；同时也希望中国的技术进步不要以美国为代价。我们可以各自管理好自己国家的进步，而不用成为对方国家的敌人。

第三，中美关系不应该只是交易型的关系。我们的贸易现在看上去就是一种交易型的关系。中美关系不能只安于交易型的关系，我们可以给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但前提是双方要有一个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发展目标，并成为工作指引。需要认同的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才能增长，而中国的增长，中国为人民造福也需要美国的帮助，这是

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的体现。

第四，不应把商贸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挂钩，也不能同地缘政治问题挂钩。商贸投资有自己的轨道，不应该把它同地缘政治、同国家安全问题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的话，就会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第五，需要重启对话机制。之前中美双方有一些很好的已经形成惯例的对话、论坛、会议等形式，比如中美商贸联委会、发展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在这些场合我们讨论问题，开展对话，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立场，去倾听，去讨论。这样的一些对话机制我们不能丢掉，必须要重启。我们需要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的友谊，我们互相之间有如此多的内容需要讨论。比如，如何给惩罚性的关税降温。关税问题可能需要逐渐削减，可能需要先达成一个意向，然后再逐步退出之前的惩罚性关税的协议。在我们双边的议程里应该把这项事务放在首位。

第六，如果中美继续按照这种对抗的心态走下去，那将导致双方俱损，也会让世界受损。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全球灾难。相信全球的人民都在等待所谓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笔者相信，当到达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将会有有一个增长和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首先需要有一个坚实互信的中美关系作为基础。笔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关系中添砖加瓦。

（作者为美国商务部前部长）

中美双方必须增进合作领域

卡拉·希尔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它对经济造成的损害影响到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四年是非常动荡、非常不确定的。2020年尤其是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特朗普总统采取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关系迅速恶化。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先生是个多边主义者，崇尚自由的市场。所以他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同特朗普可能不太一样，笔者认为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新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

呢？拜登总统谈到他对中国的政策是方方面面的，可以更多地依赖于双方的合作，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有竞争。谈到与中国的合作笔者认为拜登总统可能会先关注有共同目标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世界防疫与卫生，尤其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两国政府能够有建设性的合作。他谈到在这些核心领域，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解决的。拜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疫苗组织。他也看到了美国的弱点，说美国要先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要首先提升和强化自身的经济水平及能力。他提出要增加研发的投入，提升教育和基建，尤其提出要重建高速公路、能源电网以及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笔者认为拜登会把钢铁和铝的关税，尤其欧盟的关税取消，因为会影响到美国的工人、农民和企业的利益。另外，他会很快取消对中国的加征关税。当然，迫于国内各方的压力，他也不愿意显示出他对中国会“手软”。

笔者认为不要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因为这既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受益，也会使得中美双方建立一种联系，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更加严峻的挑战。

2021 年是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的 42 周年，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合作使得双方有诸多受益。因此双方必须要增进合作领域，减少摩擦领域。老布什总统曾说过，他对世界的梦想，就是中美这两个巨人能够继续合作，建立一种全面的合作关系和友谊，为各国人民带来安全和繁荣。笔者希望中美能够长久合作，实现老布什总统的梦想。

（作者为美国前贸易代表）

中美合作 未来可期

董建华

我们均认同世界需要恢复，不仅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还要从谎言、非理性和猜疑中恢复。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呼吁美国人回归真理、尊重包容、相互理解以及求同存异。这是非常正确的呼吁，不仅对美国，对世界也适用。现在是翻开新一页的时候，向过去几年的负面事物道别，并重启相互间的合作。我们面

临诸多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警钟，警醒人类可能会遭遇不可预料的自然灾难。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对此都未做好准备。全球经济韧性不足，民众并未获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应对下一次疫情来袭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笔者 12 年前创建中美交流基金会，旨在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合作。中美两国主要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一直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在教育、体育、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也开展了重要合作。最值得称道的是，两国领导层曾三次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第一次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中美两国共同刺激并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乔治·布什总统致电胡锦涛主席。美国提出 8000 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并请中国尽力提供相应计划，最终中国提出 6000 亿美元的方案，两国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扭转危机的效果。第二次是 2014 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时，中美共同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疗人员，并在物流和安保方面开展合作，疫情在半年内就得到了控制。第三次是 2016 年面临气候变化时，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携手，两国共同的领导能力促使 170 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些是人类共同应对挑战的范例。

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精神在过去几年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怨恨和拒绝，且多数来自于美国。笔者认为，之所以有这些消极情绪，是因为缺乏对中国的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引发了疑虑，随之而来的是不信任。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均有自身的特质和历史，在地理文化、资源禀赋、发展路径和人力资本方面都不同。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具备所有的能力。借助各国的比较优势，相互借鉴、互取其长，国家之间可以实现共赢。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较成熟和一体化的制造业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勤劳、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满怀希望的人民，中国愿意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和空间。

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中国继续推动实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标的进程中，将坚持改革开放。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形成了现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系。很多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政府有着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忧虑和排斥。然而，如果我们问中国人，大多数人都认为现有的中国体系对国家有益。哈佛大学阿什中心近期的研究表明，中国超过 90% 的人赞同政府的领导方向，并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这一比例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很难辩称超过 10 亿人的想法是错误的。

还需要强调一点，中国没有霸权野心。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也要维护自

身的利益。但我们认为，需要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和平共处。我们也多次强调，即使在中国朝代的鼎盛时期，汉族人从未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也理解，世界需要确信所有国家都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国秉持同样的理念，并将致力于保护和完善现有基于规则的体系。习近平主席说得非常好，中国承诺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最为重要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可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拜登总统公布了施政大纲的四项重点工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种族不平等。中美至少可以在前三个问题上开展合作。两国应携手加快发展，为世界人民生产并分发安全疫苗，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有助于解决失业以及企业和家庭的困境问题。应让专家和机构开展对话，让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应为全球热点问题和冲突，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应找到保护我们星球的方式，使之免受人类的破坏。

2021 年 1 月 25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敦促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同时他也警示，历史已经表明单边主义必然失败。习近平主席呼吁，全球携起手来，让多边主义照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行之路。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可以从现在开始。

（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美应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 从遏制竞争走向共赢

解振华

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在中美关系当中的作用会日益凸显。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就职当天就宣布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我们期待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愿意与美国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并希望这一领域的合作对改善中美关系有所作为。为此，提出如下四点思考。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最紧迫、最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两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40%。两国理应携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合作，战胜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与各国一道承担起保护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疫情期间，笔者与美国的一些机构及很多同行开展了十几场线上对话，一直保持沟通与交流，探讨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参加线上国际会议，笔者也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对此期待很高。

第二，中美两国已具备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基础。2020 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还宣布了更新后的 2030 年自主贡献目标。目前中国政府各级部门正将气候目标纳入“十四五”规划，乃至 2035 年中期发展规划。拜登总统已经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颁布了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很快将提出 2030 年自主贡献目标，以及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与政策措施。气候变化已经被列为美国四大优先领域之一。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路径、政策方面比较接近，也都致力于细化相应的措施与行动，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已经在相向而行，这是重启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三，中美应该围绕实现各自碳中和的场景目标、路径和自主贡献目标的政策，开展务实合作。基于最近与美国一些同行的讨论，笔者认为应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开展政策对话。应恢复过去坚持多年的中美气候变化政策对话，既包括政府间的对话，也包括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一轨对话，还包括智库之间的二轨对话。万事开头难，先谈起来，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和互信，在此基础上交流最佳实践，取长补短，推动务实合作。同时要继续开展双方地方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恢复、建立结队伙伴，开展项目合作。虽然两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在过去四年中断了，但是两国民间的对话合作从未中断。应通过民间交流合作，夯实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社会基础，促进双边合作。其二是合作内容应当务实广泛。经两国专家层面探讨，可以围绕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开展合作。笔者与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先生曾组织开展在能源领域提高能效的合作，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智能电网和储能、碳普及利用和封存、绿色低碳、智慧交通、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绿色节能建筑、低碳基础设施、低碳智慧城市；也建立了中美低碳城市联盟，开展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发展气候友好型农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绿色金融和碳市场等。两国在这些领域都有合作基础。2020 年 11 月，美国的一些同事曾与笔者讨论，建议双方在零碳电力、零碳交通、零排放汽车、零排放建筑和零废物生产等优先领域开展合作。由此可见，中美有开展合作的共同内容，

这是两国合作的客观需求。

第四，实现碳中和可以作为双方克服障碍、打破坚冰的突破口。当前受中美双边关系整体氛围和美国国内政治影响，重启双边合作有困难，但我们要沉住气，理性处理，总能够找到合作契合点和很好的时机。

现在美国一些人士对开展中美气候合作还持有疑虑，甚至还有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对此我们认为，战胜疫情、绿色复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关系子孙后代的福祉，中美应当共同承担起对全球未来高度负责任的大国担当，都不应该将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政治化。对有分歧的问题，应当继承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的共识，彼此相互交底，尊重对方核心关切，不公开指责对方，理性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多边问题上，应统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体现最大包容性。2021 年对两国最大的考验是能否重启合作，应确保 2021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以及联合国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以此来证明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任何一方寻求零和博弈就意味着失败，只有合作共赢才有希望，才能成功。

2020 年 11 月，笔者同新就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的克里先生以及加州前州长布朗先生开展跨太平洋气候伙伴对话，我们都是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和巴黎气候协定谈判成功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我们都十分怀念曾经的合作。笔者与克里特使在对话中均表示，愿意努力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并以此改善中美关系，进而推动多边合作进程。我们由衷希望中美借鉴以往合作经验，恢复气候变化合作。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两国开展沟通对话，增进互信、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在气候变化领域，率先从遏制竞争走向合作共赢。

（作者为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

全球化和中美经贸关系

毕井泉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严重受阻，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低迷态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持续发酵。同时，

我们也看到许多积极的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数字化转型提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更加注重效率和安全的平衡。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可以合作的事情很多。在此就全球化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谈谈看法。

一是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收益。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受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总量、全球贸易和投资金额明显上升，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近 50 年来，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长 3 倍多，人均 GDP 增长 1 倍多，全球贸易额占 GDP 比重由 27% 升至 60%，直接投资净流出从 130 亿美元升至 1 万多亿美元。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 1981 年的 42.3% 下降至 2017 年的 9.2%。全球化使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够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各经济体都在全球分工中不同程度分享贸易、投资、创新所形成的收益，发达经济体从世界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并参与全球产业体系的调整和优化。

二是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美两国的经济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并日益相互依赖。中国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已成长为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领域独占鳌头，拥有美元体系的金融优势，引领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01—2019 年，中国 GDP 增长了近 4 倍，对外贸易额增长了 3 倍，年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 97%。同期，美国 GDP 增长 40%，对外贸易额增长 90%，年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 40%。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两国经济关系深化的受益者。

三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摩擦。中美之间的文明传统和历史传承存在明显差异，两国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彼此照顾对方关切，互谅互让，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 20 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中美两国间巨大的经贸往来，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四是努力促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过去四年，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双方关系跌入低谷。大家都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能无止境地任其发展下去，要坐下来商量讨论解决的办法。2021 年 1 月，美国已顺利实现新老政府交替，这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契机。建议尽快恢复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和交往，恢复两国政府多领域、多层面的对话，研究取消两国互相加征的关税，恢复正常的人员贸易往来，研究取消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不合理限制，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都是造福于两国人民的重要举措，对应对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是加强中美在多边机制的合作。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及多边治理中承担重大的责任。拜登总统已经宣布重回巴黎协定、重回世界卫生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希望

美国发挥重要作用，当前较为迫切的是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开展合作，在世贸组织改革议题上协调立场，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重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美还需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沟通和协调，加强在贸易、国际金融、数字经济、公共卫生、全球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六是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任务。在 2021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并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已经与有关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欧盟达成全面投资协定，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将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需要，更是实现创新型发展的需要。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新冠肺炎疫情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阻力，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不会改变。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未知的风险，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几点看法

张晓强

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深重，新冠肺炎疫情漫延，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拜登总统已经正式就任，大家都很关注美国的政策走向。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就中美关系进行交流，意义重大。在此就贸易与经济问题谈几点看法。

第一，当前世界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织的经贸格局，中美彼此不能分离也不会分离。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不仅没有促使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反而造成两败俱伤，美国消费者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利益损失，中国的企业也受到影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约 5870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

国出口 4520 亿美元，自美国进口 1350 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 3170 亿美元。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流行后，中国对美国防疫物资出口急剧增长。这些数据充分说明贸易战无助于削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关系是割不断的，双方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目前中美在贸易、投资和高技术领域合作遇到很大困难，但基于规则的互利合作还是主流，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近两年来，美国当局对中国企业不断打压，动用政府机器将一大批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强行割裂中美企业供应链合作；收紧投资管制，也加大对中美科技交流合作的限制。这些做法对双方的损害都很大。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2018 年为 391.4 亿美元，2019 年下降至 339.1 亿美元，2020 年 1—11 月为 278 亿美元，同比又下降 10.2%。“损人害己”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美国行政当局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集成电路出口，虽然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困难，但一大批美国半导体公司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而 2020 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达 350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6%；中国生产的集成电路达 2600 亿块，比上年增长 16.2%。欧盟、日本、韩国及中国半导体公司不论从短期数据看，还是着眼长远，反而成了真正的赢家。

此外，就像美国企业希望来华投资一样，中国企业也希望在美国寻求更多投资机遇。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无理限制，使中国对美国投资直线下降。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高峰时的 450 亿美元一路下降至 2019 年的 50 亿美元。2020 年上半年中美双向投资同比下降 16.2% 至 109 亿美元。投资下降虽然有疫情因素影响，但也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密切相关，也影响到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信心和预期。而中国对美国企业来华投资一直秉持开放姿态，2020 年初中国全面实施了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2020 年 7 月施行了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大。比如，特斯拉上海工厂一期产能规模 20 万辆，投产后公司产能大幅度提升，2020 年特斯拉全球产量首次超过 50 万辆。在市场方面，该公司在中国销售 14.7 万辆，占全球销量的近 30%，今后有可能占 40% 以上。又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 2020 年 6 月顺利获批将上海分公司改建为独资人身保险公司，为中国内地首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认为，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高盛公司正在申请将其在华的合资公司变成独资公司。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不久按特朗普行政当局要求，美国纽交所强迫要求 3 家完全合规经营的中国电信公司退市。一方面要求中方进一步扩大对美国企业的市场开放力度；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捏造的理由，无理限制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这种违反平等互利的单边主义做法，完全

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中美企业界对此都表示强烈不满。美国某些人经常讲市场开放、经贸合作要公平、对等，但其做法实际上却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必须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空间。

第三，中美需要共同努力，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善尽大国责任。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扩散后，中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3 月至 12 月末，中国出口主要防疫物资约 630 亿美元，其中出口口罩近 2240 亿只，仅对美国出口即达 400 亿只，每位美国人约 120 只，为全球和美国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并没有竖起高墙，阻碍物资和技术跨境流动。中国相信全球化有利于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正在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力量。2020 年 11 月，中国与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等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12 月与欧盟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这些展示了中国与各方在共同努力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成就。美国广大工商界人士也愿意使双边经贸关系能走上正轨。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在推动全球化中不能开历史倒车。中美企业界克服困难推进合作，必将共同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造福两国人民贡献力量，真正实现合作双赢。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宏观经济层面的关键合作领域

朱民

2021 年给我们带来希望，通过疫苗我们可能会控制住新冠疫情，而且有可能看到全球经济反弹。但不确定性是巨大的，而且复苏是不平衡的，也是温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的宏观政策合作，对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对整个世界，以及对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可以从以下关键领域开始采取行动。

第一，新刺激政策和退出策略的协调。鉴于增长乏力，许多国家政府都考虑在 2021 年进一步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比如，美国拜登总统提出了 1.9 万亿美元的新刺激计划。这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可以理解这种需求，但我们要避免狂轰滥炸，避免未来增长路径

的波动。我们也要避免未来的债务危机，因为主权债务大幅增加，可能在未来引发债务危机。我们需要平衡这两件事。中国和美国如何共同协调未来的刺激计划，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经济复苏不平衡，退出策略会有很大不同，将产生深远的全球影响。笔者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就退出策略进行对话，给世界提供一个政策框架。我们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推出策略的全球协调特别重要，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第二，货币政策协调。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的零利率使得美元资本从美国流向全世界。回想一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能够产生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如果美国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流动性继续宽松，但通货膨胀可能上升，美国可能提前撤出。因此，货币政策协调非常重要。货币政策合作才能保持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维持足够的信贷额度以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避免资本市场出现泡沫。

第三，双方合作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也很重要。我们看到，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世界各国确实在考虑供应链的重新配置问题。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商谈如何稳定全球供应链，以确保强劲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第四，贸易相关问题。2020 年全球贸易疲软，2021 年有望恢复，但笔者认为恢复势头不会太强。美国的关税已经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税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对中美和世界都不利。中美需要重新梳理贸易政策和关税水平及结构，推进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贸易领域，双方可以采取很多行动。从全球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问题上，中美两国要确保它运转正常，这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

第五，双方合作支持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财政刺激差别很大，发达国家平均用了 12%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财政刺激，新兴经济体用了 6% 的 GDP，低收入国家只有 3%。他们之间的 GDP 差距也变得更大了。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种不均衡的差距将继续扩大。特别要提出的是，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他们没有储备货币地位，无法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因此，中美双方合作支持他们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六，笔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包括世界银行。例如支持 IMF 增发新的特别提款权（SDR）用于支持低收入国家和高债务国家的流动性，推进新一轮额度改革，使得 IMF 治理机制更平衡。

我们有很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共同努力，确保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重建更具建设性的中美经贸关系

王一鸣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对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是一个好消息，这也使得当前的对话变得更有意义。尽管就目前而言，美国新政府将优先考虑控制疫情、重振经济、弥合分歧等国内优先事项，难以在短时间内腾出精力修复中美关系，我们也难以期望美国新政府会大幅扭转上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这将受到国内因素的牵制，新政府不会显示出对华政策更加软弱，但新政府上任还是让人们看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

特朗普政府在任期内挑起了中美贸易战，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但特朗普政府想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阻断中国技术进步等，并未如他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贸易战并没有大幅缩减美对华贸易逆差，恰恰相反，贸易逆差反而有所扩大；限制美国技术出口，给中国高科技企业带来冲击，但也损害了美国高科技企业利益。事实表明，贸易战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重建中美经贸关系，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中美关系有合理的定位。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之间不是敌人。中美竞争应该是可控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挑战对方的底线，中美竞争也应该是公平公正、基于规则基础上的竞争。中美竞争并不意味着没有合作空间，而通过沟通对话寻求合作，将有利于使这种竞争更加良性。

当前，中美应从最紧要的事项入手，恢复和重建中美开展合作所必须拥有的信任。第一，共同应对新冠疫情。2014 年，西非出现埃博拉病毒，中美合作派遣医疗队并提供医疗物资，表明在应对疫情上中美是可以合作的。中美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开展合作，包括在全球疫苗分配上加强协调，这对重建信任至关重要。第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015 年中美开展合作，为签署《巴黎气候协定》铺平了道路。拜登总统已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习近平主席已宣布中国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巨大合作空间。第三，推动中美贸易重回正轨。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双方可通过协商，就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提供一个宽限期，同时启动并逐步取消加征的关税。在评估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就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开展新一轮谈判，可与恢复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结合起来。第四，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在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通过政策协调和合作，对全球经济摆脱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中美可以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框架下开展对话和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

总之，与过去四年相比，虽然中美两国间复杂的竞争和博弈仍难以避免，改善经贸关系仍将迂回曲折，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只要双方有意愿共同努力，中美能够重建更为稳定更具建设性的经贸关系，这将造福两国人民。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疫情后扩大中美人文交流、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

邵琪伟

2020 年初，全球范围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使全球旅游业出现断崖式下跌。时至今日，全球旅游业仍然处于寒冬期。2020 年四季度，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预测，2020 年国际旅游业将下降 70%；UNWTO 专家小组预测，国际旅游业最快要到 2021 年第三季度甚至是 2022 年才会逐步复苏反弹。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预测，疫情造成全球 7500 万个旅游工作岗位面临威胁，2020 年国际旅游业产值预计将损失 2.1 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 4900 万名旅游从业者可能失业，行业产值预计损失近 8000 亿美元；美国旅游协会指出，与旅游相关的美国失业人口已超过 800 万人，行业产值已减少 5190 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0 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国内旅游收入下降将超过 60%。据相关机构统计，中国至少有超过 70% 的旅游企业和从业者的旅游收入不及往年同期的 20%；2020 年中国总计有超过 5000 家旅行社及相关企业注销。很多中小旅游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转型、停摆甚至破产，大量旅游及相关从业人员

面临失业、隐形失业或再就业困境。特别是进入冬季以来，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旅游及相关行业损失将进一步增加，且复苏的具体时日目前尚不明朗。

中美两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特别是疫情后全球旅游市场的恢复和发展，中美两国都应承担重要责任、发挥重要作用。这对当今世界发展背景下，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自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增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乃至对全球经济的恢复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中美关系，需要在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研判。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新一轮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其中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恰恰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形成重要共识，认为旅游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历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人民之间交流、交往和发展友谊、增强亲近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实践证明，旅游合作是中美双方共识最多、矛盾最少、投入最低、效果最好的领域，在为中美友好发展奠定民意基础的同时，更可为促进两国经济合作注入强劲动力，有利于巩固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1 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旅游交流与合作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时期。2008 年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正式启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016 年中美人员往来超过 500 万人次，其中美国访华 224.7 万人次，中国访美 306.8 万人次，平均每天约 1.7 万人往来于中美之间，每 17 分钟就起降一个航班。此后，中美双方持续保持高水平、高频率人员互动往来。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中美先后建立了若干工作机制，包括中美商贸联委会旅游工作组、中美省州（31+50）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中美旅游合作论坛、中美互办旅游年活动等等。据美方统计，在两国旅游合作顺畅时期，中国游客在美国人均消费高达 6000 美元，每 65 个中国游客就可为美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赴美游客规模不断下滑。相关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美方签证政策等限制影响，中国公民赴美留学、旅游意愿也持续下降。

为更好发挥旅游合作在中美关系新一轮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议：一是坚持巩固并扩大中美人文交流不动摇。双方应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拓宽地方、智库、媒体、青年、旅游等交流渠道，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众基础。二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根据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分阶段开展人员交流和旅游合作。近期可以通过线上交流、在线视频会议、网上或新媒体推广等方式开展研究讨论和活动，充分发挥两国旅游主管部门、旅游协会、旅游企业和智库作用，做好政策储备、工作准备、

措施筹备等工作。一旦疫情进入尾声，各方面条件许可，就可以迅速扩大人员流动，启动旅游交流活动。其中团队旅游可以率先开展，因为团队旅游相对易控制、易管理。在这方面，中美双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三是适时恢复或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可以适时启动中美旅游高层对话等原有机制，推动两国旅游主管部门直接对话，回应两国旅游及相关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双方还可以在二十国集团（G20）旅游部长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旅游工作组会议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就双方关心的话题积极开展探讨。此外，双方还可根据新形势新变化，适时建立新的旅游交流合作机制，推动双方更好开展务实合作。四是推动开展全产业链合作。中美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门类广，产业链条长，科技水平高，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空间。双方可从旅游产业化角度入手，推动全产业链合作，包括人员交流、旅游金融合作、旅游装备制造合作及旅游智能化、数字化合作，进一步开放旅游投资，共同投资建设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景点以及相关旅游设施，开展旅游教育机构合作等。建议两国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继续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支持、扶持。

只要双方坚持坦诚相待、互利共赢，我们相信中美两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作者为原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

2021 是中美经贸关系修复之年

陈文玲

第一，2021 年相对于 2020 年来说是一个修复之年。需要修复疫情带来的创伤，修复世界经济大衰退带来的危机，修复中美关系恶化带来的困难，也修复世界秩序。因此，2021 年特别重要，能不能战胜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困难，实现修复、恢复，走向正常的和平发展与建设，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第二，在中美关系中，中美经贸关系是修复的重点。中美经贸关系修复的目标，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 40 多年的发展进程是双方的客观需求，而不是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1979 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才 25 亿美元，经过 40

多年发展，2017 年达到 5837 亿美元；2018 年是一个高峰，6335 亿美元；2019 年因为中美贸易战，下降了 15.3%，当然这一年的下降是人为的结果；2020 年，在疫情中，反而上升了 8.8%。这说明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市场有刚性的需求，不是中国把生产的商品硬推给了美国，而是美国市场的内在需求，美国政客出台了各种阻碍贸易发展的政策，发起了举世罕见的贸易战，但是挡不住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客观需求。

其次，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客观规律。因为国际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使全球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四轮大的转移，要素重组随时在进行中。因此，国际分工和交易、贸易形态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二战时期，美国的制造业曾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70%，当前只占 11%，全球有 102 个国家对美国出口，也就是与美国有贸易逆差。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是贸易顺差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和黄金不再挂钩，美国逐渐成为逆差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分歧点，或者称为美国与全球贸易历史的拐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国，一是由于制造业向外转移，本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本国市场需求；二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成为可以印制，购买其他国家商品的纸币。因此，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国，其中有内在的客观规律。

再次，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客观趋势。分析现在的中美贸易结构，中间品占 2/3 以上。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美国 2018 年之后提出对中国 5500 亿美元贸易额加征的关税中，特别是前面的 500 亿美元、2000 亿美元、3000 亿美元中的 1200 亿美元，其中 2/3 是中间品。这说明中美两国的产业链已经高度链接、高度联系、相互支撑，它确实是切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另一个趋势是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减税化、低税率（甚至零税率），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还有，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贸易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特别应指出的是，贸易的多边主义，基于贸易规则的平等对等经贸关系是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中美之间的关系超过双边的意义，具有全球的意义，中美经贸关系同样具有全球意义。

第三，拜登执政以后，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回到多边贸易。美国应该在多边贸易发挥正确作用，发挥作用决不应该是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而是与中国合作，联合全世界朋友重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解决当前处理国际贸易问题不讲规则的矛盾，解决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世界规则和世界利益之上，坚决反对和对冲这种霸权主义及霸凌主义行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责任编辑：谷 岳、李 蕊、郭 霞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 安全问题与对策

陈炳才

摘要：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本账户开放的安全问题、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的安全问题、国际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问题。导致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外部原因是本币不具备储备货币的国际地位，需要从外部获得储备货币，必然缺乏安全；人民币汇率的信用依靠美元等储备货币背书，中国经济崛起也曾经依赖美元顺差；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账户对资金、资产交易、跨境支付结算等，实施行政处罚、限制、冻结等制裁，乃至剔除出账户系统。内部原因是中国经济崛起，美国要打压和制裁；金融开放如果在汇率制度选择、外汇管制和管控上处理不当，允许储备货币资金完全自由进出而无约束，则必然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解决涉外金融安全问题应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货币互换和多元化投资等方式保障外汇（储备）资产安全；二是通过提倡主权货币计价、支付、结算、融资，以及开展相关制度设计等方式建设好交易和支付结算系统；三是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四是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工作。

关键词：涉外金融安全 外汇储备资产 资本账户开放 国际支付结算体系 主权货币
结算

作者简介：陈炳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巡视员、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

涉外金融安全是纸币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主要是非储备货币国家才会出现，储备货币国家一般不会出现（储备货币国家之间可能也有涉外金融安全，但不同于非储备

货币国家)。它主要表现为：一是债务安全，因为债务规模巨大，超越本国的偿还能力和创汇偿还能力而出现债务违约，并导致汇率大幅度贬值，从而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或外汇资产安全，外汇资产经营、投资和投机失败带来巨大损失，资产被冻结、挪用，或者账户资金被扣留不能动用；三是汇率安全，主要是汇率制度选择不当，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保障汇率稳定，导致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四是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使用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的国家，一旦与美国因各种原因出现争执、纠纷、战争或不服从美国的意愿和要求，乃至相互成为敌人，个人、企业、中央银行甚至国家有可能被禁止使用该支付体系甚至被剔除出这个系统，或者相关交易方被要求关闭账户、冻结资金；五是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危机，包括境外上市企业被勒令退出美国市场，或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投机股票、债券、楼市市场等，控制本国的金融业，谋取巨大利益，导致本国股市、汇市、楼市乃至金融体系崩溃。

上述安全问题本质上都是外币、外汇资产的风险或安全。本文探讨的涉外金融安全，主要是指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制度，对中国涉外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支付、结算（包括资本账户开放或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禁止、限制，以及冻结、挪用涉外资产，由此所带来的冲击、影响乃至危机问题。

一、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演绎

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大体从 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逐渐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等安全问题。1995 年巴林银行危机使得国内对涉外金融安全更加关注，国内对海外证券资本投资实行严格管制，未经审批，不得从事境外期货、证券投资交易。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香港汇率保卫战，是中国保卫国家金融安全的一次实战，当时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加强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那时提出开放与国际接轨，但要防范金融危机，建立起防范危机的预警体系，建立金融安全的决策系统和操作系统。^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国内开始重视并研究金融开放对金融机构和体系安全的影响，当时最典型的一种看法认为，花旗银行一年的利润可以把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买下来，可见对金融尤其是银行业的安全非常担心。2003 年为应对中国台湾地区选举中闹独立，存在大陆可能对中国台湾地区动用武力，美国可能加入台海战争的猜想。国内开始考虑美国是否会冻结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①孙健：《金融危机与国家安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9 页。

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暴发时，美国冻结了这些国家在美国的资产，中国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发生是与战争相连的，如果没有战争，原则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017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断扩大与中国贸易战的规模，并从贸易领域延伸到科技、人才、金融领域，而且开始使用美元账户系统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账户及交易进行禁止、限制乃至资产扣留。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以后，美国国内有人提出要求中国赔偿病毒蔓延导致的损失，其总量从数十亿美元到一万多亿美元，而且特朗普表示，即使与中国达成 100 个贸易协议，也弥补不了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这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的担心。

2020 年 5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7 月 14 日特朗普签署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惩罚所谓实施恶法、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官员、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以及与制裁对象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实体。《香港自治法案》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有 10 条，其中关键的有两条，即“禁止美国拥有管辖权的、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和“禁止该外国金融机构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转让或支付，只要该转让或支付受美国管辖且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

美国这种制裁广泛运用于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古巴等。如 2018 年 5 月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于 2018 年 11 月 4 日前停止与伊朗石油交易，否则个人、实体、央行和商业银行等面临账户和交易资产的冻结。2019 年 1 月 28 日美国冻结委内瑞拉一家石油公司在美资产 70 亿美元。2019 年 8 月 5 日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新的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及资产权益都被封锁，不得转让、交付、出口、撤销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限制，也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再次从伊朗和委内瑞拉进口石油，中国涉外经济活动的交易、支付以及资产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资本账户开放的安全问题、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的安全问题、国际支付结算体系的安全问题。

二、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中国涉外金融安全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涉外金融的货币本国不能印刷，必须通过出

口、吸引外资、借债、企业境外上市而获得。同时，这些交易、支付、结算体系，以及外汇资产的经营、投资、运用等，使用的是美国可以控制及支配的技术和系统，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因素。

1. 储备货币的特征导致非储备货币国家涉外金融不安全

首先是纸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所有危机都表现为与美元汇率联系的价格危机，或者表现为缺乏美元不能清偿债务，或者表现为缺乏美元不能保障汇率干预的成功，或者是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应对投机资本冲击，或者是美元本身的资产价格危机。这是纸币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世界货币后出现的现象，而之前没有这种危机或不安全。

其次，金融资产规模不对等。储备货币国家或发达国家汇率一般价格高昂，而且金融资产规模巨大。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其资产价值廉价，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开放资本账户，没有足够的防御投机冲击的能力，开放和投机资本会对本国构成巨大威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实力强大，资金雄厚，如果对其完全开放，这些金融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乃至金融，或者带来国家金融资产泡沫及泡沫破灭。

最后，拥有储备货币的投机资本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强者，非储备货币国家作为弱者，不是强者的对手。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来说，获得足够的外汇干预市场需要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来说，本国实体经济力量微薄，获得外汇的代价太大，能力有限，也难以抵御投机资本冲击。

当然，外部蓄意投机冲击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如 1992 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8 年的泰国、香港货币危机。此外，还有危机传导的连带危机，如 1997—1998 年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

2. 美元金融制度存在巨大的风险

2020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 32165 亿美元，中国银行业境外资产 13354 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 9048 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或外汇资产越来越大，但要问哪种储备货币资产能够让我们放心，恐怕难以回答，能够回答出来的大概就是多元化，坚定不移地多元化。但是，人们可能忘记了当美国在真正危机时刻，其他储备货币也处于紧张、惊恐乃至危机状态，如 2000 年美国 9·11 事件，2008 年次贷危机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美元荒，美元地位没有弱化，反而加强了。其实，如果美元金融真的出现危机了，而且是持续性危机，那么目前的各种储备资产都不安全、不可靠。但美元金融制度一定安全吗？美元金融制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危机开始，获得了一种新生，但是这个制度

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20 世纪以前的所有危机都与美元制度有关，但基本发生在美国之外，而 21 世纪以来的危机都发生在美国本土，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从外围走向中心。面对次贷危机和疫情危机，美国、欧洲都采取量化或无限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成为未来爆发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趋向下行，继续扩张货币政策，持有的美元资产将面临大幅贬值的可能。

3. 美元霸权带来中国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一是人民币汇率的信用是靠美元的多少来背书的。在纸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时代，一个国家没有美元等外汇及外汇储备，本币汇率就缺乏足够的国际信用，经济就相对落后，缺乏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力，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就是如此。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没有足够的美元流动性，政府和企业在国际上筹集资金的利率成本就会相对提高，甚至带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干预外汇交易市场的汇率波动，保障本币汇率稳定，确保不发生债务危机。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其实是被美元绑架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可以要求日元和马克升值。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一直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而中国不能要求美元升值。

二是经济发展和崛起的路径有赖于美元增加。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下，黄金的短缺使得国内商品流通难以扩大，而黄金增加带来贸易流通规模扩大和经济规模扩大。资本主义早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一方面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流通中的黄金不足。黄金和白银作为世界货币时，拥有黄金和白银的多少决定了国家经济、贸易及其带来的规模扩张多大，以及国家经济能否崛起。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时代，大国崛起，必须拥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但黄金和白银无论是矿藏资源，还是流通、交易都是有限的，对国家的崛起影响历史相对漫长。纸币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以后，拥有储备货币的纸币多少就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崛起。而且，在纸币制度下，国家经济的崛起时间要快于黄金作为货币的时代，因为其便利程度大大提高。战后日本、德国的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与从美国获得巨大的美元顺差关系巨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与美国的贸易以及巨大的美元顺差。

三是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制度下的账户和支付体系，对账户上的资金资产交易、支付等进行限制、冻结、挪用等制裁，甚至剔除出账户系统。纸币与黄金不同，黄金流出以后，必须以商品和服务交换才能回流。纸币是主权国家的货币，故所有的纸币必须回到主权国家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账户上。美元流出以后，不需要商品和劳务的出口，美元自动就回流到美国，外国机构通过开设银行账户，将美元资金存回到美国或在美国进行投

资交易等。不仅是流出和流进如此，只要是美元交易，都在美元账户的交易系统上体现出来。美元存贷以及各种跨境交易、支付在账户的唯一性，使得美元霸权无处不在。美国政府可以下令禁止账户交易、支付，甚至下令冻结乃至没收资产，甚至将机构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剔除出去。

可见，由于美元的霸权货币特征，持有美元资产存在风险：即挣的美元越多，不仅无法在国内使用，也无法作为自己真正掌控的财富，风险也就越大，但又不能不拥有美元，也不能少拥有美元资产。中国以美元表示的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都被美国捏在手里，银行等外汇资产持有、交易、支付结算机构存在被剔除出账户系统的可能，外汇资金也无法取回。一旦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

（二）内部原因

1. 中国经济崛起

当下，中国涉外金融缺乏安全的首要内部因素是中国经济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强大，尤其是 2008 年以来与美国形成强烈的对比。数据显示，2008 年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 31.23%，但 2018—2019 年后达到 67% 左右，同期中国贸易规模从仅有美国的 75% 发展到超过美国 10%（见表 1）。多数预测认为，按照目前的速度，大体上到 2030—2035 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将跃居世界第一，这让美国深感压力。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较大幅度衰退，需要数年时间恢复，而中国经济当年就得到了恢复，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美国从 1890 年在经济上成为全球第一后，至今没有被哪个国家追赶上。现在中国快速猛追，很快要超过美国。奥巴马政府曾调整战略，重返亚太，要遏制和规锁中国。2017 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 33 次，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2018 年 1 月 20 日，美国政府发布《国防战略报告》，称中俄战略竞争是挑战，认定中国正在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来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寻求在“印太地区”获取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金融是最后的手段，但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手段。因为国家的涉外经济、金融财富、资产都是以纸币美元来表现的，一旦这些资产财富被冻结、没收或者限制交易，会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带来系统性危机。

美国在应对和打击大国崛起上有一套成熟的战略。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有专家预测 80 年代苏联将超过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也有人预测 90 年代日本经济超过美国。

表 1 2008—2019 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情况对比 单位：亿美元

	2008 及占比%	2016 及占比%	2018 及占比%	2019 及占比%
美国 GDP	147128 23.1	187072 24.5	205802 23.8	214277 24.4
中国 GDP	45943 7.2	112333 14.7	138948 16.1	143429 16.3
中国占美国比%	31.23	60.05	67.52	66.94
美国贸易规模	33911	36382	42067	41436
出口	1287442	14515	16660	16452
进口	21036	21868	25408	24984
中国贸易规模	25633	36856	46224	45761
出口	14307	20976	24867	24990
进口	11326	15879	21357	20771
中国占美国比%	75.59	101.30	109.88	110.44

资料来源：《2019 年 1—12 月美国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百度网，<https://wenku.baidu.com/view/ab07bd284631b90d6c85ec3a87c24028915f8507.html>。美国和中国 GDP 数据来自快易理财网，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usa.html。

1985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13989 亿美元，是美国的 32.24%，1994 年达到 67.33%，1995 年达到 71.33% 的峰值，2019 年日本 GDP 50818 亿美元，下滑至美国的 23.72%。中国经济 2008—2018 年间的崛起有点类似日本 1985—1995 年间的崛起，世界经济比重和占美国经济比重差不多，但 1995 年是日本的转折点。美国自以为已经有了对付苏联和日本的经验，因此，今天美国把主要精力用在应对中国的崛起上，期望能够通过一个时间过程，用各种手段把中国经济打压下去。

2. 金融开放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金融开放带来的涉外金融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汇率制度选择不当，选择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同时是对外汇缺乏管制和控制，没有认识到本国要拥有储备货币需要很多前提条件。

急于开放来谋取发展，获得地位，必然缺乏安全。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在 1995 年就急于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强调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因而被迫答应允许企业自由借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突然倒下。过早开放，也必然导致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由于预期香港回归中国，亚洲诸多国家都试图取代香港的地位，当时的东京、汉城、曼谷、新加坡等都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允许本币离岸外汇交易，允许银行自由借贷，给投机资本

开辟了投机通道，而忽略了自己保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因此产生了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

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危机。如过分开放证券市场，导致大量投机资本进入而催生金融泡沫产生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和香港都存在类似问题。最常见的资本过度流入是借用短期外债超出了出口创汇能力导致债务危机和汇率危机。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就是债务危机，2000 年三国公共部门债务占各自 GDP 的比重都很高，分别为 62%、52%和 39%，同时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重也很高，分别为 130%、116%和 95%，这样就很容易引发支付的信任危机。^①

应该说，过去数十年中国没有因金融开放而带来金融危机，但在美国施压开放的背景下，如果在汇率制度选择和外汇管制、管控上处理不当，允许资金完全自由进出而无约束，则必然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3.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涉外金融缺乏安全

1994 年之前，中国国际收支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此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并带来严重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达到均衡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顺差，1994 年以后，人民币汇率逐渐升值，趋向稳定，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2005 和 2010 年人民币汇率机制启动了两次改革，国际收支保持了大规模顺差，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也持续扩大。但根据 2020 年 1 月份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未来中国要扩大从美国的进口规模，中美贸易顺差将逐渐趋向零顺差，这种做法可能被欧盟仿效，中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顺差存在一定压力。中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美国和欧盟国家，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将面临挑战，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面临压力。虽然中国具有 3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仅仅是每年每人 5 万美元的购汇，也只够 6000 万人次的购买，更不用说企业了。所以，中国涉外金融存在极大风险，甚至有出现危机的可能，这都是因为要持有美元等储备货币。

三、保障中国涉外金融安全的对策

（一）关于外汇（储备）资产安全

只要中美不直接发生战争冲突，正常情况下，美国直接冻结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和外汇资产的可能性不大，禁止和限制外汇资产交易和支付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种冻结、禁止和限制交易，不仅影响中国，也会影响世界以及中美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和交易。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2 年 6 月，第 43 页。

在双边关系接近或进入敌对状态之前，需要进行预判。规避安全风险的途径如下。

1. 将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货币互换

这需要有关系良好的交易对手，双方愿意进行资产互换，即让对方持有美元资产，而我方持有非美元资产，比如日元国债、英镑国债、欧元政府债券等。可能选择的机构一定是日本、英国和欧盟的机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机构无法承接我国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哪怕是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2. 将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投资

将持有的美元资产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资产，事实上中国已经这样做了。但这需要与国内对外汇资产的币种需求结构进行匹配，如果国内需求的外汇资产依然以美元为主，则不能进行币种比例上的错配。当然，还要看多币种资产投资的可行性。而且，就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来看，其他币种资产的风险远高于美元，且便利性、流动性和快捷性不够。21 世纪以来，一旦美国出现危机，美元相对稳定，而其他储备货币往往首先动荡。因此，多元化投资可以分散风险，但最终不能解决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

3. 购买更多的黄金作为储备

虽然黄金已经不是货币，但黄金依然有价值，理论上确实可以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减少美元外汇储备。但黄金储备即使增加 3000~5000 吨，使用的外汇储备也有限，不能真正解决外汇储备的资产安全问题，而且真正需要以黄金支付的时候，中国民间黄金拥有量非常大。更重要的是，黄金作为支付交易手段，也需要建立支付清算体系。今天再建立一个黄金存放或清算体系不太容易，因此购买黄金替代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价值不大。当然，还有人建议购买更多的战略储备物资，或者把美元国债卖掉，这些都缺乏可行性论证，不具有实际意义。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与美国的和平合作，不发生战争和冲突，这是保障外汇储备以及外汇资产安全的最根本途径。然后，在较长的战略时期内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二）关于交易和支付结算系统

中国的涉外金融安全，本质是因为美元霸权，也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国竞争和崛起中不存在这种涉外金融安全问题。未来 10 年，要摆脱美元支付体系的控制和影响很难。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未来甚至可能作为经济战略上的敌手，美国随时都可能利用美元支付结算体系打压中国，只是找什么借口的的问题。因此不能不考虑重新建立体系。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在 85 个国家和地区运行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支付体系进行制裁。事

情不是那么简单，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是自身使用的一个系统，外界的参与性相对少，即使有，也仅仅是支付结算，未与资金的跨境流动和资本账户开放关联，他国难以使用。而且这是政府建立的体系，国家之间不太容易合作。

对于美国利用 SWIFT 系统对中国贸易、金融进行打压和制裁，短期内需要沟通，确保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正常进行。同时，美国是法治国家，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抗争。当然，要解决自身的金融命运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组建新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形成支付结算体系的多元化国际竞争，这样才能摆脱美国的制裁和控制。具体如下。

1. 提倡主权货币计价、支付、结算、融资，开展相关制度设计

主权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并非只有美元和欧元具有这一功能。因此，任何主权货币都可以作为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为什么主权货币在国内具有计价、结算、储藏功能，在国外就只能用美元、欧元等第三方货币？如果说英镑、美元早期与黄金挂钩，能够兑换为黄金，可以承认其是国际货币，但今天已经与黄金没有关系了，为什么还依赖呢？其实这是历史习惯，认为美元等主权货币已经成为储备货币，而本币虽然是主权货币，却不是储备货币，这是路径依赖产生的认识虚幻。当路径依赖产生危害，甚至被制裁，依然无法抛弃。原因在于各国理论认识不到位，相互不信任。主权国家之间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国际信用和信任，尤其是历史的信任和信用。因此，主权国家应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签署协议，并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相互接受对方的货币作为跨境计价、流动、支付、结算、交易货币，这样就可以少使用、不使用美元等储备货币了。目前，可以先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开始，相互建立主权货币的计价、交易、支付和结算系统，也可以从周边国家开始。如果愿意，双边应该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以确保信用。

2. 尝试建立区域性货币或创新区域虚拟黄金货币符号

破解美元霸权，需要各国齐心协力抛弃美元，不用或少用，不持有或少持有美元，至少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不把美元作为国际信用货币，建立起自己的信用货币，如欧元区，欧元是信用货币，可以不需要美元。1929—1933 年大危机的时候，曾经有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① 1999 年欧元诞生之前，亚洲也曾经猜想是否出现日元货币区。^② 2003 年海湾六国曾经提出建立统一货币，但没能实现。亚洲也曾经提出亚元设想，^③ 也没有实现。由此可见，建立区域性货币不太容易。但只要各国合作，可以在金汇兑制度的基础上，将黄金虚拟化为符号，建立区域性支付、结算、交易货币符号（类似虚拟黄

①赵庆明：《驶向彼岸 人民币从国家货币走向国际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66 页。

②戴相龙：《戴相龙金融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0 页。

③陈炳才：《当前推出“亚元”不合时宜》，《中国经济时报》2009 年 4 月 28 日，第 A01 版。

金)。这种符号被区域内各国所认同，且与各主权货币有着固定的汇兑关系，储藏依然以主权货币表示，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是以多币种虚拟化建立起来的货币，运行复杂，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但是，今天在区块链技术以及各种支付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考虑再次回到金汇兑本位时代，但这是虚拟的金汇兑，可以不用 SDR，直接用支付技术就可以进行国际支付和结算，而且都是本币。

3. 建立起市场化的跨境支付结算及外汇交易体系

货币作为计价、支付、结算、交易和储藏手段，关键在于信用，在于树立信用意识，也在于有支撑信用意识的制度体系，如支付、结算、交易、储藏尤其是自由流动体系。因此，破解美元霸权的出路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即建立起至少可以与 SWIFT 系统竞争的支付结算体系。不能建立起全球适用、便利、快捷，可以与美元支付、流动体系竞争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替代、抛弃美元体系，也无法与美元体系竞争。欧元虽然可以与美元竞争，包括英镑，但在流动性、全球支付体系、金融可交易品种、可选择的便利等方面依然无法与美元竞争。

主权货币国家都建有自己的支付结算体系，对各国央行来说并不陌生。最简单快捷的途径就是把两国央行的支付结算体系联网，按照市场汇价进行跨境支付、结算和资金流通。但央行支付结算体系是政府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掌握另外一个国家企业的所有跨境支付结算数据，应该说这也存在风险。如果两国关系发生矛盾，会否利用账户体系进行制裁呢？因此，只有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才能让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资本流动放心，而 SWIFT 系统在这一点具备优势。

中国要彻底解决涉外金融安全，就需要有建立市场化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决心，真正能建立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可从双边开始，逐渐增加到多边，政府以法律形式承诺不干预，就可以形成主权货币的支付结算体系。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可以由双边最大的国际业务银行牵头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联合建立。当然，需要双边政府协调，制定有关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行业也要有规范和制度，设立处理利益、法律纠纷的仲裁机构。同时，试行主权货币结算和挂牌交易制度，建立主权货币外汇交易市场，该交易市场没有美元等储备货币，全部是本币，而且都是贸易企业或进行跨境业务的企业。目前可以开辟第二外汇交易市场，放在广东，币种与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不重复。

4. 建立和游说区域金融机构，以主权货币出资并进行融资

国际区域金融机构是区域内国家出资建立的金融机构，本该服务于区域内有关国家

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但由于出资的货币是美元，无法做大。美元的获得是需要通过贸易顺差债务、外商直接投资才能获得，这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来说很不容易，故很难继续以美元增资。对于区域内金融机构，1000 亿～2000 亿美元的注册资本金已经很大，但这个金额范围的资本金在不能吸收存款的约束条件下，无法像国内商业银行那样持续壮大发展，也必然无法服务于区域内各国经济和金融增长需求。但如果区域金融机构改变出资方式，各国以本币出资组建区域金融机构，增资也以本币增加，各国就可以持续不断扩大本币资本金，区域金融机构就可以做大，服务于区域内经济和金融发展需求。以本币出资以后，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使用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都以本币形式提供，既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债务风险。这类项目提供政府担保，区域金融机构与项目贷款所在国的商业银行合作，组建银团贷款，并主要提供一套国际化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的规范流程，这样就可以把区域金融机构做大，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流动资金等贷款不足问题。

5. 建立相应的双边（区域）国际金融机构，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资金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流动，涉及到资金拆借、银行授信、货币互换、贸易融资、汇兑交易等，需要双边开放银行间拆借、外汇交易市场，也涉及到清算体系的联网。早期阶段可以建立一些特定的机构来协助完成，比如设立一家双边持股的金融机构，作为双边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的会员，可以随时满足流动性需求，满足授信的资金币种需求等。不断增加双边或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而且完全以本币出资，由财政部门担保。还可以建立一些双边信任的担保机构，对一些项目进行担保。当然，为增加双边和多边信任，需要妥善处理好汇率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主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就没有信用。因此，双多边的央行应该就汇率、物价上涨等问题进行协调。其实，如果不依靠美元进行本币的信用背书，只要控制好货币供应量，物价不出现大幅度上涨，汇率也就不会大幅度贬值。

（三）关于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与支付结算体系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风险，货币是自由兑换的，本币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只有本币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的主权货币，即非储备货币，才有外汇管制问题，才有资本账户开放问题。^①现在建立了主权货币计价、交易、跨境支付和结算制度，就不必担心账户开放的风险。

^①李瑶、陈炳才：《逐步推进的进程——非国际货币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贸易》2003 年第 6 期，第 49～50 页。

1. 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自由开设本币账户

流出国境的本币需要回流，而且要自由回流和迅速回流，这就要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国民待遇。如果不能享受国民待遇，就会觉得不便利，不如使用美元好。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通常认为这会带来金融风险。其实，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是本币相对储备货币来说的，不是相对非储备货币来说的。一切涉外金融资产安全都是因为货币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而建立主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以后，货币地位就是平等的，货币在境内自由流动，跨境也可以，故开放的风险消除了。

应该清楚，出去的本币回流到国内来，相对本币规模来说很小，不必担心其风险。如同美元流出再回到美国，美国就不需要担心这种冲击。总体说来，储备货币之外的主权货币流入国内的风险是可控的。只要双边签署了贸易投资协定，允许以本币计价、交易、支付、结算、投资和流动等，就可以完全放开双边本币资本账户的限制，不能把对储备货币下的资本账户管制搬到主权货币上。如果担心风险，双边可以考虑实行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总额或余额控制。这种做法在多国或者某个区域内不断扩大，就可以消除对储备货币的历史习惯和路径依赖。各国经济发展和崛起主要就靠本币，靠交易双方的货币，而不会依赖美元。

2. 从单边推进转变为双、多边推进，实施双边本币计价和支付结算制度

中国从2009年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基本是中国人民银行对本国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要求，并没有国际合作。某种意义上是单方面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走出去，没有获得外国政府、商业银行乃至企业的同意或法律认可，只是一种自愿，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甚至存在自家人做自家业务的情况，即国内银行的分行与本行境外分行或子行进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业务往来，这不是国际化。应该将单边行为转变为双边和多边行为，即政府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接受对方的货币，以本币进行计价、支付、结算和外汇交易。这一方面体现了主权货币的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货币职能的国际化。

其实，当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同时，别国也想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结算。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尤其如此。单方面推进，对方不会在制度上轻易接受，而双边制度安排，就容易推进了。至于结果如何，企业如何选择，看各国货币地位和服务竞争等情况。只要双边政府推动，本币跨境以后就能够履行货币的基础职能，并非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可以跨境履行货币的基础职能。

3. 建立双边、多边本币回流机制，实行余额控制的资本账户自由开放

采用本币标价和国际贸易结算业务之后，无论是银行和企业必然会产生暂时不用的资金或头寸，这些本币在境外没有投资渠道，就必须回到本国进行投资。这就需要允许商业银行之间可以进行本币跨境拆借和资金往来，甚至允许商业银行到对方国的本币银行间市场乃至债券市场进行资金融通。这样，商业银行之间才可以用对方货币授信，银行才可以对企业进行双边本币授信，以开展本币项下的信用证、保函、对外担保、贷款和海外垫付等石油交易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

对企业来说，还需要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进行理财，进行债券或证券市场的投资。这样，境外企业才愿意持有人民币或其他主权货币。因此，可以考虑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熟悉的债券、股票、理财、存款、贷款、债权和债务市场进行双边本币开放。

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自由流动，获得风险收益。为确保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可控，在不完全开放债券、货币、证券市场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贸易差额和资金需求，设立本币开放的总额或者余额，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享受国民待遇。账户开放可以进行双边谈判，也可以进行多边谈判。但需要注意，这一开放原则上只对非储备货币。对于储备货币，因为其金融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远大于本币，依然要采取管制，或者总额不突破。

4. 保持币值稳定乃至升值，必要时回到固定汇率制度

一个持续不断贬值的货币不可能有国际信用，也不会被企业和金融机构用于国际支付、结算和债务偿还。汇率波动性比较大的货币也难以被用于国际支付和结算，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纵观历史，凡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纸币，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必须是稳定的、升值的，至少是持续稳定的。日元虽然是储备货币，但其占比较低，就在于其波动性太大，连日本的企业自己都不愿意用日元结算。

因此，某个区域内的国家要摆脱美元霸权，摆脱美元制裁的不利影响，首先必须控制好通货膨胀，保障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以进口管制、外汇管制（储备货币）以及固定汇率来确保汇率稳定，而不能实行所谓的自由浮动汇率，那必然导致严重的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得经济、金融失去控制，这种情况在很多小国都存在。而且，在非储备货币国家之间建立以虚拟黄金为支付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不会出现因缺乏美元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破解美元霸权，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就需要保证货币供应有序、稳定，与经济增长适应，确保物价和汇率稳定，这样区域内的主权货币之间就会有相互的信任，就可以实

行主权货币计价、支付和结算等。有了数年乃至十年的主权货币运用，市场将逐渐选择出区域内的主导货币，就可以不必担心美元霸权和美元账户体系的制裁。总之，凡是主权货币在境内可以做的，跨境之后，只要有机构，有好的机制和制度安排，都可以不用美元等储备货币来做，用本币或本国认同和接受的主权货币就可以做。这样，也就可以避免美元账户制裁以及制裁带来的巨大风险。

（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工作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计价、结算、流通、储藏和融资等功能，推动人民币“走出去”，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与储备货币进行竞争。人民币加入 SDR，在国内开展以人民币计价、黄金结算的国际石油期货交易，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乃至建立虚拟黄金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这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根据储备货币的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政策上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 人民币在境外必须成为合法货币

人民币必须能够广泛用于双多边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而且必须自由进出。人民币如果不能自由流动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一般不允许外币在国内计价、结算、流通和融资等，只有得到东道国的法律承认，人民币在境外才能成为合法货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思路：一是双边政府之间签署协议，允许两国的本币跨境计价、支付、结算、流通和融资，不单方面推进本币国际化；二是本币持续稳定升值，其他国家的机构自然愿意持有人民币；三是本国对外宣布或者承诺，任何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和机构可以随时兑换为储备货币或者黄金。

2. 人民币大量出境要有通道

本币大量出境有两种途径：一是经常项目存在大量逆差。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常项目交易大量顺差，境外机构、企业能够大量持有人民币，从事人民币的存款、贷款、贸易信贷、融资等活动。二是资本项目存在大量逆差。若经常项目交易不能逆差，资本项目必须逆差，人民币直接到境外投资、融资，这要求利率必须低于储备货币的利率水平，资金成本低，其他国家愿意使用。而且人民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必须升值，至少是稳定的，他国才愿意使用，否则利率获得收益，汇率可能有损失。

3. 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的授信体制

中国的商业银行与境外的商业银行，以及境外商业银行与其客户之间都必须有人民币资金的授信，没有授信，就不能开展国际贸易中的信用证、保函、融资业务，人民币

也无法国际化。各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流动性既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即在出现流动性短缺乃至危机时有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或人民币贷款；也需要商业银行之间可以相互拆借。这意味着银行间的货币市场需要对境外商业银行开放，或者吸收境外支付结算行作为会员单位，或者组建主权货币交易拆借市场，其中不包括储备货币。

4. 有效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这其中会有很多风险和挑战。例如，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带来汇率危机，也会导致境外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境外市场拆借利率过高，人民币就没有市场。如果离岸汇率、利率波动国内不能控制，就可能引发汇率、利率危机乃至资金大幅度跨境套利或转移。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关闭了本币离岸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是纯纸币的国际化，与黄金作为保障的纸币国际化不同。人民币国际化是以美元为信用保障的国际化，又要去替代美元，进行国际竞争，这其中会有很多挑战和预料不到的风险。国际货币不仅是信用，也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科技和军事是最先和最后的保障；同时，还是国际监管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体现。国际化的货币未来需要新技术，更需要便利化。从美国经验和大国竞争实力地位变化的历史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借助更多国际力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一些观点认为，SDR 和数字货币可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人民币已经加入 SDR，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数字货币在全球央行也算走在前列。这种观点缺乏深入研究，SDR 依据主权货币而设立，怎么可能去助力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它是国际金融的一个游戏迷局，根本无法发挥什么作用。数字货币的本质是支付技术，央行数字货币同样如此，基本类似微信、支付宝，它也是主权货币支付方式的创新，不具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如果主权货币没有国际化，那么央行数字货币根本不可能国际化。

责任编辑：郭 霞

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变局和 亚洲经贸合作*

张燕生 逯新红 刘向东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显著。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东亚经济率先复苏，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亚洲始终是中国经略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如何经略好这一地区，积极营造繁荣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发展机遇期，对中国塑造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发挥中国作为大国领导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探讨分析亚洲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动向，探索亚洲经贸合作的新思路新路径，对赢得中美战略博弈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也有利于推动区域各国加强互信互利合作和维护亚洲稳定繁荣。自贸区战略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之一，提高自由贸易区标准和质量是大势所趋。分析各区域经贸协定、亚洲产业链转移趋势及对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未雨绸缪，早有预案，争取主动。在分析这些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亚洲经贸合作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合作的新思路，给出中国方案和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格局 产业链 供应链 经贸合作

作者简介：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逯新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刘向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 本文为2020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重大课题《以东亚合作为重点的亚洲经贸合作》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变局

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全球化遭遇收缩、新科技革命加速更迭、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呈现竞争优势重塑、经贸规则重建、力量格局重构的叠加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亚洲区域内的经贸合作逆势增强，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加紧密，亚洲经贸合作正在迈向一体化新阶段。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顾百年前，1870—1913 年经济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百年后，美国要改变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以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对等开放为全球建章立制。当前，大国博弈及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百年前经济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历史可能会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

（二）全球疫情大流行将引发世界格局深刻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与安全，冲击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引发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变化。2020 年 9 月中旬，日本实现由安倍政府到菅义伟政府的平稳过渡；11 月初，美国大选牵动世界人民的神经，如今不确定性风险有所缓解；11 月中旬，东盟与中日韩澳新等 15 个国家最终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给各国增添了团结合作的信心。面向“疫后”的世界，美国新政府如何推进抗疫、中美关系是否有所改观、全球经济秩序能否回归正轨等问题尚有待观察。

一方面，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西方经济主导权下降。全球经济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实力对比变化势必会导致格局调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 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比重为 59.2%，较 2008 年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比重为 40.8%，相比 2008 年提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201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超过 16%，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 GDP 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3 个百分点以上，表明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韧性，未来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是确定性事件。^①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举步维艰。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前景非常不容

^①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宏观团队：《高质量、双循环、共富裕》，金融界网站，2020 年 11 月 8 日。

乐观，堪比 1929—1933 年大萧条。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科技战和贸易战将进一步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如果中美科技脱钩、产业脱钩、金融脱钩，将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两个市场。同时，美国制定《2018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欧盟 2019 年 3 月出台《外资审查框架法案》，日本 2019 年实施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管制等措施，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在挫折中前行

经济全球化受到挫折，但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人文全球化等继续前行。全球贸易和投资受到挫折，但共享型投资、绿色投资、创新投资、普惠投资等继续前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面对挫折，但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蓬勃发展，亚洲乃至全球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努力仍在继续。

（四）全球区域一体化趋势复杂多变

在全球多边机制推进缓慢甚至搁置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逐渐调整经济全球化战略，多边机制更多地被双边、诸边、区域等机制代替，包括加快推进设立更高标准自贸区，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签署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也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区域性、排他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挑战，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RCEP 等更加包容和开放地区主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成为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两种不同形式。

（五）全球治理陷入困境

2017 年以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全球治理改革陷入困境。长期主导全球治理执行、完善和变革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在重塑全球化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作用正在缩小。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挑战，凸显了全球治理存在的短板。美欧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合作意愿明显下降。近年来美国频繁“退群”，全球治理赤字增大。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响应，但要真正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开放型大国、包容型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解决全球治理的赤字、民主化和发展缺位等问题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六）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地缘冲突仍将是影响亚洲经济及合作态势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 年以来，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愈演愈烈，朝鲜半岛核问题、印巴紧张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等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给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市场稳定带来冲击。

二、亚洲经贸一体化合作逆势增强

过去几十年中，经贸合作对推动亚洲经济繁荣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世纪”转变，亚洲经济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金融危机前的 26.3% 上升至 2018 年的 37.2%。从 2011 年起，亚洲经济总量超过美洲和欧洲。当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双多边并行的自由贸易区（FTA）网络，区域内产业合作加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

（一）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双多边并行的 FTA 网络

在全球日益复杂的变局下，亚洲经贸合作正在迈向一体化新阶段，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亚洲的区域经贸合作主要以推进 FTA 建设为主，已从签订双边 FTA 为主逐渐拓展到签订多边 FTA，逐步形成并行不悖的区域经贸合作网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截至 2020 年 10 月，亚洲共有 268 个 FTA，其中谈判中的 88 个，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 13 个，签署并生效的 167 个。此外，拟议中的有 94 个。

（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

RCEP 最终签署，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RCEP 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成立，其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 30%，意味着全球约 1/3 的经济体量形成一体化大市场。RCEP 在规则条款上相对高标准和非歧视与包容性更加符合亚洲经济特点，尽可能兼顾各成员的发展水平，对亚洲其他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利于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RCEP 的签署和实施是对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利支撑，有利于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推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

CPTPP 高标准协议，有助于亚洲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CPTPP 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 13.1%，其高标准协议有助于亚洲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目前 CPTPP 正在寻求扩容，吸引更多的亚太国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接纳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英国等经济体，以分散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产业链风险。

中日韩 FTA 积极推进，有助于推动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中日韩三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分量、有影响的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人口总数约占世界的 20%，经济总量约占亚洲经济总量的 70%、世界的 23%，外汇储备约占世界的 47%，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均约占世界的 20%，是亚洲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整体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开展“中日韩+”合作，共享三国发展经验，可以合力帮助其他国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多元包容的共同发展。

（三）亚洲区域内产业合作加强

在生产一体化方面，2018 年亚洲中间品贸易的增长率出现剧烈下降，与全球趋势相同。对中间品流动的网络分析显示，亚洲区域内中间品流动仍然占主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在亚洲全球价值链构建中的重要枢纽作用。倘若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带来全球和亚洲区域内产业链的调整。

（四）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经贸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第一，与东亚地区：深度参与东亚生产网络。中国与东亚国家（地区）的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主要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其中，中间产品主要为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所占份额较小。中国是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来源地，并且这一地位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随着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稳步增长，中国在东亚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东亚区域的生产网络已逐渐由以日本为主导的“雁型模式”发展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三角贸易”模式，即从曾经的东亚各国（地区）由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并进行加工组装出口到欧美市场，转变为中国从东盟和日韩进口中间产品并进行加工组装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产业链分工的程度更深，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联系也更加紧密。^①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2020 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二，与中亚、西亚地区：在战略资源与优势产能上高度依存。中国是世界上能源进口第一大国，70%左右的石油依靠进口；72%的石油进口来源于西非、中东、南美洲和俄罗斯，天然气主要从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三个国家进口。^② 这些油气进口来源地多处于中东等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地区，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能够为中国能源安全增防固障，并让这一丝路古道重要枢纽和

^①陈继勇、杨格：《新冠疫情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亚太经济》2020 年第 2 期。

^②何迎、邢园、刘岩婉晶、汲奕君：《中国能源进口贸易的问题及建议》，《价值工程》2020 年 12 期。

关键区间再度焕发蓬勃生机，同时有利于中国边疆和地区的稳定。

第三，与南亚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深。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实效，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务实合作机制不断发展。2019 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近 1400 亿美元，中国和南亚国家深化合作前景可期。^①

第四，与整个亚洲地区：纵向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本地化关联强化。亚洲人口超过 40 亿人，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其中，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南亚 GDP 比重的 9%，东亚为 5%。^② 随着亚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和投资者多元布局需求的不断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南亚转移趋势加快，亚洲成为全球投资热土。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在加强，推动了东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了区域内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合作的整体水平。近年来，亚洲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地位不断上升。

三、亚洲经贸合作中东亚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凸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叠加冲击，以东亚为重点的亚洲经贸合作逆势增强，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有力维护了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为全球抗疫和经济恢复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疫情加强了东亚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东亚成为疫后摆脱全球危机的火车头。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给东亚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将推动亚洲经贸合作迈向一体化新阶段。东亚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区域内各国发展模式与水平较为多元互补，“一带一路”加速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潜力巨大，合作前景看好。由于东亚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区域协定碎片化、宏观政策协调难、产业链加速调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东亚经贸合作也面临巨大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亚洲经贸合作逆势增强

疫情初期，中日韩合作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复工复产，带动东亚产业链的逐步恢

①界面新闻：《张汉晖大使接受俄媒专访：中国与南亚各国开展紧密抗疫合作，展现患难与共的友好合作精神》，腾讯网，2020 年 9 月 4 日。

②陶凤、王晨婷：《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罗晓梅：全力推动我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北京商报》2020 年 9 月 9 日。

复，为全球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疫情凸显了中日韩的抗疫理念和民族文化性相近，或者说中日韩的底色相近，具备深厚的合作基础。

（二）东亚成为疫后摆脱全球危机的火车头

首先，东亚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升。东亚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相对于全球经济疲软，东亚经济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 16.4% 上升至 2018 年的 24.9%。近年来，东亚经济总量接近北美和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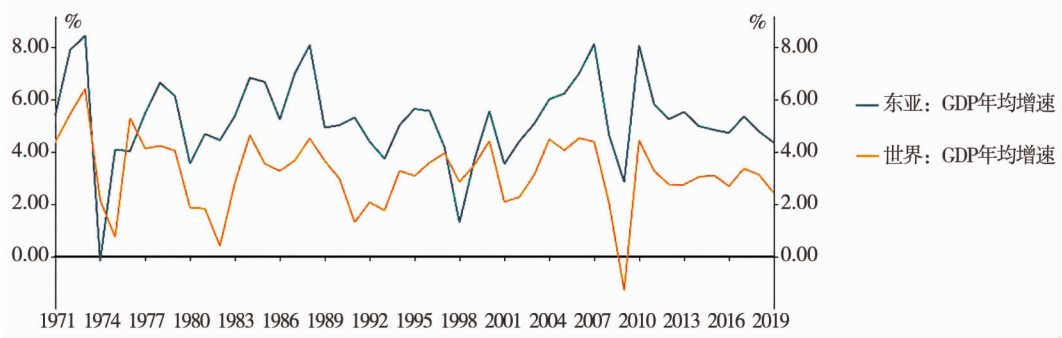


图 1 1970 年以来东亚 GDP 年均增速高于世界 GDP 年均增速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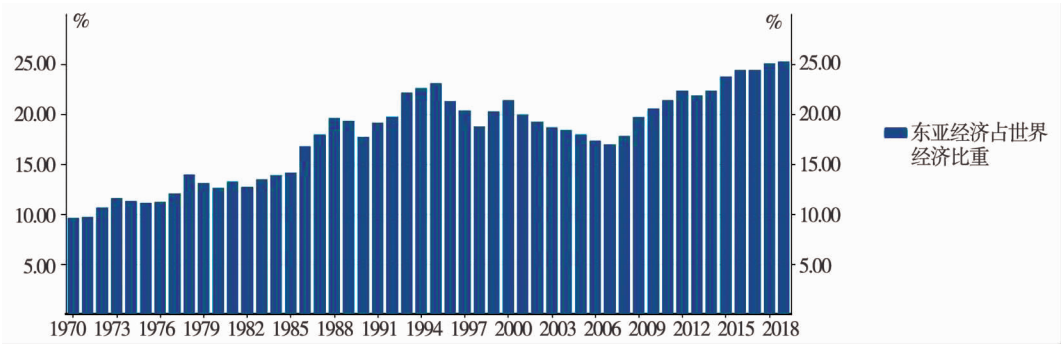


图 2 1969—2019 年东亚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其次，区域内贸易为亚洲经贸合作提供较大合作空间。世界各区域内发生的贸易占总贸易额 50% 以上。从亚洲整体看，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5.2% 上升至 2018 年的 58%。2018 年东亚区域内贸易份额占比 55.5%，创历史新高。这表明东亚区域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相比于北美和欧盟地区，东亚区域内贸易仍有很大潜力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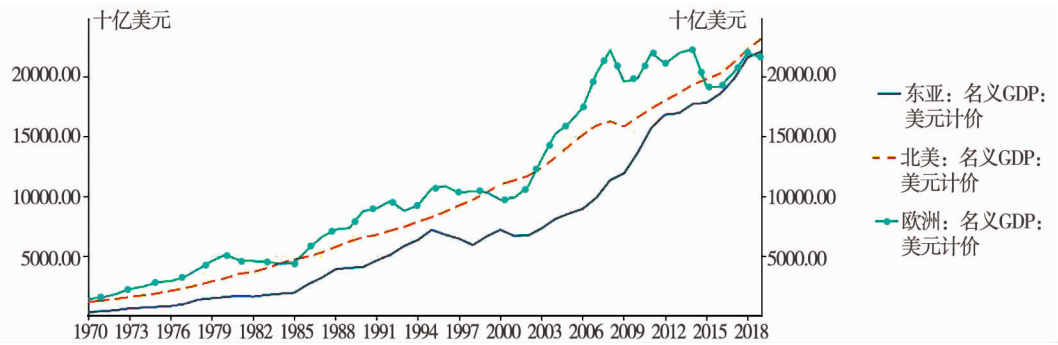


图 3 1969 年以来东亚经济总量接近北美和欧洲

数据来源：万德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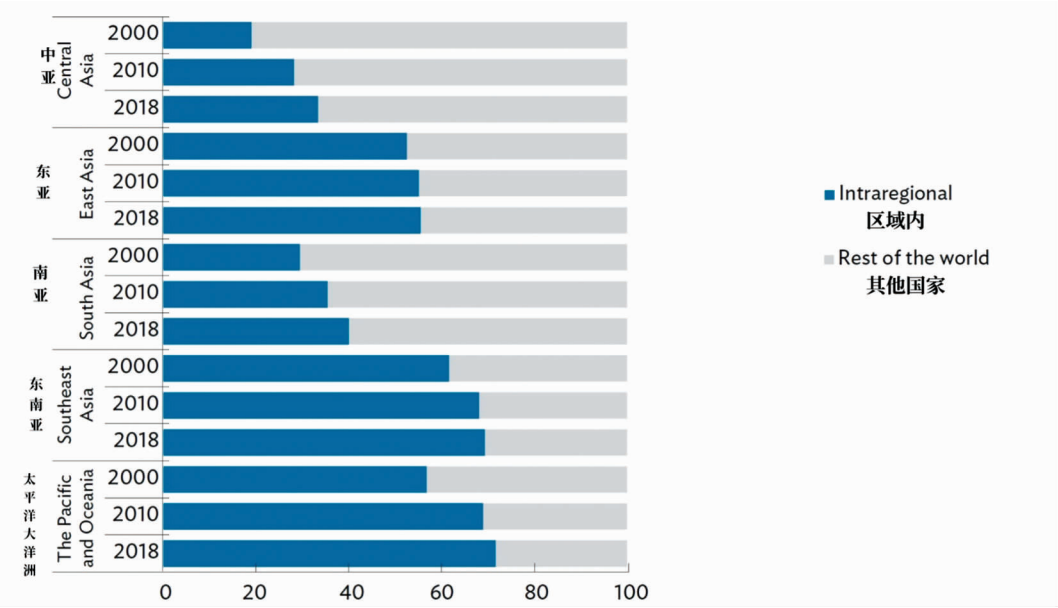


图 4 2000—2018 年按亚洲次区域分列的区域内贸易份额 (%)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 2019—2020》，亚洲开发银行网站，2019 年 11 月。

（三）区域内各国发展模式与水平较为多元，为互补合作带来机遇

亚洲区域合作自成特点，各国发展模式与水平较为多元。差异也意味着机遇，只要各方积极挖掘互补性，就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彼此合作是亚洲地区人民的切实需求。近年来，亚洲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加强区域、次区域合作都是重要内容。RCEP、CPTPP、中日韩 FTA 等区域合作提速，正在为域内国家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

（四）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加快带动创新东移

全球疫情严重冲击了跨国公司投资布局，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加快，带动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生产恢复较快，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

向东亚聚集。中国巨大消费市场吸引全球产业链布局向东亚靠近，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吸引全球高端服务东移。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在疫情期间相对稳定的表现，以及随着《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带来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将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技术资本东移。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将带动全球高端人才东移，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伴随着全球产业链东移，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创新链东移是大势所趋，东亚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五）“一带一路”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五通为合作重点，既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更符合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发展特点，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助力其突破现实发展困境，取得切实进展。

（六）亚洲经贸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区域协定碎片化、宏观政策协调难、产业链加速调整、中美在亚洲战略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给亚洲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挑战。

第一，亚洲经济发展面临区域性挑战。包括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生产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为全球提供制造及劳动力向为本地区和全球创造需求转变，产业链、供应链的断链风险加大和回归本土，区域内金融货币和外汇合作，区域内经济宏观政策难以协调等挑战。

第二，面临中美在亚洲的战略博弈加剧挑战。中美战略博弈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由“贸易战遏制”阶段进入“全面遏制”阶段。美国推出构建经济繁荣网络（EPN），主导“四国联盟+”（Quad+），构筑反华联盟，进一步实施对华战略打压。^①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和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及近期的四国联盟战略，其实质都是新形势下围堵、遏制中国发展的霸权主义战略，构成了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矩阵。从发展趋向看，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出台《美国对华方略》，宣称将改变过去几十年对华接触政

^①经济繁荣网络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越南等“值得信赖的伙伴”组成的反华经济联盟，其战略目标是“去中国化”，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供应链（GSC），加强与“网络”成员合作，重构全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近期复兴的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组成的四国联盟，意在制衡中国并宣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

策，采取“全政府对华”方针，通过公开施压手段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扩张。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全面限制华为购买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美国还禁止至少 13 所中国高校的毕业生在美学习或研究。而且，美国启动与中国产业链的脱钩计划，已说明美国的新亚洲战略有所调整，即在经贸上形成共同制华的包围联盟。拜登上台后对华遏制方针不会改变，在策略上会与特朗普政府不同，将会加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采取联合制华战略。中美科技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的重点。在“毒丸条款”、撤资要求、实体清单、出口技术管制、投资限制、核心关键原料和零部件断供等措施影响下，中美间的供应链联系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风险。

第三，面临如何处理多组关系的挑战。如何处理好东亚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合作？如何加强与美欧合作？如何处理好中美日的关系？面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对华遏制战略矩阵，中国如何破局？

四、推进亚洲经贸合作的政策建议

当前形势下，中国应把握亚洲周边国家对区域经贸合作的基本认知和利益诉求，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继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要方向，全面深化亚洲经贸合作。积极推进以东亚为重点的亚洲经贸合作，深耕东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欧美生产网络，共同构建高标准 FTA 网络。不断增强亚洲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增进战略互信，全面深化亚洲合作。

（一）深耕东亚，全面推动亚洲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一是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和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合作，加强科技、金融、生态和治理等领域合作。其核心环节是推动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推动东亚生产方式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同时，要加强与欧美生产网络的全方位合作。二是重点深化中国与日韩及东盟国家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稳定提升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三是全面提升与日韩合作的发展质量。深化在抗击疫情、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文交流、应对老龄化以及推进 RCEP、中日韩 FTA、CPTPP 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提升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发展质量。四是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经贸务实合作。把握好 2021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30 周年，RCEP 的签署以及中国—东盟 FTA 升级的新契机，推动与东盟的合作进入新发展阶段。

（二）构建基于开放包容的高标准 FTA 网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机制整合

一是实施更加主动的 FTA 战略，坚持双多边 FTA 并行推进策略，逐步构筑起立足

亚洲，以东亚为重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FTA 网络。二是推动自贸协定面向高标准。RCEP 是包容性的，中日韩 FTA 是高质量的，CPTPP 是高标准，中国应积极申请加入 CPTPP，面向高标准积极推进国内改革。面对美国可能重返 TPP，激活冻结的 22 项条款，重新简章立志，推行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中国应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参与 WTO 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各方重点关切的产业政策、国企改革等问题上，结合国内深化改革需要予以建设性回应，面向高标准推进改革，过程很重要。三是推进构建高标准的中日韩 FTA。遵照最大公约数的原则，加快达成介于 RCEP 和 CPTPP 之间的中日韩 FTA 标准。在敏感领域，划定相应过渡期，也可采取渐进更新的办法，事先设定例外条款，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升级某些规则，使中日韩 FTA 达到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标准。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还可量身定做与之相适用的贸易投资规则模块，待其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再升级到更加适用的高标准规则。四是在自贸协定框架下，继续加强规则、制度和政策的沟通，增强安全互信和包容性发展。加强互补领域的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

（三）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亚洲经贸合作战略对接，强化互联互通的辐射带动作用

一是稳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推进“五通”建设，探索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合作机制，稳步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倡导普惠包容共享发展模式，扩大第三方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为区域增长注入新活力，通过扩大内需、扩大进口、带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发展，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二是积极引导“一带一路”接轨国际规则。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对标国际，引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规则体系和标准体系，增强“一带一路”发展融资的透明度，构建东亚及“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推动落实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务实合作项目。

（四）加快构建东亚产业链网络体系，维护基于全方位合作的全球产业链大格局

一是提升东亚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核心是推动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具有弹性和韧性。要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东亚产业链合作，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加强与日韩合作，夯实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基础。疫情过后，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向、中国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完善东亚产业链网络，维护东亚产业链的安全。三是全力打造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产业链体系。要加强中国自身产业链的竞争力。实现由中低端为主走向高中端，

以维护国际分工已形成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五）持续扩大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打造全方位开放新发展格局

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内需市场潜力将不断释放，为与各国合作提供更广阔空间，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有力支撑。二是继续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上台阶；形成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推动创新等知识型开放上水平，加强开放创新和知识产权合作。三是全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发展格局。推进落实《外商投资法》，加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加快澜湄经贸合作五年规划落实和修编，充分发挥中国—南亚合作论坛，中日韩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等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在中日韩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建立健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在中韩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推进共建中韩产业园合作，支持开展中韩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合作 1.5 轨、2 轨研讨会议。四是持续扩大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制度探索，进一步推进边境后行业对外开放，构建内外循环促进支撑的稳定供应链。

（六）搭建高标准区域一体化利益诉求沟通机制，构建超越政治安全的地缘经济新模式

一是有效管控分歧，排除域外势力干扰。寻找更多的经济利益交汇点，引导日韩、澳新等周边国家转变思维，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二是积极发挥各种首脑峰会的积极助推作用。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东亚峰会、东盟 10+3 峰会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高层交往机制化；同时借助多种多边机制平台，构建超越政治安全框架的经贸合作关系。支持企业在商言商，把跨境经贸合作做实做深，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三是搭建高标准区域一体化利益诉求沟通机制。充分发挥东盟“10+3”“10+6”等区域合作平台作用，在双向投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等部分领域，可以尝试以最大共识为标准，纳入高标准的内容。

（七）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区域治理理念与时俱进

以包容发展理念处理好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争取与印度成为和平共处的合作伙伴，保持对亚洲中小国家的足够重视。把亚洲中小经济体纳入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中国赢得中美战略博弈主动。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区域治理理念与时俱进，与亚洲各国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陈继勇、杨格：《新冠疫情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分析》，《亚太经济》2020年第2期。
2. 何迎、邢园、刘岩婉晶、汲奕君：《中国能源进口贸易的问题及建议》，《价值工程》2020年12期。
3. 黄汉权：《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日报》2020年7月15日。
4. 陶凤、王晨婷：《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罗晓梅：全力推动我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北京商报》2020年9月9日。
5. 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6.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
7. 张天桂：《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共建“一带一路”的视角》，《国际展望》2018年6期。
8. 张燕生：《超级全球化受挫，新型全球化开启》，《环球时报》2020年10月29日。
9. 张燕生：《东亚生产网络面临什么挑战与机遇》，《环球时报》2020年5月12日。
10. 张燕生：《第四季度中国还有两个经济指标需要“加把火”！》，网易研究局网站，2020年10月19日。
11. 张燕生：《全球投资、贸易和服务融合逻辑悄然生变 新常态下需要新打法》，新浪财经网站，2020年9月13日。
12. 张燕生：《RCEP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有助于构建区域内更有弹性韧性可持续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界网站，2020年11月20日。
13. 张燕生、陈长缨、逯新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7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4. 张燕生、刘向东、逯新红等：《当前中日政经关系问题研究》，企业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
15. 张文轩：《“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策略》，《铎绘》2019年7期。
16. 张宇燕、徐秀军：《亚洲经济运行的现状、挑战与展望》，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网站，2020年6月25日。
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新形势下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的挑战与新机遇》，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

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构效应分析^{*}

倪红福 范子杰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反事实模拟量化分析中美可能的全面贸易摩擦对两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传统出口优势行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的负面冲击比较大，中国出口集中度下降，而美国的变化不大；中美全面贸易摩擦将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减少，而初级产业和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美国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增加；受关税冲击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出份额的减少会导致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份额减少。未来中国要增强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积极利用国际规则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从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产业结构 反事实模拟 一般均衡分析

作者简介：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范子杰，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已成为国际形势的新趋势之一。主要事件有：第一，美国主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试图对中国发展形成遏制与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20YJC79014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理论内涵、测度和路径分析》（718731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72073142）部分研究成果。

孤立之势。同时，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二，贸易摩擦在全球愈演愈烈。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持续，虽已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但中美贸易战将是持久战。美欧贸易摩擦也进入实质化阶段，2019年10月3日，美国宣布对欧盟飞机征收10%的关税，对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征收25%的关税。第三，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不少言论与政策均剑指中国贸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生产停摆、金融市场暴跌，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全球经贸秩序加速重构。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双重冲击对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并且持续时间越长，供应链断裂风险就会越大。在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加速重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中美贸易摩擦文献述评

2018年以来，学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较多，尤其是在定性分析层面，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应对以及可能的影响（姚洋，2018；余森杰等，2018；倪红福，2019），但整体而言，学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相关贸易政策经济影响的量化分析还比较缺乏。最近一部分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如崔连标等（2018）和刘元春（2018）分别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从定量层面揭示了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潜在影响；李春顶等（2018）基于贸易争端和贸易博弈的一般均衡理论建模，评估了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倪红福等（2018）测算关税的累积成本并模拟分析中美加征关税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总体上，现行关税体系对中国行业的价格影响大于美国。但中美加征关税，将使得美国的价格水平提高幅度大于中国，进而美国居民的福利损失总体上大于中国。Abiad（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所有关税威胁实施，在未来2~3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1%，美国将下降2%。魏浩等（2019）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郭晴和陈伟光（2019）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情况设置五种情景，运用动态CGE模型对加征关税采用冲击加权的办法来定量测算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中美两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CGE模型存在“黑箱”问题。吕越等（2019）文章利用联合国COMTRADE和TRAINS数据库与WITS-SMART模型，根据2018年中美两国公布的4月份初步清单和6月份实施清单，通过对贸易消减效应、福利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模拟，就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福利效应的变化进行考察，并通过比对两份清单，进一步讨论了中美两国在

贸易摩擦中的策略调整和特点。还有一部分学者分析了对单个产业产出和贸易的影响，如刘子飞等（2019）分析了对渔业的影响，方意等（2019）利用事件分析法量化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风险及跨市场之间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发现贸易摩擦在短期会造成中国各金融市场自身风险上升。

上述文献研究一方面要么采用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情景，要么采用最极端的贸易摩擦情况，与现实贸易摩擦情况相去甚远；另外一方面分析结果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且未考虑日益盛行的现代化全球生产模式影响。本文主要从量化分析视角出发，利用 Caliendo 和 Parro（2015）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反事实模拟，分析中美可能的全面经贸摩擦对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概述

本文主要利用 Caliendo 和 Parro（2015）提供的一般均衡分析工具，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不同行业加征关税的异质性如何，以及通过中间品贸易和产业关联产生的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采用纳入全球价值链特征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和关税税率数据，量化分析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利用基于一般均衡的反事实方法，探究中美加征关税带来的产业结构效应。

根据 Caliendo 和 Parro（2015）假定，世界是完全竞争市场，由 N 个国家组成（用 $n、h$ 来表示国家），每个国家有 J 部门且存在可以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 $j、i$ 表示部门），各国代表性消费者 L 同时也是劳动投入者，且每个代表性消费者拥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且劳动力可以跨部门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

家庭：国家 h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下，

$$u(C_n) = \prod_{j=1}^J C_n^j \alpha_n^j$$

(1)

每个家庭通过消费最终产品 C_n^j 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 α_n^j 表示来自 j 部门最终产品的份额，且 $\sum_j \alpha_n^j = 1$ ，也称为替代弹性。

生产：假设每个部门既生产中间品也生产最终产品，且采用迂回生产方式，根据产品用途将生产分为两步骤——中间品生产和复合中间品生产。其中，中间品生产需要利用劳动和复合中间品投入，用作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复合中间品生产只需要中间品的投入，可用作中间品的再生产或被最终消费。接下来，进一步界定二者的生产方式。

生产 1 中间品

一国 j 部门中间品生产，需要劳动 l_n^j 和复合中间品 $m_n^{i,j}$ 投入（ $m_n^{i,j}$ 表示来自于 i 部门用于 j 部门中间品生产的复合中间品），参照 Eaton 和 Kortum（2002）假定一国部门中间品连续统 $\omega^j \in [0, 1]$ 的效率 $z_n^j(\omega^j)$ 分布服从 Frechet 分布，中间品生产技术为，

$$q_n^j(\omega^j) = z_n^j(\omega^j) [l_n^j(\omega^j)]^{\gamma_n^j} \prod_{k=1}^J [m_n^{i,j}(\omega^j)]^{\gamma_n^{i,j}} \quad (2)$$

其中参数 $\gamma_n^{i,j}$ 来自于 i 部门用于 j 部门中间品生产的复合中间品的份额， γ_n^j 表示劳动投入的份额，也即增加值份额，且 $\sum_i \gamma_n^{i,j} + \gamma_n^j = 1$ 。根据（2），生产成本 c_n^j 为工资 w 和复合中间品价格 P_n^i 的投入簇，

$$c_n^j = j_n w_n^{\gamma_n^j} \prod_{i=1}^J P_n^i \gamma_n^{i,j} \quad (3)$$

其中 j_n 为一个固定常数。通过式（3）可以看到，中间品生产成本依赖于工资水平和所有投入复合中间品的价格（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同时中间品成本也是单位价格，也将影响下一阶段复合中间品生产的投入价格。因此，关税变化可能导致的复合中间品价格的变化，将作为投入，通过生产关联和中间品投入传导到所有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当中，对实际工资等福利效应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也是引入“中间品贸易”和“产业关联”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与单国多部门或多国单部门模型的重要区别。

生产 2 复合中间品

一国 j 部门复合中间品生产需要中间品投入，复合中间品生产技术为 Dixit 和 Stiglitz（1977）的聚合器，

$$Q_n^j = \left[\int r_n^j(\omega^j)^{1-1/\sigma^j} d\omega^j \right]^{\sigma^j/(\sigma^j-1)} \quad (4)$$

σ^j 为部门 j 内不同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r_n^j 为来自于最低成本供应商提供中间品 ω^j 的需求，且

$$r_n^j(\omega^j) = \left(\frac{p_n^j(\omega^j)}{P_n^j} \right)^{-\sigma^j} Q_n^j \quad (5)$$

P_n^j 为复合中间品的价格，可以表示为最低价格 p_n^j 中间品 ω^j 的聚合函数，

$$P_n^j = \left[\int p_n^j(\omega^j)^{1-\sigma^j} d\omega^j \right]^{1/(1-\sigma^j)} \quad (6)$$

开放条件下：引入 Samuelson（1954）冰山成本和从价固定关税税率，可得到 n 到 h 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函数 d_{nh}^j 为，

$$d_{nh}^j = \tilde{\tau}_{nh}^j d_{nh}^j \quad (7)$$

其中 d_{nh}^j 为冰山成本， $\tilde{\tau}_{nh}^j$ 为从价固定关税税率。因此开放条件下，中间品 ω^j 价格 p_n^j 为来自 h 国可贸易中间品的最低价格的函数，即为，

$$p_n^j(\omega^j) = \min_h \left\{ \frac{c_{nh}^j}{z_h^j(\omega^j)} \right\} \quad (8)$$

根据生产效率的 Frechet 分布特征，结合式 (6)，复合中间品的价格 P_n^j 可以表示为 Frechet 分布位置参数 λ_h^j 和以及形状参数 θ^j 的函数，

$$P_n^j = A^j \left[\sum_{h=1}^N \lambda_h^j (c_{hnh}^j)^{-\theta^j} \right]^{-1/\theta^j} \tag{9}$$

其中 A^j 为固定常数。位置参数 λ_h^j 随国家和行业发生变化，更大的 λ_h^j 意味着行业的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即绝对优势的概念；形状参数 θ^j 随行业发生变化，更小的 θ^j 意味着生产效率更高的离散度，即比较优势的概念。

根据式 (9)， n 国 j 部门的总支出为 $X_n^j = P_n^j Q_n^j$ ， n 国 j 部门对来源于 h 国商品的总支出为 X_{nh}^j 。根据 Frechet 分布的性质， n 国 j 部门对 h 国商品的支出份额 π_{nh}^j 为技术、价格和贸易成本的函数，

$$\pi_{nh}^j = X_{nh}^j / X_n^j = \frac{\lambda_h^j [c_{hnh}^j]^{-\theta^j}}{\sum_{h=1}^N \lambda_h^j [c_{hnh}^j]^{-\theta^j}} \tag{10}$$

可以发现，一方面双边关税的变化将通过贸易成本直接影响双边贸易份额；另一方面，关税的变化也将通过中间品投入产出关联作用于生产成本而间接影响双边贸易份额。间接效应的估计则需要基于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强度的计算，这依赖于投入产出表。

在支出端， n 国 j 部门的总支出包括企业对复合中间品的支出以及家庭支出，即

$$X_n^j = \sum_{i=1}^J \gamma_n^{j,i} \sum_{h=1}^N X_h^i \frac{\pi_{hn}^i}{1 + \tau_{hn}^i} + \alpha_n^j I_n \tag{11}$$

家庭总支出等于家庭总收入 I_n ，为劳动收入 $w_n L_n$ ，关税收入 R_n 以及贸易盈余 D_n 的总和，

$$I_n = w_n L_n + R_n + D_n \tag{12}$$

其中 $R_n = \sum_{j=1}^J \sum_{h=1}^N \tau_{nh}^j M_{nh}^j$ ， M_{nh}^j 为 n 国 j 部门从 h 国的进口，可表示为 n 国 j 部门对 h 国关税平滑后的支出份额，同样，出口 E_{nh}^j 也可以表示为 h 国 j 部门对 n 国关税平滑后的支出份额，在国家层面， D_n 是外生，贸易平衡条件为，

$$\sum_{j=1}^J \sum_{h=1}^N X_n^j \frac{\pi_{nh}^j}{1 + \tau_{nh}^j} - D_n = \sum_{j=1}^J \sum_{h=1}^N X_h^j \frac{\pi_{hn}^j}{1 + \tau_{hn}^j} \tag{13}$$

定义均衡 1：给定 L_n ， D_n ， λ_h^j 及 d_{nh}^j ，关税结构 τ 下工资水平和价格的均衡满足均衡条件 (3)，(9)，(10)，(11) 和 (13) 下的均衡。

定义均衡 2：定义相对变化的均衡。在关税结构 $\hat{\tau}$ 变动下，工资水平和价格变化的均衡，满足以下均衡条件下的均衡：

$$\hat{c}_n^j = \hat{w}_n^{\gamma_n^j} \prod_{i=1}^J \hat{P}_n^i \gamma_n^{i,j} \tag{14}$$

$$\hat{P}_n^j = \left[\sum_{h=1}^N \pi_{nh}^j (\gamma_{nh}^j \hat{c}_h^j)^{-\theta^j} \right]^{-1/\theta^j} \tag{15}$$

$$\hat{\pi}_{nh}^j = \left[\frac{\hat{c}_{nh}^j}{\hat{P}_n^j} \right]^{-\theta_j} \quad (16)$$

$$X_n^{j'} = \sum_{i=1}^J \gamma_n^{i,j} \sum_{h=1}^N \frac{\pi_{nh}^{i'}}{1 + \tau_{hn}^{i'}} X_h^{i'} + \alpha_n^j I_n' \quad (17)$$

$$\sum_{j=1}^J \sum_{h=1}^N X_n^j \frac{\pi_{nh}^{j'}}{1 + \tau_{hn}^{j'}} - D_n = \sum_{j=1}^J \sum_{h=1}^N \frac{\pi_{hn}^{j'}}{1 + \tau_{hn}^{j'}} X_h^{j'} \quad (18)$$

根据定义的均衡 2，关税结构 τ 变动将带来贸易成本 $\hat{K}_{nh}^j$ 的变化，贸易摩擦将通过关税的变化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主要通过两个路径：一是根据第 (15) 式，关税变化将带来进口价格 ($\hat{P}_n^j$) 的变化，从而影响成本 ($\hat{c}_n^j$) (第 (14) 式)，进而通过进口价格 ($\hat{P}_n^j$) 和成本 ($\hat{c}_n^j$) 以及关税变化 ($\hat{K}_{nh}^j$) 影响单个行业上的双边贸易份额 $\hat{\pi}_{nh}^j$ (第 (16) 式)，带来单个行业 j 的支出 ($X_n^{j'}$) 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第 (17) 式)；二是非常直观的路径，关税变化带来新的关税结构 ($1 + \tau_{hn}^{j'}$)，直接影响支出 ($X_n^{j'}$) 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在各国多部门层面，由于不同国家部门关税变化的幅度不同，因此所引发的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变化也不同，每个部门对贸易总体变化的贡献取决于部门贸易盈余以及进出口价格，国家整体为所有部门变化的加总。同样，关税变化导致需求和贸易量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产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部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中间品贸易和产业关联使得与出口部门上下游关联的非出口行业 (如服务业) 的产出也受到影响，进而导致整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

三、中美贸易摩擦结构效应的反事实分析

本节主要估计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对中国和美国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本文估计模型中，以最大化估计样本中涵盖国家数量为目的，尽量收集到可用的相关关税和贸易流量数据。最终，本文以 2014 年为基年，选定一个涵盖 44 个国家和地区 (43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个构建的世界其他经济体)，56 个行业 (23 个可贸易行业以及 33 个非贸易行业) 的基础样本。基于此，量化分析中美全面贸易摩擦下的产业结构效应，即两国对全部进口商品都加征 25% 关税情形下的中美两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效应。

(一) 主要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包括行业层面双边关税 (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的 TRAINS 数据库，ISIC Rev. 3)、双边贸易流量 (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的 COMTRADE 数据库，HS 6 位编

码)、全球投入产出表 (WIOTs, 2016 年发布, 来源于 WIOD 数据库)、增加值和总产出 (均来源于 WIOD)。目前可选的世界投入产出表非常多, WIOD 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囊括了本项目研究的最新年份 2014 年。受数据可得性限制, 本文主要基于 2014 年的数据作为基础模型。本文主要关注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带来的福利效应变化, 是一个百分比概念。因此, 采用 2014 年基础数据对结论影响并不大, 结果具有可信性。值得强调的是, 本文所使用的关税数据不仅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多边下最惠国关税, 同时也囊括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特惠关税安排, 这使得本文相比于过去单纯使用最惠国关税数据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在关税数据处理及匹配上, 本文采用以下步骤: 首先, 将来自 2014 年的 TRAINS 数据库双边行业关税 (2 分位 ISIC Rev. 3 方法分类, 96 个行业) 缺失数据根据 2013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补齐; 其次, 以 43 个国家和经济体进口份额为权重, 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各国与世界整体双边层面关税, 并作为一个构建的世界其他经济体 (作为一个整体) 的关税水平; 再次, 将来自 TRAINS 数据库行业 (2 分位 ISIC Rev. 3 方法分类, 96 个行业) 与 WIOD 数据库行业 (2 分位 ISIC Rev. 4 方法分类, 23 个可贸易行业) 根据 ISIC Rev. 3 与 ISIC Rev. 4 分类进行对照, 生成匹配表; 第四, 根据匹配表, 以行业进口份额为权重, 得到 44 个国家和地区 (43 个国家和地区及一个构建的世界其他经济体) 以 WIOD 数据库行业分类的 23 个可贸易行业双边关税。

(二) 模拟策略

根据相对变化的均衡定义, 执行关税变化的量化分析只需要关税结构 τ 以及变化 $\hat{\tau}$, 双边贸易份额 π_{nh}^j , 增加值份额 γ_n^j , 中间品份额 $\gamma_n^{i,j}$ 以及生产率离散参数 θ^j , 其中 α_n^j 可以结合产出和以上数据得到。根据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定义关税变化的均衡, 通过 5 步法求解均衡, 进而得到均衡的产出: 设定任一工资向量变化, 根据成本和价格函数, 求得每一部门和国家的价格及成本向量变化; 根据基期贸易份额和估计弹性, 求解报告期贸易份额; 求解总支出; 已求出变量代入贸易平衡条件并检验; 若不平衡, 调整工资向量变化, 重复之前步骤, 直到得到贸易平衡条件为止。

(三) 中美全面贸易摩擦的出口结构效应

表 1 展示了中美加征关税前后两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估计了中美都征收 25% 关税的情形, 可以发现, 整体而言中美两国出口结构呈现小幅变化。在出口集中度的影响上, 一个典型特征是中国出口集中度下降, 而美国的变化不大。中国的赫芬达尔指数由加征关税前的 0.091 下降到 0.081, 出口集中度下降。这是由于传统出口优势行业在贸易摩擦

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在加征关税前，中国出口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光学产品行业和纺织服装皮革行业，两个行业出口占到总出口的 42.5%。加征关税后，电子光学产品行业和纺织服装皮革行业的出口比重有所下降，由 27.41%、15.09% 分别下降到 27.21% 和 14.04%，下降了 0.20% 和 1.05%，对中国服装纺织皮革行业的负面冲击较大，而其他行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对美国而言，由于中国是美国农产品进口大国，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关税对美国农业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美国作物牲畜生产产业的出口份额由 4.55% 下降到 3.98%，下降了 0.57%。与作物牲畜生产密切相关的食品饮料烟草行业的出口结构也下降，由 7.14% 下降到 6.65%，下降了 0.49%。由于加征关税，中国相应行业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影响减弱，美国化学制品、医药产品制剂、橡胶塑料制品、非金属和金属制品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如电子光学产品行业）的出口份额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同时，采矿和采石业以及焦炭精炼石油行业的出口份额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表 1 贸易摩擦前后出口结构变化 单位：%

行业部门	中国贸易摩擦前 (1)	中国贸易摩擦后 (2)	美国贸易摩擦前 (3)	美国贸易摩擦后 (4)
作物牲畜生产	0.72	0.69	4.55	3.98
林业与伐木业	0.01	0.00	0.32	0.33
渔业与水产业	0.06	0.07	0.19	0.21
采矿和采石	0.62	0.67	3.77	4.02
食品饮料烟草	2.90	2.84	7.14	6.65
纺织服装皮革	15.09	14.04	1.12	1.11
木材草编制品	0.91	0.98	0.56	0.57
纸及纸制品	0.62	0.64	2.14	2.31
媒介物印制	0.19	0.20	0.41	0.43
焦炭精炼石油	1.38	1.88	10.80	11.16
化学制品	4.82	4.86	10.32	10.37
医药产品制剂	1.01	1.05	3.65	3.86
橡胶塑料制品	3.02	3.04	2.68	2.79
非金属制品	2.37	2.48	0.94	1.00
基本金属	4.29	4.60	2.70	2.98
金属制品	4.19	4.23	3.74	3.94

续表 1

行业部门	中国贸易摩擦前 (1)	中国贸易摩擦后 (2)	美国贸易摩擦前 (3)	美国贸易摩擦后 (4)
电子光学产品	27.41	27.21	9.55	9.79
电力设备	10.80	11.15	2.73	2.78
机械设备	9.22	9.29	9.39	9.11
汽车及挂车	2.97	2.92	8.77	8.81
其他运输设备	2.62	2.70	11.44	10.68
家具其他制造	4.79	4.45	3.09	3.12
机械修理	0.00	0.00	0.00	0.00
赫芬达尔指数 (HH)	0.091	0.081	0.034	0.03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以上是根据模型反事实模拟的结果。由于中美加征关税后，2019 年的中美进出口数据已经可获得，这里采用 2019 年中美实际进出口统计数据，与本文的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和验证。从表 2 的分行业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杂项制品、机械、纺织品服装、化工五大行业部门，其中电子产品行业贡献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总额的近 40%。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 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下降了 874 亿美元，相比 2018 年降幅达 16%。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出口 167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杂项制品行业出口 63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机械行业出口 5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纺织品服装行业出口 4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9%；化工行业出口 34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此外，矿业、交通运输业、鞋业、林业、农业以及能源相关行业对美出口金额均出现程度不等的下降。由于不同细分行业对美出口下降不同，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电子产品行业的出口占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的比重从 2014—2018 年的 40% 下降到 2019 年的 37%，下降了 3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这表明中国输美商品正在逐渐被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挤出美国市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9 年美国主要行业的进口金额仍然保持不同程度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出口金额较大的电子行业、机械行业、交通行业、纺织品服装行业以及化工行业等部门，2019 年美国进口均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说明美国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美国国内生产，而只是将原来从中国的进口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将对华贸易逆差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例如，电子、机械、交通设备以及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主要转向墨西哥、加拿大、欧盟、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进口，纺织品服装以及制鞋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则向印度、越南、

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

表 2 2014—2019 年中国对美国分行业出口的金额与结构

单位：百万美元，%

行业部门	2014—2018		2019	
	金额	份额	金额	占比
电子产品	971871	40	167480	37
杂项制成品	344350	14	63227	14
机械产品	259449	11	50583	11
纺织品服装	233288	9	42898	10
化工产品	166500	7	34089	8
其他产品	483734	20	93966	21
合计	2459192	100	452243	100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库（USITC DataWeb），访问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

（四）中美全面贸易摩擦下的产业结构效应

1. 三大产业结构效应。表 3 显示了中美两国对所有双边进口商品征收 25%关税前后产生的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其中（1）至（6）列表示初级产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和采掘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三大产业产出值的结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中美都是经济大国，产出规模非常大，出口对 GDP 的贡献份额较小。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征收 25%的关税，我们是在一个包含世界其他国家在内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中分析问题，存在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因此对两国各个产业以及整体产业而言，中美加征关税对两国的产出结构效应变化影响幅度比较小，但就体量而言，这种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可以看到，加征关税对两国产业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且具有一定差异性。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减少，而初级产业和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其中，制造业产业产出占比由 49.75%减至 49.34%，减少了 0.41%，美国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国，加征关税会减少中国制造业的对美出口，在其他国家无法消化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份额会下降；初级产业产出占比由 9.13%增至 9.23%，增加了 0.1%，可能是由于中国在贸易摩擦前进口了大量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会导致进口农产品减少，国内的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填补进口缺口，造成农产品产出份额相对增加；加征关税未直接影响到服务业产出，服务业的产出份额由 41.12%增至 41.43%，增加

0.31%，制造业产出份额的减少会导致服务业产出相对增加，但事实上，在全球生产分工背景下，服务业是制造业中间品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受制造业影响，一部分服务业的产出也会受到相应影响，从服务业分行业的产出份额可以看到这一点。对于美国而言，初级产业产出份额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其中，初级产业产出份额由 3.73%降至 3.69%，下降了 0.04%，主要是由于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需求减少，产出相对减少；制造业由 19.99%增至 20.01%，增加了 0.02%；服务业由 76.28%增至 76.30%，增加了 0.02%。制造业和服业产出份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初级产业的产出减少而导致两个行业产出份额的相对增加。

表 3 的第（一）至（六）列分别表示三大产业增加值衡量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与产出衡量的份额情况大致一致。中国制造业下降 0.40%，初级产业和服务业增加 0.05%和 0.35%；美国初级产业下降 0.07%，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增加 0.04%和 0.03%。

表 3 中美贸易摩擦产业结构效应 单位：%

产业	中国			美国		
	贸易摩擦前 (1)	贸易摩擦后 (2)	变动 (3)	贸易摩擦前 (4)	贸易摩擦后 (5)	变动 (6)
初级产业	9.13	9.23	0.10	3.73	3.69	-0.04
制造业	49.75	49.34	-0.41	19.99	20.01	0.02
服务业	41.12	41.43	0.31	76.28	76.30	0.0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级产业	14.92	14.97	0.05	3.84	3.77	-0.07
制造业	29.38	28.98	-0.40	12.18	12.22	0.04
服务业	55.70	56.05	0.35	83.98	84.01	0.0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计算而得，下表同。

2. 产业内部结构变化。表 4 至表 6 分别显示了中美两国对所有双边进口商品征收 25%关税前后产生的两国细分行业以产出衡量的产业结构变化。由表 4 可以看到，中国所有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都有所增加，而美国所有初级产业均下降。在中国细分行业内部，采矿和采石行业增加 0.068%，作物牲畜生产排名第二，产出份额增加 0.025%，渔业和林业分别增加 0.003%和 0.001%；在美国细分行业内部，采矿和采石业减少最多，减少 0.03%，其次是作物牲畜生产行业，减少 0.013%，渔业和林业分别减少 0.001%和 0.002%。

表 4 初级产业内部结构变动

单位：%

产业	中国			美国		
	贸易摩擦前 (1)	贸易摩擦后 (2)	变动 (3)	贸易摩擦前 (4)	贸易摩擦后 (5)	变动 (6)
作物牲畜生产	4.405	4.430	0.025	1.406	1.393	-0.013
林业与伐木业	0.342	0.343	0.001	0.106	0.105	-0.002
渔业与水产业	0.523	0.526	0.003	0.065	0.064	-0.001
采矿和采石	3.862	3.929	0.068	2.154	2.124	-0.030

注：表格中如存在加征前后差额与变动值不相等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表 5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

单位：%

产业	中国			美国		
	贸易摩擦前 (1)	贸易摩擦后 (2)	变动 (3)	贸易摩擦前 (4)	贸易摩擦后 (5)	变动 (6)
食品饮料烟草	5.703	5.723	0.020	3.122	3.119	-0.003
纺织服装皮革	3.947	3.825	-0.122	0.293	0.293	0.000
木材草编制品	1.265	1.263	-0.002	0.316	0.317	0.002
纸及纸制品	0.716	0.712	-0.003	0.626	0.629	0.003
媒介物印制	0.376	0.379	0.003	0.276	0.276	0.000
焦炭精炼石油	2.703	2.762	0.059	2.644	2.590	-0.055
化学制品	4.253	4.227	-0.025	1.920	1.914	-0.007
医药产品制剂	0.961	0.968	0.007	0.688	0.683	-0.005
橡胶塑料制品	1.668	1.652	-0.016	0.743	0.750	0.007
非金属制品	2.822	2.838	0.016	0.375	0.379	0.005
基本金属	5.686	5.653	-0.033	0.908	0.921	0.013
金属制品	2.017	2.006	-0.010	1.219	1.233	0.013
电子光学产品	4.914	4.670	-0.244	1.241	1.323	0.082
电力设备	3.314	3.269	-0.045	0.404	0.432	0.028
机械设备	3.710	3.680	-0.030	1.297	1.299	0.002
汽车及挂车	3.929	3.957	0.028	1.922	1.884	-0.038
其他运输设备	1.209	1.246	0.037	1.107	1.049	-0.058
家具其他制造	0.555	0.510	-0.045	0.769	0.797	0.028
机械修理	0.000	0.000	0.000	0.122	0.122	0.000

注：表格中如存在加征前后差额与变动值不相等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在制造业内部，表 5 可以看到，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大部分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均下降，其中电子光学产品和纺织服装皮革两个中国传统出口优势行业分别下降 0.244% 和 0.122%，下降幅度分列第一和第二位；电力设备和家具制造业均下降 0.045%，并列第三位。我们看到，除了汽车及挂车制造业产出份额略有提升之外，高端制造业的产出份额都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大部分行业保持了与美国总体制造业产出份额一致的上升趋势，其中电子光学产品的产出份额上升幅度最大，达到 0.082%，其次为电力设备，上升 0.028%，但同时还有一部分行业的产出份额变化与总体趋势相反，如焦炭精炼石油行业产出份额受加征关税影响下降 0.055%，其他运输设备与汽车及挂车产出份额分别下降 0.058% 和 0.038%。

在服务业内部，中国服务业分行业产出份额的变化并没有随着制造业产出份额下降而下降，反而呈现共同上升的趋势，且服务业内部行业的表现差异较大。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上升幅度较小，食宿等消费性服务业上升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本文模型纳入了中间品生产和产业关联，受关税冲击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出份额减少会导致相应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减少，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的幅度少于消费性服务业增加的幅度。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研究与发展服务业位于价值链前端环节，其产出份额下降了 0.001%。对美国而言，虽然美国总体服务业产出份额上升，但水上运输等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份额下降，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关联的强联系会导致关税影响传导到服务业，从而对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表 6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 单位：%

产业	中国			美国		
	贸易摩擦前 (1)	贸易摩擦后 (2)	变动 (3)	贸易摩擦前 (4)	贸易摩擦后 (5)	变动 (6)
电、煤供应	3.219	3.225	0.006	1.305	1.306	0.001
集水与水供应	0.110	0.111	0.001	0.045	0.045	0.000
污水、材料处理及回收	0.130	0.131	0.001	0.331	0.330	-0.001
建筑业	9.658	9.734	0.076	3.890	3.896	0.006
汽车销售修理	0.000	0.000	0.000	1.212	1.213	0.001
批发贸易	4.366	4.402	0.036	5.094	5.085	-0.009
零售贸易	0.903	0.911	0.008	4.194	4.201	0.007
陆路及管道运输	1.871	1.885	0.014	1.651	1.648	-0.003
水上运输	0.451	0.459	0.007	0.204	0.203	-0.001

续表 6

产业	中国			美国		
	贸易摩擦前 (1)	贸易摩擦后 (2)	变动 (3)	贸易摩擦前 (4)	贸易摩擦后 (5)	变动 (6)
航空运输	0.267	0.276	0.008	0.610	0.605	-0.004
运输储藏及辅助	0.535	0.538	0.003	0.632	0.631	-0.001
邮政和邮递活动	0.098	0.099	0.001	0.356	0.355	-0.001
食宿服务活动	1.687	1.701	0.014	2.884	2.888	0.004
出版活动	0.000	0.000	0.000	1.068	1.068	0.000
电影电视出版	0.000	0.000	0.000	1.044	1.044	0.000
电信	1.049	1.057	0.008	2.098	2.100	0.001
计算机及信息服务	0.515	0.523	0.007	1.812	1.810	-0.001
金融服务	2.448	2.457	0.009	2.277	2.275	-0.001
保险服务	0.409	0.413	0.005	3.224	3.223	-0.001
金融保险及附属服务	0.000	0.000	0.000	1.548	1.548	0.000
房地产	2.223	2.240	0.016	8.975	8.988	0.013
法律会计管理咨询	1.915	1.937	0.023	3.669	3.662	-0.007
建筑工程技术测试	0.000	0.000	0.000	1.441	1.440	-0.001
科学研究与发展	0.268	0.268	-0.001	0.777	0.776	-0.001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	0.000	0.000	0.000	0.782	0.781	-0.001
其他专业技术和兽医	0.947	0.950	0.003	0.255	0.255	0.000
行政和辅助活动	0.303	0.307	0.004	3.509	3.502	-0.007
公共管理与国防	2.430	2.449	0.018	11.109	11.126	0.017
教育	1.930	1.945	0.015	1.034	1.035	0.001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1.738	1.751	0.013	6.744	6.756	0.012
艺术及其他服务	1.648	1.663	0.015	2.437	2.439	0.003
家庭自用物品生产服务	0.000	0.000	0.000	0.067	0.067	0.000
国际组织和机构活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格中如存在加征前后差额与变动值不相等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聚焦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对中美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影响的量化分析，利用贸易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反事实模拟量化，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跨行业加征关税带

来的两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传统出口优势行业负面冲击比较大，中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两个行业电子光学产品行业和纺织服装皮革行业的出口份额下降幅度较大，美国农业的出口份额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出口集中度下降，而美国的变化不大。第二，中美全面贸易摩擦将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减少，而初级产业和服务业产出份额增加；美国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增加。在细分行业层面，中国所有初级产业的产出份额都有所增加，而美国所有初级产业均下降；中国大部分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均下降，其中电子光学产品、纺织服装等传统出口优势行业下降幅度较大，美国的情况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大部分行业保持了与美国总体制造业产出份额一致的上升趋势；虽然服务业未直接受到关税冲击，但受关税冲击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出份额的减少会导致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出份额减少。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冲击很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和本土化进一步加速。我们要增强战略定力、战略自信，紧紧围绕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定部署和节奏，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一）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

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和挑战。要清醒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速胜论”和“必胜论”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必须稳扎稳打，灵活应对，转危为机。“关税贸易战”对于两国福利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如果发生全面贸易战，中美完全脱钩，不仅会伤害中国，更会伤害美国，甚至会波及其他更多国家，故而贸易摩擦的最优解还是应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坚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化解贸易摩擦。同时，我们要继续实施“韬光养晦”战略，把精力用于补齐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短板。

（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偏差、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时滞，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必要性。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既有制约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在制约因素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传导机制受损；二是企业利润减少和外商在中国投资布局减缓；三是高新科技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并购受到抑制。在促进因素上，同样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优化进

出口商品结构；二是竞争力更强的大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重视和发展；三是对内挖掘国内市场，对外加强与第三方国家的贸易，降低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因此，要牢牢把握制造业发展这个根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要方向，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积极培育国内产业链，发展区域价值链

世界产品的产业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边缘国家主动嵌入到这些核心产业链，并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被迫调整，疫情将进一步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降低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全球价值链呈缩短趋势，而区域价值链则在加强。中国也应顺应这一趋势，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形成区域价值链。积极培育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从事研发、销售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自然会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和配置。这既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又为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腾出了产业发展的市场和增长空间。

（四）积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既要认识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产业链存在的优势，应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三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四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五）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实施全球供应链国家战略

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营造优良科研与创新文化氛围，推动形成优良创新生态，强化创新自信；以国家战略发展为核心，选准研发攻关方向，实现动态优化布局，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财税金融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资金资助

基础研究，多途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坚持自主创新，攻克核心技术难关，弥补高科技领域的短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推动中国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推动中国产业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进一步推动制定中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构建能够承受外部冲击并从中迅速恢复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形成中国供应链国家战略的主要框架结构和区域布局，突破重点，保持中国产业链的完备性。

（六）扩大开放水平，统筹国际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发展的战略环境，过去中国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制造业出口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国际市场方面，政府要为企业拓展业务提供更多的政策便利。相关部门要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政策引导与信息咨询，提供更多的购汇政策便利，建立出口风险担保基金。要进一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畅通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通道，以更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有效对冲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国内市场方面，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侧同时精准发力。在供给侧，一要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二要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在需求侧，一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二是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三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投资和消费。总而言之，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依托国内和国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及资源要素，积极推动以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相互兼容并充分体现“以我为主”的主场全球化。

参考文献：

1. 姚洋：《中美经贸和战略关系转变 持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中国外资》2018 年第 4 期。
2. 余森杰、金洋、刘亚琳：《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3. 倪红福：《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审计研究》2019 年第 3 期。
4. 崔连标、朱磊、宋马林等：《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财经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5. 刘元春：《中美贸易摩擦的现实影响与前景探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的经验分析》，

《人民论坛》2018年第16期。

6.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7. 倪红福、龚六堂、陈湘杰：《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8期。

8. 魏浩、连慧君、巫俊：《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统计研究》2019年第8期。

9. 郭晴、陈伟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5期。

10. 吕越、娄承蓉、杜映昕等：《基于中美双方征税清单的贸易摩擦影响效应分析》，《财经研究》2019年第2期。

11. 刘子飞、岳冬冬、孙慧武等：《中美贸易摩擦对渔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江苏农业科学》2019年第3期。

12. 方意、和文佳、荆中博：《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财贸经济》2019年第6期。

13. Abiad A. The Impact of Trade Conflict on Developing Asia. 2018.

14. Caliendo L, & Parro F.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 (1): 1-44.

15. Eaton J, &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2002, 70 (5): 1741-1779.

16. 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87-389.

责任编辑：郭 霞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 政策框架、政府职能与启示*

尹振涛 范云朋 费 洋

摘要：随着互联网金融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韩国政府将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韩国“监管沙盒”形成了由流程设计、组织架构、准入标准、评估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退出机制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体系，韩国政府也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给予支持。我国可在充分借鉴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明确准入制度，评估反馈机制、退出机制与风险补偿制度，培育“监管沙盒”协同发展生态圈，提升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韩国 监管沙盒 金融科技 金融监管

作者简介：尹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范云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

费 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金融硕士研究生。

金融科技带来新一轮金融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类新技术不断涌现并投入使用，但同时也引发诸多新型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新挑战。从国际视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研究》（13AJY018）、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调研》（GQZD2020006）、国家电网公司管理咨询项目《建设国家电网公司统一票据池体系、支撑线上产业链金融发展的研究》（81580019000S）的研究成果。

角来看，英国于 2015 年首创“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机制，设立创新中心并开启沙盒项目申请，其目的是强化英国作为欧洲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并提升英国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话语权。随后，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加拿大、韩国、泰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基于不同的原则、目的和利益诉求，设置了“监管沙盒”机制，并颁布相关指南用于指导实践。总体而言，“监管沙盒”是金融监管部门在为促进金融创新所设立的专门机构和部门中制定的特殊管理机制，旨在为金融机构和为金融服务提供相应支撑的非金融机构测试金融创新，提供一个时间和范围有限的“安全空间”，在此空间内企业可享受一定的监管豁免，如果测试效果得到认可，测试完成后可进行大范围推广。韩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走势与我国类似，而且注重发展金融科技产业，因此通过韩国“监管沙盒”机制的内容和模式，总结其阶段性经验，有助于为我国探索建立“监管沙盒”制度提供借鉴。

一、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发展背景

（一）韩国金融科技发展概况

随着金融科技的深入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不断涌现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科技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相较于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举措的欧美国家而言，韩国金融科技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举措，各类金融市场微观主体也在积极进行创新试验。为了更好地支持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并对其进行管理，韩国成立金融科技中心（FinTech Center），整合金融企业、信息通信技术公司、行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资源和能力，为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一站式支持。随着韩国国内大型移动通信公司纷纷与银行类金融机构、信用卡公司建立联系并为顾客推出新型服务，专注于电子汇款和互联网支付的金融科技服务开始陆续出现，金融科技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从业务范围来看，目前韩国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所涉及领域更加广泛。2020 年 4 月，韩国互联网振兴院（KISA）、韩国金融科技支持中心（Fintech Portal）与韩国金融科技产业协会（KORFIN）共同发布《2019 年韩国金融科技企业手册》。根据该手册统计，2014 年以来加入韩国金融科技产业协会的公司逐年增加，手册包含了参与相关调查的 345 家金融科技公司信息，涵盖移动支付、点对点（P2P）业务和虚拟货币等多个服务领域，其中提供便捷汇款与支付结算服务的企业数量最多，共 83 家。

（二）韩国金融监管制度分析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金融监管体系一直实行多元化的分业监管制度，一方面给予韩国金融市场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促使韩国金融产业迅速成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监管空白、金融乱象和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政府也开始着手变革金融监管制度，并逐渐形成了现行的综合金融监管体系。

从总体框架来看，韩国金融监管体系由综合金融监管机构与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两部分共同组成，相关机构服务于综合机构，并与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综合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金融监管委员会和其直接下辖管理的金融监管院两部分，由国务院直属的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作为监管体系的核心，负责韩国金融市场及监管体系的政策制定及执行。金融监管委员会与金融监管院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关键，二者共同推动了韩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开展；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则包括韩国银行、企划财政部及存款保险公司，分别负责国内货币政策制定与金融市场维稳，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以及金融机构保险统一管理监督等工作（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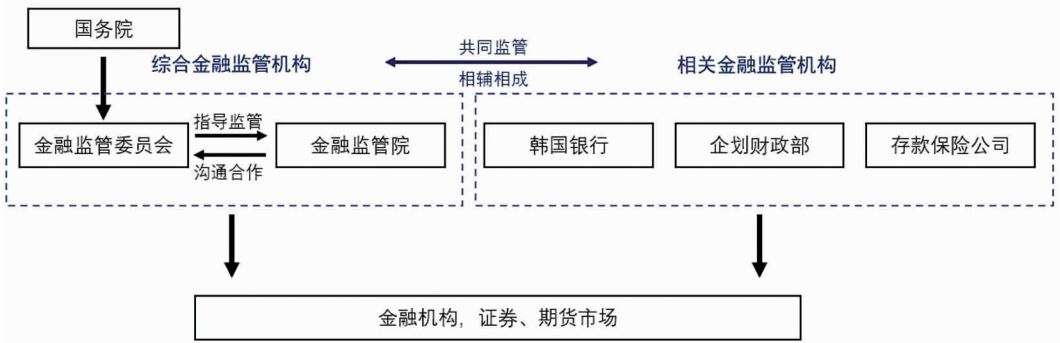


图 1 韩国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三）韩国“监管沙盒”制度的提出

在数字化转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随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深化，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步速脱节”问题尤为突出，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由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简称 FSC）提出，并在 FSC 下设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对参与沙盒测试的金融企业进行管理，申请测试的金融企业通过审核后进入两年的测试期，在此期间企业的相关业务将得

到某些监管豁免。“监管沙盒”机制设立运行的意义和功能主要表现为四点：第一，通过设立安全空间，为金融创新服务和产品提供模拟监管环境，测试其潜在风险和收益，有助于减少金融创新投入市场的时间和潜在的合规监管成本。第二，创新产品通过“监管沙盒”测试并进入市场，可以保证安全性，并从源头避免金融风险和“伪”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改变前期互联网金融乱象和专项整治的“治乱循环”困境，解决监管者的担忧。第三，通过“监管沙盒”测试的创新企业和创业者，其创新产品会更易获得投资者的信赖和投融资的追逐。第四，“监管沙盒”同传统金融监管机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强调监管者和市场之间的互动，监管机构和测试企业之间的关系不限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者的关系，共同设计机制和迭代产品，提升消费者保护水平，这也是金融创新企业提交测试申请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未来监管的重要趋势。

二、韩国“监管沙盒”的基本框架与机制设计

（一）韩国“监管沙盒”发展历程

随着韩国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加速，政界、业界和学界等各界人士提出希望给予金融科技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2017年1月5日，FSC发布《2017年金融政策指引》（Financial Policy Direction for 2017），首次提出将于2017年年中开展“监管沙盒”机制试点；2018年1月15日，FSC在《2018年金融政策路线图》（Financial Policy Roadmap for 2018）中再次重申，将继续推进“监管沙盒”项目，并开放了参与测试企业的初步申请；2018年12月31日，韩国国会正式公布《金融创新支援特别法》（Financial Innovation Support Act，以下简称《金融创新法》），并决定2019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金融创新法》第三条规定“本法优先于金融法”，明确了该法的法律效力，同时又通过多个章节为韩国“监管沙盒”制度构建了健全的管理流程规范。法案颁布时，FSC就已收到105份申请，经过严格审核最终有19个金融创新服务项目入围，“监管沙盒”运行基本步入正轨。

（二）韩国“监管沙盒”机制构成

1. 监管主体

依据《金融创新法》及该法的执行法令，“监管沙盒”相关工作的实施由FSC负责。FSC成立于2008年，其前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满足金融监管需要而成立的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与财政和经济部下属的金融政策局。FSC作为负责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中央政府机构，拥有起草和修订金融法律法规，监管检查金融机构，向金融机构颁发监管许

可及批准的职权。目前 FSC 的发展目标主要有四点：制定金融政策，监管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促进韩国金融业发展。

2. 监管对象

(1) “创新金融服务”和“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金融创新法》第二条提出了“创新金融服务”与“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两个新概念。其中，“创新金融服务”指“在开展金融服务或相关业务过程中所提供的与现有金融服务内容、方法和形式有所区别的服务”；“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则指“已经申请创新金融服务，并提供了金融服务委员会所指定的创新金融服务的金融公司”。通俗理解，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是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并且不论是创新金融服务还是金融机构都必须得到牌照或监管机构的认可。这两个新概念的提出，一是明确了韩国“监管沙盒”机制的监管对象为“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二是明确了监管内容是“创新金融服务”。

(2) 提供服务的金融公司范围。《金融创新法》对“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概念中的“金融公司”的范围做出了一定约束。依据该法第二条，“金融公司”范围包括：根据《银行法》获得认可的银行，符合《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业务法》的金融投资者和综合金融公司，符合《保险业务法》的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共同储蓄银行法》规定的共同储蓄银行，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金融控股公司，《韩国开发银行法》规定的韩国开发银行，《小型企业银行法》规定的中小型企业银行，以及符合《韩国进出口银行法》的韩国进出口银行等。

(3) 创新金融服务指定标准。依据《金融创新法》第十六条规定，创新金融服务的提供应当至少符合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现行金融法律或法规中没有适用于创新金融服务的标准和要求，或者相关法规不适用于该创新金融服务；不确定是否有相关法律允许运行创新金融服务的情况。同时，依据《金融创新法》中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经相关金融机构同意，FSC 作为具有行政权利的机构，可在两年内指定创新金融服务。另外，第四条中也提到，FSC 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针对创新金融服务提出附加必要条件；被指定为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的金融公司在改变目标服务、增加服务或有其他合理事由时，应及时提出书面说明，FSC 则应在两个月内决定是否变更或撤销金融创新服务资格，并书面通知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

(三) 韩国“监管沙盒”运作模式

韩国“监管沙盒”运作流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申请审核阶段，专设“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负责相关申请的审核工作；二是测试服务阶段，通过审核参与测试的企

业定期所提供的报告，掌控其运作情况，并及时对有问题的创新金融服务采取相关举措；三是后续退出阶段，测试到期的创新金融服务是否延长测试期限，是否有必要保留其创新金融服务，应针对具体情况判别（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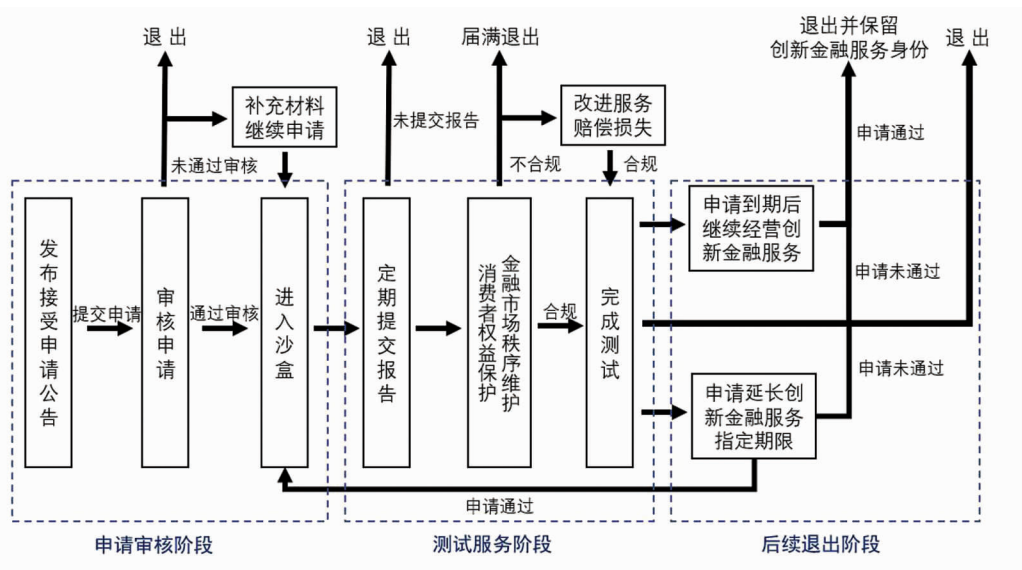


图 2 韩国“监管沙盒”运作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金融创新法》整理而得。

1. 申请审核阶段：专设负责单位，审核全面严谨

（1）专设申请审核单位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根据《金融创新法》第十三条要求，FSC 专设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负责创新金融服务的指定服务申请工作。依据法规要求，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最多由 25 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 1 名主席，由 FSC 主席兼任，其余成员由主席任命或委任，并且须属于获得金融监管委员会任命或担任创新金融服务经营组织主席职务的总统令规定人员，如不符合上述任一条件要求，则应满足以下任何一项条件：由有关机构负责人任命，负责创新金融服务指定工作的中央行政机构副部长或副职级审查人员；工龄超过 7 年的副教授或技术、金融研究所人员；在技术和金融相关行业中工作超过 7 年的人员；具备 7 年以上法律或消费者保护领域知识和经验的人员。

为保障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审核筛选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金融创新法》第十五条赋予其通过举办辩论会或公开听证会听取申请人、利益相关者和相关领域专家等群体意见的职权。在举办公开活动时，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形式及互联网形式告知有关各方及社会公众，参与者应当在会议结束五天内提交意见，委员会将结果通过书面或互联网形式通知意见提供者。这种措施体现了政府机关与社会各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使 FSC 推行的“监管沙盒”机制有了更强的社会公信力，在多方

专业人士的认可下，金融消费者往往就更容易接受这种测试模式及其产品；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的专业监督，严格的审查流程提高了创新金融服务审核的专业门槛，更好地保障了进入“监管沙盒”的金融科技产品服务质量。

(2) 申请内容及流程。在每批申请工作开展前，FSC 通过金融服务机构公告指定申请期限及申请时间，有意申请指定创新金融服务的金融企业应当在期限内，按照 FSC 的规定准备申请并提交材料。《金融创新法》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了创新金融审查委员筛选审核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包括金融服务的经营者是否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发挥重要作用；金融服务与现有金融服务相比是否足够创新；金融消费者是否可以从此类金融服务中获益；是否可以在无须遵守本法的前提下按照金融法律法规提供此类金融服务，或是否有可能存在适用特例，造成该金融服务规避监管的结果；申请人是否有资格与能力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经营范围、方法、经营计划是否明确合理；金融服务是否会严重损害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稳定性，是否会严重阻碍实现金融法律和法规的目标等。

依据《金融创新法》第十四条，通常情况下，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收到申请后 30 天内完成审查，但如果 FSC 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提出补充要求，还可以在最多不超过 60 天内，延长 2 次期限，总计审核期限不得超过 90 天。但同时《金融创新法》第十四条中也注明，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有权将整个审核期再延长至多 30 天。审核期结束之后，如果提交指定创新金融服务申请的金融公司或创业企业未通过审核，则自动退出沙盒机制；而通过审核的创新金融服务信息，则会由 FSC 按规定通过报纸及互联网通知社会公众。

2. 测试服务阶段：明确经营者义务，维护消费者权益

(1) 报告内容及流程。经过申请审核阶段所筛选出的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项目）即正式进入“监管沙盒”的测试阶段，在为消费者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服务的全方位掌控，实现现行监管法则之外的适度监管，《金融创新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创新金融经营者在测试期间的义务，要求经营者应向 FSC 提交创新金融服务运作的阶段性进度报告，报告期限及内容均有具体要求（见表 1）。

《金融创新法》第七条第一款要求，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如果没有按规定提交报告，FSC 有权责令更正其创新金融服务或取消其资格。第三十五条中也提到，违反法案第十八条规定（定期提交报告义务）的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将被处以罚款。正是基于 3 次定期报告向 FSC 所提供的信息，FSC 得以动态并全面地监管创新金融服务的开展情况。依据规定，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在履行义务期间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应当立即向委员会报告。不论是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还是从提升金融科技产品质量角度，这种测试模式有利于监管者和测试企业进行频繁高效的互动，转变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中监管者与被监

管者之间类似于“猫和老鼠”的博弈关系，提前预防金融乱象和风险事件发生，维护金融科技产业的稳定发展。

表 1 创新金融服务提交报告要求

报告性质	报告时间	报告内容
初次报告	开展创新金融服务指定期限 30 日后的 10 日内提交	1. 该报告所在期间内创新金融服务的开展次数及交易总额；2. 该期间内创新金融服务用户数量及用户特征；3. 该期间内相关纠纷状况，如金融事故或用户赔偿等；4. 下一阶段的创新金融服务运营计划；5. 最终报告中应涉及《金融创新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有关特殊情况的规定（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开展创新金融服务所涉及的经营行为和管理行为等有关财务情况）；6. 金融服务委员会确定并宣布的其他事项。
中期报告	开展创新金融服务指定期限过半后的 30 日内提交	
最终报告	开展创新金融服务指定期限到期前 30 日提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金融创新法》整理而得。

（2）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的义务及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由于创新金融服务相较于市场上已经成熟的金融产品而言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尽管在审核初期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就已经会同各界专家对申请进入沙盒的金融服务进行了评定，但是依旧无法完全避免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因此，为了维护“监管沙盒”测试阶段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金融创新法》的多项条款，对创新金融服务的相关义务及惩处措施进行规范（见表 2）。

表 2 测试阶段消费者权利保护相关条例

条例	内容	注释
第十九条（《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风险管理计划》的编制与遵守）	一、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当反映第十八条第一款的内容，制定并遵守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风险管理的措施 二、第一款中保护金融消费者和风险管理等措施应包括第十三条第四款各分项中的事项	《金融创新法》第十八条内容为“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义务”，其中第一款中规定：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在开展业务时，应当遵守 FSC 所规定的有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其他事项，如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等；第十三条内容为“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的设立、组成等”，其中第四款“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审核制定创新金融服务申请要素”中要求，申请者信息中应当包含其未来防止金融消费者在指定期间内遭受损害或风险的措施

续表 2

条例	内容	注释
第二十条（风险通知义务）	一、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创新金融服务时，应提前通知用户该服务处于测试中，并可能发生不可预知的风险 二、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在根据第一款发出风险通知后，获得接受为用户提供测试操作服务的同意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提到的措施不应影响创新型金融运营商对其用户承担的法律責任	
第二十七条（损害赔偿）	一、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当承担因提供或终止创新金融服务而给用户造成的损害赔偿，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可以自证属于无意或疏忽的情况除外 二、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应购买责任保险，以履行第一款所述的损害赔偿責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金融创新法》整理而得。

关于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发生后如何处理，《金融创新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第七条提到，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如果存在严重阻碍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稳定或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FSC 可以取消其测试资格；第十一条规定，如果损害金融消费者利益等情况属于不可预见的问题，经有关行政部门同意，可以命令该经营者停止服务或更改现有模式，收到中止命令的经营者，应当在 1 个月内迅速准备补偿措施，并与 FSC 进行磋商，措施合理之下，可以允许恢复服务，否则经营者将在指定期限届满时无法通过测试；第八条规定，如果经营者主动提出要求 FSC 撤销其测试资格，在停止运营之后经营者也应当忠实履行其在现有合同下的义务。

3. 后续退出阶段：优胜劣汰择径退出，创新服务专项保护

（1）延期退出与如期退出。测试阶段结束后的流程可以分为两类：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申请延长指定期限，继续在沙盒中进行测试；指定期限届满之后申请授权并退出沙盒，按照财务法律和法规继续经营创新金融服务。依据《金融创新法》第十条，如果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需要延长创新金融服务指定期限，应在到期日 3 个月前向 FSC 提交书面声明说明延长原因，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负责在到期日前完成相关审查。具体审查内容包括：申请延期理由是否有效；指定时期内该创新金融服务的业绩情况；期限延长对

金融市场秩序及金融消费者权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创新财务审查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在审查委员会及有关行政机构达成协议之后，如果 FSC 决定批准经营者延期申请，将书面通知申请者。

如果测试期间效果良好，依据《金融创新法》第二十一条，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可以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根据金融相关法律申请批准和授权。在经营者提出许可申请时，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依旧会针对相关要求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具体审核内容如下：结合经营者在测试期间提交的报告评估其服务目标的实现情况；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向审查委员会提交的表明其可以遵守在指定期间相关财务规定的书面声明。经过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相关行政机构和 FSC 的审核，经营者在指定期限到期后便可以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继续经营创新金融服务。此外，在《金融创新法》第十三条第五款中还特别提到，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在认为创新金融服务的指定期限届满后有必要继续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的条件下，可以建议金融服务委员会和相关行政机构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

(2) 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退出沙盒测试后享有的相关权利。为了凸显“监管沙盒”机制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支持金融创新发展的特点，《金融创新法》第五章中特别注明了“监管沙盒”作为金融创新支持系统所能够给予金融创新服务的特别权利。该法第二十三条中提到，金融企业通过沙盒测试并获得许可后，有权独家经营该创新金融服务，即拥有“专有经营权”。在收到许可之日起的 2 年之内，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可以要求 FSC 和有关行政管理机构对“提供金融服务行为、内容、方法或形式与该创新金融服务基本相同”或“商业上直接或间接利用类似服务，同时侵犯此类创新金融服务名誉”的人采取监管或惩罚举措。

(四) 韩国“监管沙盒”最新进展及反馈

2020 年 4 月，韩国“监管沙盒”项目启动一周年之际，FSC 主席表示，尽管当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但韩国创新金融服务数量仍不断增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创新步伐。2020 年 8 月 20 日，FSC 总结了“监管沙盒”项目开展以来的监管改进情况：在“监管沙盒”施行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得以寻找到更多契机，重新评估相关法规的适用性，被指定为“创新金融服务”的 110 个项目共获得了 62 项相关金融法规的豁免，其中有 8 个监管领域得到了相应改进，有 5 个领域正处于修订状态，14 个领域正在制定改进计划，“监管沙盒”项目的推行已初见成效。截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创新金融服务”总数已达 120 个。

三、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政府职能

（一）设立明确目标

《金融创新法》对设立“监管沙盒”的目标定义，其制度的设计包含了促进金融科技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和维护韩国金融经济秩序四个层面。首先，“监管沙盒”机制引导金融创新产品的成熟发展，经过沙盒测试流程，优秀的金融创新产品可以获得政府扶持、专项保护等一系列权益，仍有进步空间的金融创新服务则可以借助“监管沙盒”机制从监管机构、金融消费者以及社会专业人士等多个渠道汲取改进经验；其次，“监管沙盒”机制的施行可以使消费者有机会以更便捷、更安全的渠道接触金融创新产品，而且《金融创新法》中的许多条款都对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约束，消费者的意愿和动力会相应增强；再次，更多创新金融服务的开展必然意味着更大的人才需求，“监管沙盒”制度间接为金融从业者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就业选择；最后，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监管沙盒”一方面使相关行政机构拥有了更多机会接触新型金融产品，更直观地感受到金融市场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大幅提升了监管效率，沙盒之外的监管部门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对有发展价值但仍不够规范的金融科技产品服务进行管理，可规避传统监管中潜在的监管空白与监管灰色地带。

（二）完善配套政策

1. 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金融科技顶层设计

《金融创新法》的颁布为韩国“监管沙盒”制度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参考。该法针对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的扶持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金融机构或创业企业的加入，例如政府为“监管沙盒”运营测试提供全部或部分费用补贴。2019 年 10 月 31 日，国民议会通过《在线投资法案》，消除了法规中关于金融科技范围内 P2P 贷款业务的灰色区域，为借贷双方权益提供了更多保护措施。

2. 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鼓励金融创新

依据 FSC 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促进金融科技扩大规模措施》，根据金融公司的类型与规模，可以引入适用于金融科技公司的临时许可制度，使之可在临时许可制度下经营并提供相关服务；对临时许可系统的性能进行审查后，应当建立新的许可和注册系统，并细分许可单位，以促进创新金融服务的开发及其市场准入。此举给予了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更加宽松、灵活的经营空间，有助于鼓励金融创新产品更快面市。

3. 放宽金融机构投资范围，缓解金融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金融科技的特殊性使得开发金融科技产品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的投资合作增加。原则上，除与金融服务密切相关的公司外，韩国法律禁止金融公司投资于非金融公司，为了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营造更好的投融资环境，FSC 针对金融科技和与金融创新服务密切相关的业务类别进行了新的法律解释，并计划修订相关法规，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增加与非金融企业的合作，缓解金融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4. 推动建立开放银行系统，降低金融科技公司交易成本

2019 年 10 月 30 日，韩国开放银行系统试行，第一天即吸引约 51 万人注册了约 94 万个账户。2019 年 12 月 18 日，韩国开放银行系统正式全面启动，借助开放银行所提供的服务，金融科技公司可以直接访问银行网络，且支付的交易费用较低。开放银行不仅给消费者的日常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也破除了金融科技公司进入金融行业的壁垒。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约有 1197 万人和 2222 万账户注册、使用开放银行服务；截至 2020 年 2 月 5 日，共有 50 家机构（17 家银行和 33 家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开放式银行服务。

5. 不断增加创新资金支持，引导资本流向潜力企业

2020 年 2 月 17 日，FSC 联合其他经济部门共同公布《2020 年工作计划》，其中涉及多项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条款，如防止房地产市场资本集中，引导资金从家庭和房地产流向金融科技企业，提供 40 万亿韩元为 1000 家创新型企业提供财政及非财政援助等。不断增加的资金支持以及在政府号召下从房地产等行业流向金融创新的资本，将对初创企业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公司成长，社会金融机构与创新金融服务经营者的合作产生较强的支持与引导效果，对于韩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6. 积极开展海外合作项目，全方位推动科技企业发展

在海外合作方面，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与韩国 FSC 宣布将搭建英韩两国“FinTech 桥梁”，促进双方金融科技共同发展。根据《促进金融科技扩大规模措施》披露，韩国计划 2020 年在东盟国家建立不少于 5 个金融科技实验室，扩大政府间合作，共享金融科技市场信息、相关法规与金融创新政策经验，加速韩国金融科技公司的海外扩张。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加快对计划进入韩国市场的海外金融科技公司评估与测试过程。

四、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对我国的启示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虽未直接提及“监管沙盒”及其体制机制建设，但能从内容上看到隐喻含义：一

是对于科技创新边界和发力方向，强调安全可控和普惠民生的原则；二是提出要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金融科技“监管沙盒”，首批 6 个试验项目已经确定。目前进入“监管沙盒”的都是持牌机构，而且项目筛选的结果主要集中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具备场景普适、技术成熟、风险可控的特点，试验成功后有利于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示范效应强，其他省市可以此为范本依据自身情况有序开展“监管沙盒”试点工作，符合稳中求进的审慎思路安排。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各地区的“监管沙盒”试点工作存在差异，在此过程中，“监管沙盒”制度的国际经验借鉴显得尤为重要，包括实施流程、风险补偿机制、相关主体及责任、评审专家团队、监督与公开机制、组织保障安排等方面。基于韩国“监管沙盒”机制的实践经验，我国未来在完善试点工作过程中，应在如下五方面强化监管引导功能，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

韩国围绕“监管沙盒”运行所颁布的《金融创新法》是“监管沙盒”工作开展的法律基础，内容细化到了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内容、监管流程等多个细节，具备明确的法律效力，使金融监管部门对创新金融服务的管理有法可依，也使有意愿参与金融科技创新的经营者更加了解申请和测试途径，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以及给予的扶持等内容。相较于韩国，我国情况较为复杂，因此不可全盘照抄韩国“立法为先”的经验，但是健全法律法规，明确法律效力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学习。就北京“监管沙盒”试点而言，目前遵循的指导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国函〔2019〕16 号），并未制定“监管沙盒”长期发展规划。我国应坚持目标定位先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突出规划引导作用，可以考虑出台有关金融创新的监管条例，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明确监管主体和具体执行主体，协调相关法律法规的主体，统筹现有法律框架和未来的创新法规，弥补现行监管体系下的监管空白和灰色地带，使“监管沙盒”工作的开展更加系统和规范化，进而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

（二）专设部门审查，明确制度设计

尽管韩国“监管沙盒”机制的主要负责部门是 FSC，但在创新金融服务的指定环节，金融服务委员会又专设了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对金融公司的申请内容进行审查。我国

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在“监管沙盒”监管主体责任单位下设部门，专项负责审查筛选工作，制定清晰全面的金融科技企业入盒准入制度，按行业、节奏、类别进行筛选，其中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真伪的识别尤为重要，减轻后续监管部门的工作量及监管难度，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创新金融服务整体的质量约束。此外，应设立项目评估反馈机制，定时提交测试报告，反馈真实的测试情况，及时纠偏；探索建立完备的沙盒项目退出机制，邀请社会各界专家组建专家评审团，综合考虑风险控制、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做出“出盒”“退盒”“留盒”决定。

（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完善风险防控与补偿机制

依据韩国“监管沙盒”运作机制，《金融创新法》格外注重保护享受创新金融服务的消费者的权益。从测试初期对创新服务风险规避能力的要求，到测试阶段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告知义务，再到测试之后对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法规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制约束。我国自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以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愈发增强，但不同监管机构下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仍未实现统筹协调，导致实际工作效果不佳。因此，我国应当在推进“监管沙盒”试点工作的同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强化组织协调。在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方面，要向有意愿参与测试的消费者告知相关项目正处于沙盒测试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禁止以捆绑、强制等方式强迫消费者参与；保护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和追诉权，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等相关行政判决主体的联系沟通；参与测试的持牌金融机构应根据测试产品或服务风险大小按一定比例计提资本金或拨备，并向监管部门报备；参与测试的非持牌机构可针对测试的产品或服务，向保险公司购买相关保险产品，或者向第三方缴纳风险保障金。

（四）加强政府配套政策支持，培育“监管沙盒”协同发展生态圈

加强政府配套政策支持对于“监管沙盒”试点工作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由于“监管沙盒”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机制设计，因此政府有较强的意愿与相关行政权力推出配套支持政策，包括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鼓励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创新企业深化合作，不断增加创新资金支持，减轻融资负担，积极开展海外合作项目等。同时，协同发展生态圈是全方位培育新兴产业或行业的优质选择。政产学研共同发力，助力“监管沙盒”机制的快速落地和试点工作的有序开展，形成良性循环。加强监管机构、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企业、学术研究机构 and 第三方平台等之间的作用链条，协同探索金融科技监管的弹性边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耦合共赢。

（五）注意规避“监管沙盒”的潜在风险与注意事项

“监管沙盒”作为一种创新制度安排，尚处于探索和试点初期阶段，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一些局限性和潜在风险。第一，支持“监管沙盒”运行的成本可能较高，包括企业人力成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财务覆盖成本和监管测试成本等，对一些非持牌机构的初创企业来说负担较大，隐含的问题是“监管沙盒”测试过程中各项成本的分担机制亟待构建。第二，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竞争，“监管沙盒”的准入原则、条件以及有限授权测试条款并未细化，属于较为宏观的监管规定，更具体的监管决策依赖于监管主体判断，但由于提交申请是分批进行的，对于测试企业来说，测试金融创新的时间较为重要，因此这个环节存在潜在的不公平竞争，这也是后续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胡滨、杨涵：《英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借鉴与我国现实选择》，《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1 期。
2. 蓝庆新、金刚杰：《韩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上海金融》2003 年第 2 期。
3. 翟舒毅：《韩国金融监管改革研究》，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17 年。
4. 范云朋、赵璇：《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与启示》，《财会月刊》2020 年第 1 期。
5.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About FSC, https://fsc.go.kr/eng/new_about/whatwedo.jsp?menu=01.
6.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 Adds 9 More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s to Regulatory Sandbox at 1-Year Anniversary, https://sandbox.fintech.or.kr/outcomes/press_release_detail.do?lang=en&id=289&pageIndex=1.
7.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 Seeks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Regulations through Regulatory Sandbox Program, https://sandbox.fintech.or.kr/outcomes/press_release_detail.do?lang=en&id=426&pageIndex=1.
8.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 Designates 5 More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egulatory Sandbox, https://sandbox.fintech.or.kr/outcomes/press_release_detail.do?lang=en&id=427&pageIndex=1.
9.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Measures To Promote Fintech Scale-ups, <http://fsc.go.kr/downManager?bbsid=BBS0128&no=146757>.
10.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Policy Issues – Fintech Policy, https://www.fsc.go.kr/eng/new_policy/fintechPolicy.jsp.
11.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2020 Work Plan Focuse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to Support Innovative Businesses, <https://fsc.go.kr/downManager?bbsid=BBS0048&no=149359>.

责任编辑：郭 霞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全球价值链 调整及其应对策略*

于 畅 邓 洲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使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凸显、增值能力增强和要素投入升级，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新型制造技术的使用正在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伴随着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调整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为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机会窗口。中国应谨防过早“去工业化”，通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策略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

关键词：新一代信息技术 全球价值链 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作者简介：于 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区域发展智库助理研究员；

邓 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区域发展智库副研究员。

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为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遇。中国正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20 年度智库基础课题《“十四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部分研究成果。

的契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2019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达 28.2%。^①毫无疑问，中国分享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成为受益者之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初见端倪，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深刻改变了制造业国际竞争的资源基础和比较优势，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进而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调整，国际产业竞争格局迎来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出重大挑战，同时又提供了历史机遇。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角度研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双重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主要表现

长期以来，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标志，跨国公司将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序划分为多个“碎片化”环节，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外包给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整合全球各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资源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将自身不具有成本优势且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外包和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在母国只从事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活动。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以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度分离、中间产品离岸外包和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集中表现为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提高，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调整。

（一）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提高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进入早期加速阶段，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随之发生剧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典型特征，工业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通用目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以智能制造

^①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②周济：《智能制造——“中国制造 2025”的主攻方向》，《中国机械工程》2015 年第 17 期。

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① 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凸显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

在传统的企业创新系统中，研发、设计和制造缺乏数字层面的相互支持，产品创新主要依靠实验室里的研发和设计，制造仅仅是“实现”创新的后端环节，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走向高度一体化，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数字制造采用一致的综合生产设计方法，使产品、设备、工厂和资源信息在整个流程中实现相互关联，数字量作为研发、设计、制造和管理的唯一依据（见图 1）。数字制造搭建起连接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数字纽带，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密不可分，在提高制造本身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研发和设计的效率，增强了新产品的可制造性，缩短了产品原型的开发周期和制造周期，加速了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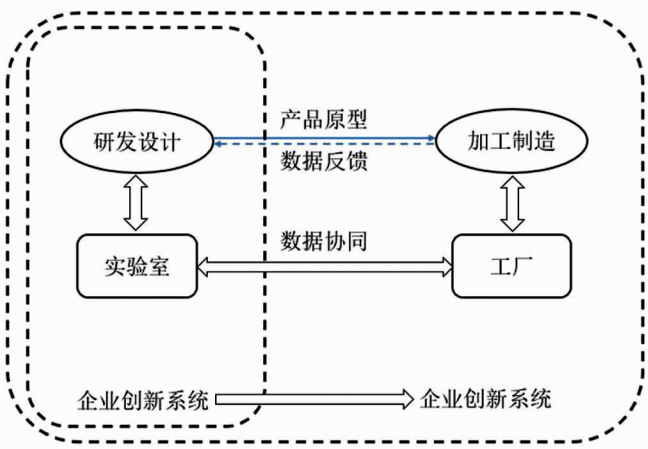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制造下的企业创新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数字制造技术的兴起使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功能被重新审视。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始反思“产品创新 + 制造外包”的经典商业模式。一些研究认为，制造外包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之所以在平板显示、光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业领

^①赵剑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 年第 3 期。

域丧失竞争力，是由于制造能力的弱化侵蚀了这些产业的产品创新能力。^① 没有制造环节的支撑，大量产品创新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的概念阶段，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利益。因此，跨国公司正积极通过发展数字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来推动研发、设计和制造的一体化，以强化产品创新能力。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

“微笑曲线”显示制造环节是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的“洼地”，“逃离”制造环节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和国际分工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出大量新型制造技术，制造环节被赋予了更多内涵和外延，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率有了飞跃式进步，价值增值能力与传统制造技术不可同日而语。数字经济时代在价值链的上、中、下游都存在高端领域，描述价值增值过程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② 制造环节增值能力的提高源于新型制造技术对制造流程、制造范式和制造外延的重塑。

第一，制造流程的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在智能生产过程中，传感器、智能诊断和管理系统通过网络互连，生产设备成为物联网的智能终端，使得单一、分散的程序控制上升到综合智能控制。智能制造系统不仅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部件和产品进行实时监测，而且可以对系统本身进行检测和诊断，制造工艺根据制造环境和过程进行实时优化，提升制造过程的柔性、质量控制和生产效率。智能制造改变了以往制造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通过将数据系统化来实现制造成本、安全性和环境影响的大幅改善，具有“省钱、省力、省时、省能耗”的巨大优势。^③ 以西门子、大众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工业巨头，正在用智能制造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面貌。

第二，制造范式的定制化提高产品差异化价值。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正在使制造范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转变。制造范式的转变依然基于智能制造对制造流程的重塑，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预先设置了全流程的控制程序，所有流程、元件都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挖掘分析，以规模化的方式来获得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成为可能，^④ 有效解决了小批量生产的成本与周期问题。在智能制造范式下，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直接拉动制造业生产，可重构的柔性生产系统对多样

①Pisano G P, Shih W C. Does America Really Need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03).

②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1 期。

③王盛勇、李晓华：《新工业革命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改革与战略》2018 年第 2 期。

④冯国华：《打造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制造业》，《中国工业评论》2015 年第 4 期。

化的市场需求具备了更加快速的反应能力。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利用用户交互平台将碎片化、个性化需求汇聚成批量订单，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物理系统，促进制造工艺和流程的数字化管理与产品个性化需求的柔性匹配，实现规模化定制生产，通过灵活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价值能力。在服装、家电、家具、汽车等消费品行业，已经涌现出大量个性化定制的案例。

第三，制造外延的服务化提高产品附加值。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可以深度挖掘用户数据中的商业价值，更好地分析、决策、优化，通过提供主动跟踪、及时响应、智能应对的高质量服务拓展最终产品的潜在附加价值，全面改善用户体验。企业根据即时的数据反馈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和按需定制，进而满足了不同用户个性化、差异化的长尾需求。制造业企业普遍向提供“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制造不再是单纯的产品生产，而是越来越向服务创造倾斜。制造业企业在产品之外为用户提供持续的“增值服务”，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和价值链的延伸。如三一重工将在全球售出的30多万台机械设备接入“根云”平台，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时采集近1万个运行参数，远程监控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并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故障维修，有效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

3.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升级制造环节的要素投入

智能制造使数据成为制造环节重要的要素投入，并改变了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投入结构和技能劳动投入结构。智能设备的使用提高了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比，在替代低技能劳动投入的同时，高技能劳动投入变得愈发重要。要素投入的高级化促使制造环节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提高，劳动密集度降低。

第一，智能制造“催生”数据要素需求。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支撑技术之一。在智能生产中，数据直接成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全过程数字化工厂以数据为纽带将制造系统和信息系统连接，车间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采集工业大数据，并上传到云计算中心进行存储、分析和决策。工业大数据的积累和投入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还能直接助力服务型制造。如西门子企业对企业（B2B）业务利用长期积累的制造数据优势，为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实现和优化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完成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制造执行、运营维护的全过程数字化，创造出基于数据投入的新增价值。

第二，智能制造“挤出”低技能劳动投入。智能制造以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为重要支撑，人工智能使制造系统具备了自行决策、自行维护、自行学习，甚至自行组织的能力，以数据挖掘和智能决策为主的工业应用能力大幅提升；而工业机器人集精密化、

柔性化、软件应用开发等先进制造技术于一体，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成为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最高体现。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正大规模替代简单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等低技能劳动岗位，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比随之提高。例如，江苏某化纤车间在使用工业机器人后，劳动用工人数大幅下降了 56%，固定资产折旧与用工成本之比从 0.74 提高到 1.73。^① Dauth et al. (2017) 研究德国案例时发现，每增加 1 台工业机器人会导致 2 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消失。^② 随着人工智能与其他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同样出现“机器换人”的浪潮，制造业就业岗位明显萎缩。

第三，智能制造“创造”高技能劳动需求。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过程是“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逐步替代的过程。在智能制造模式下，具有稀缺性和差异性的高技能劳动是制造环节的核心人力资源，也是企业竞争的战略性资产。智能制造系统体现以人为核心的生产系统设计，生产系统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人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简单、重复的机械操作，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性地“主导”生产过程。可以预见，智能制造时代对掌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知识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将急剧增长，劳动者需熟练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

（二）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

新型制造技术的突破重塑了传统制造环节，不仅使得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上升，还导致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得以重构制造业竞争优势。这两方面因素削弱了发达国家外包或转移制造环节的经济动机，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环节，有计划地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面临调整。

1. 智能制造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智能制造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资本的智能生产率”已经成为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③ 传统制造环节密集使用劳动要素，低劳动成本是发展中国家布局制造环节的核心比较优势。智能制造技术广泛使用智能设备替代低技能劳动，制造环节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这将严重削弱凭借低劳动成本

①徐建伟、戴俊骋：《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模式变化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0 期。

②Dauth W, Findeisen S, Woessner N. German Robots —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Workers.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7.

③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相反，对发达国家而言，智能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增长缓慢的劣势，发达国家可以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从事模仿和学习活动，从而让研发人员专注于发明和创新活动，推动发达国家以创意为基础的增长（Idea - Based Growth）。^① 此外，智能制造日益成为影响跨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重新提升。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中，韩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制造强国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② 在智能制造技术的加持下，发达国家不仅可以在产品创新和品牌营销方面抑制后发国家，甚至能够利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制造环节直击后发国家的初始优势，后发国家原来的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给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提出了严峻挑战。

2. 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增强

除了创造就业岗位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考虑外，新型制造技术带来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上升并重构发达国家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使发达国家萌生了将制造环节本地化的经济动机。近年来，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早已大规模向外转移的制造环节。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契机，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国家战略，将自身在资本、技术、市场、品牌、网络、人力资源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与新型制造技术有机结合，促进制造业全面振兴，抢占新产业的制高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推出一系列制造业重振和促进计划，鼓励制造业回流国内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并取得一定效果。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惠而浦等知名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回迁至本国。美国回流倡议协会（The Reshoring Initiative）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③ 2010—2018 年间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 75.7 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 1/3，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到 59%。制造业回流直接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2008 年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甚至开始逆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抬升（见表 1）。

^①Aghion P, Jones B F, Jones C 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②王媛媛、张华荣：《G20 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比较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 年第 9 期。

^③The Reshoring Initiative. Reshoring Initiative 2018 Data Report. <http://www.resshorenw.org/recent-data/>.

表 1 1998—2018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变化 单位：%

国家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2013 年	2018 年	1998—2003 年变化	2003—2008 年变化	2008—2013 年变化	2013—2018 年变化
美国	15.77	13.32	12.26	11.81	11.15	-2.46	-1.06	-0.45	-0.65
日本	22.90	21.11	21.43	19.44	20.75	-1.79	0.32	-1.99	1.31
韩国	25.47	24.12	25.62	27.79	26.65	-1.34	1.50	2.16	-1.14
德国	20.41	19.84	20.05	19.93	20.40	-0.57	0.21	-0.12	0.48
英国	14.58	11.73	9.62	9.58	8.84	-2.85	-2.11	-0.04	-0.74
法国	14.67	13.09	11.10	10.35	9.89	-1.57	-1.99	-0.75	-0.46
欧盟	17.63	16.27	15.29	14.39	14.89	-1.36	-0.98	-0.90	0.50
OECD	17.53	15.57	14.62	13.82	14.08	-1.95	-0.96	-0.80	0.2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因数据缺失，2018 年美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数据实际为 2017 年数据。

二、全球价值链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双重影响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制造环节的相对地位提高及发达国家对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双重影响，在恶化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

（一）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借势回流，中国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由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的分工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正面竞争关系。中国制造业继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阻击，^① 存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风险。

第一，中国制造业面临“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环境。从内部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衰退，劳动、土地、资源、环境成本持续推高，传统要素禀赋优势逐渐削弱甚至丧失，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从外部看，发达国家以新型制造技术的发展为契机推动制造业回流，制造效率大幅提高，在制造业的成本劣势有可能被填平，从高端冲击中国制造优势；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以相对于中国更低的劳动成本和更优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2 期。

的财税政策吸引国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呈现出从中国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从低端冲击中国制造优势。中国制造业同时面临发达国家高效率优势和新兴经济体低成本优势的“两端挤压”，国际竞争空前激烈。

第二，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一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配合制造业回流、保护本土制造业和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逆全球化”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拉开中美贸易摩擦序幕并使之持续升级，剑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帮助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利益，试图从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更是明确表示支持本国企业回迁产业链或加强本国产业保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持续攀升是此轮贸易摩擦的“催化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①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严重威胁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中国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空间被急剧压缩。

二是全球贸易严重失速。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整体演进趋势放缓，全球价值链向主导国家收缩，本地化势头兴起。发达国家增强对制造环节的布局，主动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向制造环节延伸，“研发—设计—制造”垂直一体化模式大量出现。蒋为等（2018）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中间阶段越来越多的环节转移至本国国内进行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源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生产的本地化特征明显。^②全球价值链演进趋缓及本地化倾向沉重打击了以中间投入品贸易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作为价值转移主要手段和价值链各环节连接纽带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失速。2008—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年均增速仅为1.88%，大幅低于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见图2），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罕见地长时间低于全球GDP增速，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依存度显著降低。全球贸易失速对中国高度依赖外需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制造业行业首当其冲，依托外需推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潜力大大降低，中国制造业亟需挖掘新的增长动能。

①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

②蒋为、宋易珈、李行云：《全球制造业生产分工的演变、分布与贸易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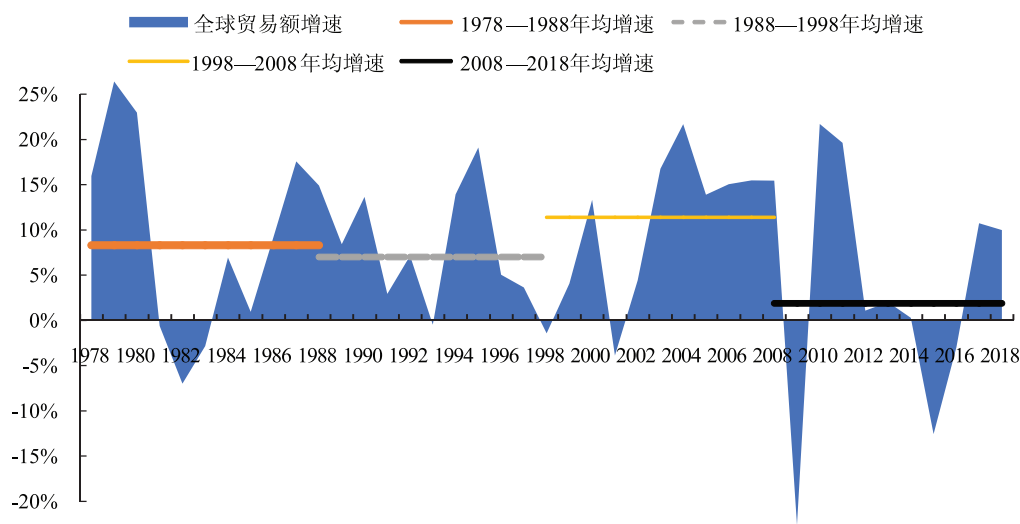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8 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价值链攀升的历史机遇

第一，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提供了机遇。依托低成本比较优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具有显著优势，在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售后环节则相对薄弱，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研发+设计+制造”“制造+服务”一体化成为日益普遍的商业模式，打开了由制造向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延伸的通道。中国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信息化基础，且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借力新型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的空间巨大。一方面，基于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海量的制造数据，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能够快速转化为产品并获得制造过程的反馈，形成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的良性互动，加快中国向研发设计环节延伸，形成低成本、快响应、高频次的中国式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基于庞大的国内客户群体和海量的用户数据，中国制造业更容易实现向服务模式的延伸，能够及时追踪用户需求和开发定制化、精细化的产品服务，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品牌价值和服务能力。

第二，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制造业“换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其成熟及商业化应用催生大量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最终形成一批新兴产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技术、人才、供应链及销售网络上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后发国家需要经过艰难的技术追赶才能缓慢缩小差距。而在新型制造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

“换道超车”的机遇。凭借良好的制造能力和信息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有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率先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并带动传统产业升级。

第三，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提供了机遇。全球价值链演进趋缓及本地化趋势的增强，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明显冲击，各国政府都把确保供应链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而实施相应的战略举措。在此背景下，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成为一大课题。对主要依赖进口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用本地化供应补充和替代全球化供应，既能防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进一步累积和恶化，又能对冲外资增速放缓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外迁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依托进口替代强化国内供应链体系，将显著增强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三、中国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策略

在内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中国制造业需要重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历史性机遇，顺应新型制造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

（一）谨防过早“去工业化”

在全球价值链调整诱发的不利外部环境下，中国制造业需要顶住多重压力，坚定工业化道路，不能在“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下过早“去工业化”。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 GDP 从 8000 美元向 12000 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在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中国近年来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①“制造大国”“大而不强”仍然是对当前中国制造业的阶段性的评价，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将制造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首要支柱，化解“虚实”经济结构失衡，避免因过早“去工业化”而使工业化进程出现曲折。

（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面对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国内出现打着加强自主创新，实则采取封闭路线发展技术和产业的论调，对中国制造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造成一

^①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 期。

定的干扰。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有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才能形成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应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一方面，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产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产品进口改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投资。

（三）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

在各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应引导和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全价值链积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的跃升。支持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系统，在虚拟仿真的信息化环境中并行、协同地实现产品的全数字化设计；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为核心的技术改造，推进生产过程信息化；积极发展“多品种、中小批量、准时化”个性化定制生产方式，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和按需生产；支持制造业企业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服务型制造，实现在线实时监测、远程诊断与维护、全产业链追溯、客户满意度及产品改进方向大数据分析等增值服务，推动企业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升级。

（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以国内需求为战略支点，培育国产化供应链，增强中国制造业韧性，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充分挖掘本土的市场规模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诱导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一方面，通过以 5G 为代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以重大科技装备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建设，高质量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改革，发展“互联网经济”“夜经济”等新业态模式，激活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对不同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现状和重塑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关键行业在国内推进供应链“备胎”计划，核心材料、零部件和软件要做到国际有来源、国内有备份。

（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

率提升、创新激励、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应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助推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国可发挥在互联网行业的突出优势，提高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以互联网与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六）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在嵌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演进放缓的势头。“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有能力以“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即将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机结合。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赶超可以提高分工地位，但空间收窄和难度增大；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为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打开新空间。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新选择，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起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参考文献：

1.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 邓洲：《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经济纵横》2020年第4期。
3. 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4. 富金鑫、李北伟：《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经济范式与管理理论体系协同演进研究》，《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5期。
5. 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6. 王永龙：《“再制造化”战略建构及对我国的影响效应》，《经济学家》2017年第11期。
7. 王晓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全球化》2019年第10期。
8. 周建军：《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 大趋势与新变化

马盈盈 崔晓敏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既有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受到巨大挑战，并面临着组织架构、地理格局等方面的重构压力。与此同时，各国要素成本优势的相对变化和新兴技术的发展也推动全球产业链不断调整。在多方力量的相互博弈下，未来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出四方面特征：第一，以市场和最终需求导向驱动的区域集聚；第二，以安全导向驱动的供应商多元化和关键产业本地化；第三，以成本和技术导向驱动的产业链梯度转移；第四，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服务业分工细化。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 新冠肺炎疫情 要素成本 逆全球化 新兴技术

作者简介：马盈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崔晓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赤字等风险交织。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既有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受到巨大挑战，并面临着组织架构和地理布局等方面的重构压力。此外，各国要素成本优势的相对变化和新兴技术的发展也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不断调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随着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和经济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明显上涨，促使部分产业链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另一方

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改变工业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进而改变全球产业链的组织架构。

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与重构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一方面，中国经济过去 40 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如果没有对外开放，2000—2014 年中国国民真实收入将较实际情况下降约 79.2%，^①更遑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的增长奇迹。另一方面，在要素成本上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供应链安全性考量上，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撤资中国”“去中国化”“脱钩论”等不绝于耳。根据瑞银的一项调查，产业链重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既已开始，但并不是简单的“去中国化”，而是在技术、市场、成本、竞争和政府等多重因素的权衡下，寻找新的稳态。

一、疫情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在市场、技术、成本和政府力量的作用下，疫情前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三方面的明确趋势。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人力成本更低地区转移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成本变化敏感，但对技术水平、资本设备、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要求相对较低，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从高收入国家不断向低收入国家转移的特征，且转移内容逐渐从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扩展到电子、化学、运输设备以及机械设备行业中可分离并外包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以纺织服装业为例，该产业自工业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从英国向美国（20 世纪上半叶），从美国向日本（20 世纪 50 年代），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20 世纪 60—70 年代），从“亚洲四小龙”向“亚洲四小虎”和中国（20 世纪 80—90 年代），从中国向其他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2008 年至今）的五次转移（图 1）。^②

劳动力资源曾助力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工贸易是中国早期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将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本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相结合，进而实现双赢。1990 年，中国 15~64 岁年龄段人口占全球劳动

^①姚曦：《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的总体收益》，《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张宇燕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0 年 6 月版。

^②朱启兵：《中国产业变迁（I）：以纺织服装业为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与产业集聚》，中银证券，2019 年 6 月 13 日。

总人口的 23.3%，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为发展加工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1995—2007 年，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超过 45%，高于一般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随着中国的融入，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

近年来，中国人力成本快速攀升，驱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转移。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2014 年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基本工资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相应城市的 1.15~6.97 倍，其中与缅甸、越南差距最大，是部分非洲国家的 10 倍以上。以纺织服装业为例，尽管目前中国依然是该行业最终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最主要的出口国，但已出现向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转移的迹象。2007—2018 年，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服装业出口占全球比重从 9.7% 上升至 13.5%，增速明显提升并可能进一步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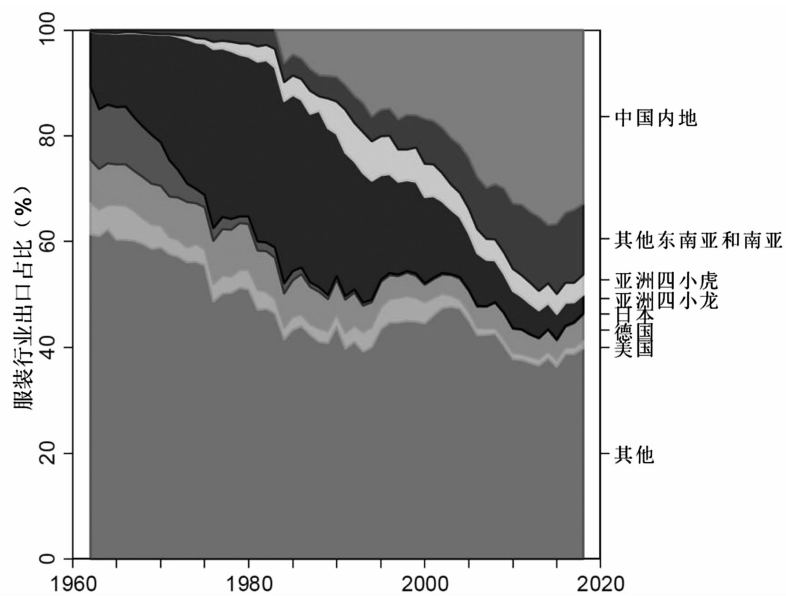


图 1 1962—2018 年主要经济体服装行业出口占比

数据来源：WITS 数据库和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服装行业 SITC 编码为 84。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其中中国台湾 1972—1988 年数据缺失，由 1971 和 1989 年取值在时间层面的线性变化进行估计。亚洲四小虎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内地 1962—1983 年数据缺失，导致图中相应阴影面积在 1983 年以前为 0，实际数据预计在 5%~6% 以下，且改革开放前预计更低。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包括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文莱。除文莱、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外，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早期数据存在较大程度的缺失。考虑到缺失国家的经济体量总体较小，预计对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二）技术对产业链发展存在“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使得复杂技术的“可扩散”程度大大提高，为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化提供了机遇，并促使全球分工体系的建立。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了生产所需的研发、干中学和其他补充技能等投入。特别地，数字技术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包括降低信息传递和跨境交易成本，增加中间品、服务和技术的可获得性，以及专注局部生产环节、无需了解全貌等方面。从宏观视角看，近 20 年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尤其是欧洲、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从微观视角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中愈发重要。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前 200 大供应商^①有 40 家来自中国（含香港），2019 年全球 807 家工厂中 47.5% 在中国内地。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不断改变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增加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甚至替代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优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引发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进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特别地，在制造过程中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将生产活动外包到其他国家的概率明显降低。从行业看，自动化强度较高的电子和汽车产品行业所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显著低于自动化强度较低的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行业。此外，在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建的数字经济时代，大规模定制、动态供应链、智能生产和服务、精准推送等成为现代工业的新特点，这是以廉价劳动从事批量生产的低收入国家当前还难以学习模仿的。

（三）逆全球化下制造业向区域甚至国内回流

既有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积极、稳定的外部环境。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来袭。全球产业链呈现出一定的回归区域化、甚至本土化的迹象。

在亚洲地区，2000—2017 年区域内贸易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占比从 40.3% 升至 46%。在前向和后向简单产业链活动中，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分别提高 3.5 和 7.4 个百分点。在前向和后向复杂产业链活动中，亚洲区域内贸易比重分别提高 5.4 和 6.6 个百分点。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中低收入亚洲经济体融合到亚洲生产网络中。分行业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化学和制药行业以及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行业区域内贸

^①前 200 大供应商占其 2018 年原材料、制造和组织采购金额的 98%，详见 *Apple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2019, <https://www.apple.com/>。

易占比较高，采矿业、农林渔业和其他运输设备行业区域外贸易占比较高。^① 未来，在“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合作倡议和协定的带动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在北美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产业回流诉求增加。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以期实现制造业回流与振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并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将中国确定为竞争对手，并不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力度，规避和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赶超。^② 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墨加协议》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产业加速了从中国的撤离，转向北美地区。2019 年 1—7 月，美国进口与 2018 年同期基本持平（显示进口需求变化不大），但贸易伙伴国结构发生了明显调整——自中国进口下降 366 亿美元，而自墨西哥进口提高 125 亿美元。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一）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的机制

全球产业链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同时增强了全球系统性风险。首先，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挤压全球产业链，造成局部断裂，并通过产业链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经济体造成冲击。在需求层面，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往往会推迟耐用品的消费；在供给层面，疫情造成的人员隔离、跨地区流动受限等会导致企业劳动力短缺、开工不足甚至关停。其次，各国采取的关闭边境、停航停运等措施导致国际物流迟滞、货物贸易成本增加，降低产业链运行效率。再次，疫情导致的下游市场需求萎缩将加大上游供应商的生产、销售和库存管理的风险，引起价值链贸易严重的波动与混乱。

（二）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程度：模拟分析^③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我们基于假设抽取方法，^④ 分两个阶段模拟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①行业层面的亚洲区域内（外）贸易基于 OECD TiVA 数据库中的中间品出口数据计算。

②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③本部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 2018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④假设抽取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将一个产业部门从经济系统中抽走，通过对比抽取前后经济系统的变化来评估该部门的重要性和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为了解疫情冲击的经济效应以及不同部门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我们假定疫情发生国对外总出口或某个行业出口中断或者减少一定比例。

第一阶段，2020 年 1 月至 3 月中旬，假定疫情使中国内地各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供给下降 50%。从绝对值看，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最大的前 10 位经济体依次为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中国台湾、巴西、法国、英国；从相对值看，GDP 损失占国内增加值比重最高的前 10 位经济体依次是蒙古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越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分行业来看，中国内地建筑业、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食品业和农业产出下降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其中，电子电气设备出口下降 50%，使得 GDP 受损最大的经济体为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德国，分别下降 2.1%、4.2%、0.46%、0.076%和 0.30%；机械设备出口下降 50%，使得 GDP 受损最大的经济体是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分别下降 0.15%、0.46%、0.15%、0.36%和 0.82%。

表 1 中国内地各行业出口下降 50%对各国 GDP 的影响 单位:%

行业	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农林牧渔业	0.184	0.116	0.034	0.017	0.035	0.017	0.022
采矿业	0.471	0.177	0.057	0.017	0.065	0.033	0.033
食品业	0.244	0.127	0.040	0.030	0.049	0.023	0.033
纺织业	0.146	0.157	0.047	0.015	0.037	0.017	0.022
皮革制造业	0.040	0.041	0.011	0.006	0.011	0.005	0.007
木材制品业	0.063	0.041	0.013	0.006	0.015	0.007	0.009
造纸业	0.073	0.066	0.023	0.009	0.023	0.010	0.012
石油燃料加工业	1.176	0.148	0.048	0.019	0.056	0.042	0.034
化工行业	0.688	0.461	0.128	0.041	0.117	0.056	0.067
橡胶塑料制品业	0.164	0.179	0.055	0.014	0.045	0.020	0.025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0.465	0.179	0.062	0.018	0.064	0.032	0.033
金属制品业	1.450	0.481	0.180	0.047	0.177	0.132	0.093
机械设备制造业	0.358	0.462	0.150	0.030	0.151	0.064	0.065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	0.677	2.104	0.467	0.076	0.296	0.133	0.1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371	0.489	0.198	0.034	0.246	0.077	0.103
其他制造业及废弃材料加工业	0.039	0.035	0.011	0.003	0.010	0.005	0.006
电煤气水生产和供应	0.632	0.238	0.064	0.017	0.063	0.033	0.031
建筑业	1.263	0.803	0.275	0.070	0.257	0.145	0.132
批发业	0.119	0.139	0.037	0.015	0.061	0.022	0.034
零售业	0.025	0.029	0.008	0.003	0.013	0.005	0.007

续表 1

行业	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住宿和餐饮业	0.065	0.038	0.012	0.008	0.015	0.007	0.010
内陆运输	0.144	0.068	0.025	0.007	0.031	0.013	0.015
水路运输	0.044	0.019	0.006	0.002	0.009	0.004	0.006
航空运输	0.039	0.020	0.007	0.006	0.009	0.006	0.010
其他支持性运输活动	0.050	0.025	0.008	0.004	0.009	0.005	0.006
邮政和电信业	0.033	0.077	0.019	0.004	0.017	0.007	0.009
金融业	0.057	0.057	0.016	0.007	0.024	0.012	0.015
房地产业	0.019	0.017	0.005	0.002	0.007	0.003	0.004
其他商业服务	0.265	0.425	0.109	0.030	0.105	0.045	0.057
公共管理国防	0.117	0.103	0.032	0.015	0.037	0.022	0.027
教育	0.070	0.073	0.020	0.010	0.021	0.013	0.0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0.163	0.119	0.035	0.012	0.038	0.017	0.022
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0.089	0.125	0.035	0.010	0.036	0.016	0.021
总体	9.803	7.639	2.236	0.603	2.149	1.050	1.12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8 年 ADB-MRIO 测算而得。

第二阶段，疫情向日韩、欧美地区扩散，通过需求下降和中间品、原材料供给中断反向影响中国经济。假定美、欧、日、韩各行业对世界各国出口下降 50%，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内地对四个经济体的依赖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美、欧、韩和日，将分别导致中国内地 GDP 下降 0.948、0.687、0.527、0.456 个百分点。从中间品供应链中断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行业看，美国是运输设备、其他商业服务、公共管理及国防、建筑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欧盟是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其他商业服务、建筑业、机械设备，韩国是电子设备、运输设备、金属制品、化工和建筑业，日本与韩国较为相似，但机械制造业替代了化工行业。

表 2 美欧日韩各行业出口下降 50%对中国内地 GDP 的影响 单位：%

行业	美国	行业	欧盟	行业	韩国	行业	日本
总体	0.948	总体	0.687	总体	0.527	总体	0.456
运输设备	0.118	电子设备	0.067	电子设备	0.138	电子设备	0.062
其他商业服务	0.084	运输设备	0.061	运输设备	0.056	运输设备	0.053
公共管理国防	0.078	其他商业服务	0.059	金属制品	0.046	建筑业	0.049
建筑业	0.075	建筑业	0.057	化工行业	0.042	金属制品	0.042

续表 2

行业	美国	行业	欧盟	行业	韩国	行业	日本
卫生社会工作	0.050	机械设备	0.045	建筑业	0.042	机械制造	0.031
化工行业	0.046	金属制造	0.033	机械设备	0.029	电子设备	0.028
电子设备	0.045	批发业	0.029	石油加工	0.019	卫生社会工作	0.020
机械设备	0.041	化工行业	0.028	其他商业服务	0.015	汽车销售维修	0.016
邮政电信	0.039	其他社会服务	0.024	其他社会服务	0.014	公共管理国防	0.014
金属制造	0.037	食品业	0.023	电煤气水	0.013	石油加工	0.01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8 年 ADB-MRIO 测算而得。

（三）疫情重塑国际分工格局，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疫情重塑产业链分工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及其母国为保证经济、产业链安全和产能自主，防止对单个经济体的过度依赖和关键零部件中断，可能放弃过去以效率为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各国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布局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做法，更多考虑效率和安全的平衡以及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会成本作为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比如对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关键产业的回流以及从全球化回归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疫情强化已有的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产业链扩张步伐停滞甚至呈现阶段性收缩，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产业链分工方式和收益分配的内在风险，成为产业链收缩的加速器。此外，疫情进一步放大了中美矛盾。美国以规则霸权工具为基础，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应对经济竞争对手和保持技术优势。^① 在对华战略上，以贸易政策支持国家安全政策，加紧在科技领域和关键产业与中国脱钩，并迫使第三国至全球范围与中国脱钩。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更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医疗设备等行业供应链从中国迁出，采用多种方式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撤。

三、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评估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同步下降、价值链断裂、各国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分化和对

^①张茉楠：《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参考消息网，2020 年 7 月 2 日。

立，正在改变以要素资源跨国配置为特征的全球化发展基础，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对于疫情后全球化走向和趋势，目前有以下几个代表性观点：一是有限全球化。各国收回更多经济主权，经济从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回归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以商品和资本流动为特征的“有限全球化”。二是再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全球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的增加、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替代西方大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化“二元格局”演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外围国家组成的“三元格局”。三是慢全球化。随着商品、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摩擦加剧、全球投资增速放缓以及跨国公司与母国利益冲突增强，全球化趋势放缓，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内收缩。四是数字全球化。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将替代商品贸易和金融活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化体现为线上互联性的增强和线下要素流动的趋势。^①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优化配置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已经退潮。但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及融入全球经济分工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将继续支撑全球化的发展。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方力量相互博弈和权衡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也将在技术、市场、成本、竞争和政府等多方因素的权衡下，寻找新的稳态。一方面，市场、技术和成本因素将继续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从市场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市场不断壮大，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围绕终端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从技术和成本看，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进一步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从政府和政策看，安全导向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影响显著增加。疫情冲击一方面加速了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的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和本土化重构趋势，另一方面促使跨国公司在产业链布局上开始实施多元化和集聚化战略。

（一）终端市场需求驱动的产业区域集聚

全球需求的地理格局变化是重塑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吸引跨国公司围绕终端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根据麦肯锡报告，^② 金融危机之前，发达经济体是全球化的消费主体。1999—2007 年全球 74% 以上的消费来自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消费中的比重快速攀升。2017 年，全球 38% 的消费来自发展中经济体，

^① 严灏文：《下一阶段全球化初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网站，2020 年 9 月 11 日。

^②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2019 年 4 月。

较 2007 年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除中国外亚洲发展中地区 and 美洲发展中地区分别贡献 6 个、2 个和 2 个百分点。同时，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 2030 年中国、除中国外亚洲发展中地区以及欧洲发展中地区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 6 个、2 个和 2 个百分点，这必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围绕终端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

（二）技术和成本驱动的产业链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

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一方面，知识和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00—2016 年，全球价值链中研发和无形资产资本化支出占总营收比例从 5.4% 上升至 13.1%。所有类型价值链活动的知识密集度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制药和医疗设备、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占比最高（依次为 80.0%、36.4% 和 25.4%），且提升幅度最大（依次为 66.3 个、29.3 个和 17.4 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价值链创造活动向研发和设计等上游活动、营销和售后等下游活动转移，而制造环节的价值占比下降。

另一方面，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长期化的低利率环境，将使得制造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从技术视角来看，人工智能、3D 打印等新兴技术正在替代中低技能劳动力，改变工业生产方式。从政策环境看，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行的低利率政策使得资本相对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并促使产业链的数字化和资本化。未来，那些拥有较多高技能劳动力、较强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及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将在新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安全导向驱动的产业链多元化和集聚化

为了保证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强化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跨国公司在产业链布局上将实施多元化和集聚化战略。多元化可以分散风险，减少对单个经济体或少数国外供应商的依赖；集聚化可以通过产业链集群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

产业链多元化布局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和复杂价值链制造业。以日本汽车行业为例，其零部件对华依赖度很高，疫情在中国集中暴发期间，由于中国工厂停工和物流中断，日本国内企业因零部件短缺也被迫停工停产。2020 年 3 月 5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未来投资会议”上表示，“日本必须考虑让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和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回归日本国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尽量不要依赖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9 月 3 日，日本宣布扩大补贴计划，将印度、孟加拉国等地列为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目标国。

多元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机会，但是从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来看，中国内地、韩国、墨西哥、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少数东欧国家是产业链布局的主要候选地。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基于安全考虑，会加快完善国内或区域的产业链条，甚至可能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但中国内地作为新技术发展的重地，具有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庞大的市场容量，在长期内仍然能够在新的全球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产业集聚主要集中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各经济体为保证经济安全，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倾向于建设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同时，市场规模巨大的产业链集群，可以增强经济体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四）多重因素驱动的制造业产业链区域化、服务业产业链全球化

未来，在技术、政府、市场和成本驱动下，制造业产业链尤其是汽车、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等效率驱动价值链型的区域属性将进一步增强，而服务业的全球属性将进一步强化。

对于纺织、服装、玩具、鞋履和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基于劳动力成本的套利空间进一步缩小，或将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向最终消费市场或者母国所在区域收缩。对于化工、汽车、计算机、电子以及机械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人力资本、技术和政府是驱动跨国公司向区域内布局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其中自动化技术扩大了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的选址空间，生产链条长、供应商数目多、生产过程紧密、对外部冲击敏感的特征促使跨国公司为达到准时生产（JIT）要求、降低社会成本和协调，对供应商进行备份，同时将部分产能布局于国内或区域内，而政府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也迫使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回归国内。对于金属制品、橡胶和塑料、纸张和印刷、食品和饮料等行业，由于产品的重量、体积及易腐性等特征，区域特征本身就比较显著，约 2/3 以上作为中间品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链，尤其是区域产业链中。而对于农业、采矿、基础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链，自然资源和运输便利性依然是选址主要决定因素，更多遵循本地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不同于部分制造业，受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将实现进一步全球化，产业分工更加细化，服务外包更加普遍。

为应对全球产业链发展新趋势，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在国际循环上，要加快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从区位选择来看，中国产业链布局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东亚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次，在国内循环上，要打破省区间市场壁垒，盘活国内资源，充分利用东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链的梯度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后，对于关键技术、零部件和原材料，政府要加大财政、制度等各方面支持力度，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避免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

参考文献：

1. 东艳、马盈盈：《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 黄奇帆：《全球产业链重构之下，中国的机会和挑战》，《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7期。
3. 蒋小荣、杨永春、汪胜兰：《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
4. 宋泓：《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招商周刊》2004年第26期。
5. 杨盼盼：《美国制造业回流：怎样回流？效果如何？》，《中国外汇》2020年第12期。
6. 姚曦：《中国对外开放40年的总体收益》，《中国对外开放40年》（张宇燕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
7.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8. Ganne, Emmanuelle, and Lundquist Kathry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he Digital Economy, GVCs and SMEs, The World Bank, 2019.
9. Inomata, Satoshi, and Taglioni Daria.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iffus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China, The World Bank, 2019.
10. Kinkel, Steffen., A. Jager, and Christoph Zanker. The Effects of Robot Use in Europea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n Production Off – shoring outside the EU, June. 22nd International Annual EurOMA Conference, At Neuchâtel, Switzerland, 2015.

责任编辑：谷 岳

中等强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对象

丁 工

摘要：近几年，“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迅速，已成为凝聚多方共识、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创新合作模式。考虑到“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倡导和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显然不适宜“大水漫灌式”的平均用力。因此，为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多方共赢，中国同相关各方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探索以中等强国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点对象。通过发挥中等强国的独特作用和相对优势，将中等强国打造成“五通”布局和区域合作的支点，以此既能减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恶性摩擦和同质竞争，还可以增强和优化“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资源和运作效率。

关键词：第三方市场 一带一路 中等强国 区域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丁 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9 年 3 月发布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讲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时，明确指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是“第三方市场合作”内容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① 2019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

^①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国政府网，2019 年 3 月 5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7101.htm。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也指出，“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①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倾向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还初见成效。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已经加入或者有意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有 120 多个左右，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简单按照“第三方市场”的模式展开合作，无法达到推进资源整合、优化要素配置的最优效果。因此，中国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应该按照从大局上谋划、在关键处落子的策略，通过以中等强国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对象，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大水漫灌式”的均匀用力，向“精准滴灌式”的集中发力转换，进而实现由“攻点”入手到“带面”为止的目标。

一、中等强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支点

所谓中等强国意指类似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世界阶梯体系的中间阶级，具备对资源运用和事态进程相当强度的驾驭把控能力，是仅次于世界主要大国最具力量和影响的二等强权国家。^② 即中等强国至少应当符合下列一个条件：（1）综合国力发展态势良好，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具备一定的议事权和发言权；（2）整合所在区域内各国高端资源、发展要素和集体安全的综合协调能力较强，能够为周邻国家提供地区合作所需的公共物品，具备引领、辐射和集散区域次区域合作的驱动功能；（3）拥有相当可观的物质条件和财富基础，具有一定的国土面积、相当数量的人口规模，或者是某个领域里的单项大国等。参照前述定义，目前有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墨西哥、波兰、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约十多个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序列。由此可见，中等强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新兴经济体（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也有发达国家（波兰、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和油气出口高收入国家（沙特阿拉伯），并且各国基本都有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强项，有的是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有的则是在劳动、资

^①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9 年 4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6/c_1124420187.htm。

^② Bruce Gilley, The Rise of the Middle Pow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12.

源、市场领域。此外，七国集团（G7）中的意大利、加拿大和金砖国家（BRICS）中的南非等分别具有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色彩，但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对外战略的角度考虑，上述国家相应也可以归入中等强国序列之中。

自 21 世纪以来，中等强国依托国际格局东起西落、南升北降的有利时机，借助全球主要战略力量分化改组的发展态势，积极参与编设海洋、极地、外空、网络、核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公域的法规条例，在制度安排和机构配署上的国际话语权和综合影响力不断提高。在地区事务上，随着中等强国对外行为愈发活跃和自身利益的日渐显现，中等强国已然成为推动从次区域到跨区域的各种机制和格局进行改组、整合的关键力量族群之一。比如，韩国不断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事业，积极促成建立“中等强国集团”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土耳其、埃及、伊朗和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的中等强国，对中东变局之后区域国际关系重组和地区秩序重构的意义愈发突显。尼日利亚在推动西非区域化和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发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中，发挥着“领头雁”和“发动机”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内，中等强国第一次集体性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场地中央，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发展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和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且，在 G20 机制内与传统势力（G7）和新兴群体（BRICS）构成三足鼎立、比肩并列的格局，推动中等强国的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在此环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和借用中等强国持续增强的势能冲量，发掘同中等强国合作的潜在优势和独特角度，来扩大自身外交活动的转圜空间和战略纵深。因而，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时，中国也应该考虑发挥中等强国的优势和特色，以增强和提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精准度和成功率。综合来说，将中等强国作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战略支点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发挥中等强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传统渠道和特殊角色作用。中等强国在不少“一带一路”国家有殖民统治和委托管理时代的历史渊源，对“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所在国人脉丰富、了解甚深。这种先天优势决定中等强国对投资原殖民地或者托管地的优势感和熟悉感较强，当地政府和民众对原宗主国的认可度及接受度相对较高。相比而言，中国大规模“走出去”时间不长，属于对外合作和国际开发领域的“新手”，需要理性客观地认识自身国际化经验的不足。而汲取一些中等强国对外开发、参与国际项目竞争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借鉴，利用中等强国与对象国已有的合作关系开拓市场，采取“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方式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起到规避风险、降

低成本的作用。事实上，中国与中等强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乏成功先例。

例如，由于历史上许多拉美国家曾为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双方民众文化相通、语言相同，具有天然的认知首位度和亲切感，彼此往来密切。拉美是西班牙的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西班牙企业拥有丰富的设备供货、现场施工和管理经验。同时，大量拉美国家的劳工也去西班牙国内就业，西班牙和拉美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民间团体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联系。数据显示，西班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投资国，2017年西班牙同拉美贸易额共计323亿欧元。2018年上半年，西班牙与墨西哥贸易额同比增长21%，与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三国贸易额同比增幅均超过25%。2005—2017年之间，拉美加勒比地区外商投资41%来自欧洲国家，其中就有29%的投资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长期对前“西属美洲”深耕厚植，既使本国企业熟悉拉美政策法规和风土人情，也让拉美国家倾向于认同和接受西班牙的行业标准与行为方式，部分西属拉美国家还以西班牙作为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学习榜样，为双方深化互利合作创造了先决条件。基于此种考虑，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西班牙普恩特斯集团以联营体的模式，合作建设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赛博医院项目；^① 西班牙电信集团使用中国华为的技术在巴西、墨西哥、智利开展业务，双方充分利用各自在云服务、标准化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共同推动“开放云服务”率先在拉美国家完成部署安装和投产调试工作。上述项目不仅成为当地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样板工程，也成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示范工程。

第二，联合中等强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减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恶性摩擦和同质竞争。尽管中国多次重申“一带一路”建设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集团阵营对抗，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始终将促进、带动沿线国和相关国经济的紧密结合为目标导向，但仍有少数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忧虑、设置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及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由于中等强国普遍具有较高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与中国的投资地域高度重叠，导致中国与部分国家形成恶性竞争关系。比如，由于澳大利亚近年财政状况恶化，国际发展和对外援助金额被大幅削减，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大不如前。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强劲增长，让习惯于将南太地区视为自家后院的澳大利亚滋生嫉妒和疑虑，甚

^① 邱海峰：《在“一带一路”见证‘1+1+1>3’》，《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9日。

至不断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开展的正常交往合作采取“污名化”“妖魔化”举动。可见，尽管中国与世界各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寻求私利，也不干涉内政，但如何在同相关国家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中寻求平衡仍是困扰“一带一路”建设的难题。因此，通过联合中等强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发挥中等强国在推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合作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独特作用，这样既能够避免“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成为媒体跟风热炒的话题和谈资，也有利于中国在同地区其他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中减少摩擦和避免不必要的争端，达到变摩擦力为驱动力、化阻力为推力的效果，形成和谐依存关系，实现从对手到伙伴的转变。

第三，依托中等强国进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动力充溢、意愿强烈、基础厚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全球平衡与包容增长，既不搞零和博弈和政治输出，也从未想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更没有计划和打算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可是即便如此，“一带一路”依然引起一些大国的怀疑和猜忌，甚至被部分西方大国解读为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并要借此扩大全球影响、颠覆现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随着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势打破了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成功打压日本后的“优越感”，中美综合国力日益接近等量齐观，诱发美国的焦虑感和失落感与日俱增，而美国对任何危及其霸权地位的势力进行打压已经成为二战后颠扑不破的规律。相比之下，中等强国既不像俄罗斯那样同西方构成直接的地缘利益冲突，也不同发展中大国印度与中国存有“龙象”情结，更不会遵循美国自加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逻辑来研判“一带一路”倡议的本意初衷。总体而言，中等强国对共建“一带一路”认可程度较高、猜疑顾忌较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者和热情参与者，基本上都表达过将本国宏观发展规划同“一带一路”宏伟蓝图有效衔接的想法。

2017 年 5 月和 2019 年 4 月，中国两次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先后有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应邀出席圆桌峰会，其中就包括土耳其、西班牙、埃及、波兰、阿根廷、意大利、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多个中等强国的领导人，意大利、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3 国领导人甚至连续两届来华参会。西班牙是最早成立“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工作组的国家，土耳其总统曾多次表示愿同中方加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计划的对接，巴基斯坦政府始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共赢的国际合作模式，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带来新的机遇。韩国无论是朴槿惠执政时期积极推销的“欧亚倡议”，还是文在寅总统提出意在进行半岛及周边经济功能远期规

划的“新亚洲”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构想，都着重强调要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接。综合分析可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等强国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前提条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地缘竞争、大国博弈因素的制约和束缚。

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等强国开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具体措施

为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升合作质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等强国开展“第三方合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以中等强国为“五通”建设的重点，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当今世界竞争博弈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流通能力上，国家战略利益也越来越集中在现代流通能力上，流通规则、流通秩序、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组织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世界合作的成本效率。建设“一带一路”的主线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的互联互通，即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因此，以中等强国为“五通”建设的重点，必然是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核心方向。

一是在政策沟通方面，把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指南针”。由于不同国家经济、社会、法律、环保、劳工等制度和政策各不相同，往往给“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经营效益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中等强国在属地区域内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地区国家参与国际协调。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以中等强国为发展战略对接和产业政策沟通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先导区和主阵地，联合相关中等强国对特定“第三方市场”的产业需求进行前期调研与后期研究、评估，共同协商制定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规划和措施，能够有效减少“第三方市场”合作时的协调成本和管理难度。譬如，韩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进行投资的起步时间较早、经验丰富，尤其在东南亚地区早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时期推行以东南亚国家为重点的出口导向政策，韩国的建筑工程企业便随军队在越南承揽美军和当地的建设工程，迄今已经深耕和开拓东南亚市场数十年，具有相对成

熟完善的项目执行、技术指导和应对措施方案。韩国在对外经济合作时沿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演变，其发展历程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韩国较为成功的对外经济战略，对中国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因此，中国在东盟地区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可以联合韩国开展对象国市场研究和前期论证，通过对在此之前韩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项目、机制等进行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借助韩国先前培育的营销网络与合作渠道，聚焦项目落地、政策对接和机制建设，共同建立健全“第三方”重点国别项目信息库和企业库。事实上，近期中韩双方力推的发展倡议具备了实现对接的坚实基础。从理念上来看，文在寅政府的“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合作包容、促进地区和平繁荣的理念相通；从地域上来看，“新北方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南方政策”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度重合；从内容上来看，中韩双方都强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优先事项和重点方向。

二是在设施联通方面，把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着力点”。设施联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领域。由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通常是在地理上相互毗邻、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之间首先形成，互联互通本身自然成为保障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的一种前提。总体上看，中等强国基本上扼守着地缘战略要地和关键运输通道，具有别国无法替代的独特区位优势。比如说，波兰地处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也是“琥珀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伊朗位于亚洲东西交通要冲，占据的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石油运输的枢纽；沙特阿拉伯自古便为东方经西亚到达北非的“十字路口”，是中东国家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联系的重要中转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以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互联互通建设的集散地、枢纽港，在中等强国设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仓储物流基地和物质转运分拨中心，能够实现铁路、公路、隧道、桥梁、电网、物流园区、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联通的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佳成本效益。

三是在贸易畅通方面，把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助推器”。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创新和就业的重要引擎。中等强国大多具有较强的产业聚集、区域辐射实力，基本上维持着一套相对成熟、多点联动的区域贸易网络，并且中国和大多数中等强国互为对方在各自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以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贸易合作的“助推器”，通过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简化海关手续，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有利于削减地区贸易环节的制度性成

本，提升同“第三国”进行贸易投资合作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鼓励中国和中等强国相关单位建立合资企业，以产业技术链和物流链为纽带，联合在“第三方”国家开展跨国并购和相互投资，形成中外三方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相互镶嵌、相互融合的格局。

四是在资金融通方面，把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润滑剂”。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资金融通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在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方面承担着独特的支撑角色。从现实情况看，资金融通合作既需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和资本金约束，也需要充分考虑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承受能力。一般来说，中等强国相比大多数中小国家具有相对雄厚的资金储备和稳定的货币信用体系，能够提供一定的商贸航运保险、多边结算和债券发行等区域性金融服务。支持和鼓励中国金融单位拓展“第三方市场”时，以中等强国为优先对象设立业务分支机构，扩大本币互换规模，促进人民币在中等强国周边地域的推广与使用，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从而有益于拓宽“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渠道，降低联合融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破解基础设施建设中持续存在的资金缺口难题。例如，南非是非洲地区的金融强国，国内多家银行在非洲拥有成熟广泛的分支机构和业务网点体系。中国和南非在本币融资和互设金融机构等领域合作，不仅能够为两国企业资金融通提供信用保障和政策支持，还可以为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开展金融业务合作积累先行先试经验。2015年7月，中国和南非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建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区域清算安排。2018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借助收购南非标准银行，成功进军非洲当地市场，迅速将客户服务能力有效拓展至非洲20多个“第三方”国家，为中国企业顺利在南非以及非洲其他国家开展业务、促进中非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①

五是在民心相通方面，把中等强国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压舱石”。推进以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互鉴共赏和互益共荣，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及人民相互了解和彼此友谊。中等强国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一般具有较强的文化聚合力和舆论公信力，对一定地域范围的国家能够产生示范带头和表率引领

^①佚名：《架起资金融通的“彩虹桥”——中国南非金融合作成果综述》，《人民日报》2018年7月17日。

作用。并且，中等强国也大多善于运用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以发挥巧实力和软实力的方式，在区域内和国际社会中承担强于小国弱于大国的特殊角色，来弥补自身在传统外交谈判中某些方面的短板和缺失。以中等强国作为在新闻出版、教材、文凭认证等公共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力军”，能够在“第三国”提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包括“第三方”在内其他合作伙伴的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中国和中等强国可以探讨在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行政培训和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支持。比如，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合作委员会龙头，与海湾地区多个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在种族、政体、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存在高度近似性和趋同性。中国通过沙特进行新闻出版、影视作品、图书翻译的联合制作，针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开展更多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教育、文艺及宗教交流，提升中国在“第三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深植和拓展中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积极正面的民心公意。

（二）借助中等强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独特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虽然与大国相比，中等强国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能力上存在些许差距，但在区域合作层面中等强国却是具备轻易搞定或独立完成特定事务的能力，能够发挥区域中心国家的协调竞争关系、联合科技创新、推动信息交流的能动作用。并且，随着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中等强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拥有相对更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减少配套生产成本和制造质优价廉的商品。作为区域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中枢，中等强国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拓展地区国家同域外合作的能力出众，除了关注自身功能地位的提升以外，还可以起到加强与周边区域国家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作用，时常扮演着区域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以及地区多边合作科教、文化、经贸和创新中心的角色。因此，鉴于中等强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首位度高、集聚力和辐射力强的特点，可以考虑以中等强国作为开展区域三方合作的协调中心，打造中国与中等强国联手开发区域“第三国”的雁阵阶梯格局，形成中国（发起人）—中等强国（合作方）—中小国家（东道国）多层级的区域性、网络化合作集群，既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循环的速度和质量，又有益于促进区域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资源的高效配置，也更深刻地切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诉求，从而能够构建起多层次和复合型的区域

经济合作架构，加速实现 $1+1+1>3$ 的效果。

例如，从全球角度来说，澳大利亚对外经贸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所占比重无足轻重，但对整个南太平洋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如果以澳大利亚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区域“支点”，依照单向带动、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的合作路径，充分发挥澳大利亚对周邻区域和国家的辐射、带动、牵引作用，既有利于盘活既有区域合作资源和加速区域经济合作要素的跨境流通，还有助于减少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同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三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戒心和疑虑。事实上，当前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探索协调处理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2+1”模式，就是希望充分发掘三方合作形式的发展潜力，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找到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多方共赢的方式，打通区域国家协调发展的经脉，推进亚太地区合作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相融相长、耦合共生，最终实现 $1+1$ 大于 2 或者 $1+1+1$ 等于 N 的效果。再比如，沙特是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核心国家，与海湾地区多个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在种族、政体、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存在高度近似性和趋同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国际合作政策能够起到“晴雨表”和“风向标”的作用。因此，在海湾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充分发挥沙特在区域、次区域合作中所具有的较强权力调动和资源配置能力，以沙特为突出重点、率先突破的地区合作“支点”，将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基础设施建设、油气向低碳能源转换上的投资与合作模式，应用推广到与其同样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之中，可以增进中国同海湾地区各国的政策协同效应，还能够减少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因经历熟悉、磨合、适应的过程，而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机会风险成本。

参考文献：

1. 张宇燕：《坚持“五个并重”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导刊》2019年第4期。
2. 丁工：《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期。
3. 仇发华、杜忠原、周正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局限因素》，《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4. 刘中民、赵跃晨：《从相对疏离到权力竞逐——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
5. 肖宏宇：《西非区域化的发展与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
6. 邹运、于新宇：《从西班牙对外贸易投资看中西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工程与劳务》2018年第11期。
7. 杨虹：《第三方市场开启“中西合璧”深度合作》，《中国经济导报》2017年12月27日。

8. 朴光姬、李芳、王立鹤：《历史演进视角下特朗普政府东北亚政策研究》，《全球化》2020 年第 1 期。
9. 陈文玲：《“一带一路”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全球化》2019 年第 12 期。
10. 宋效峰：《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 年第 2 期。
11. 刘洪钟：《韩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历史演变与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 年第 15 期。
12. 董向荣：《韩国文在寅政府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18 年第 7 期。
13. 李向阳：《“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出路》，《国际贸易》2017 年第 4 期。
14. 胡晓炼：《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9 年第 8 期。
15. 韩德睿：《韩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环境、目标和对象》，《战略决策研究》2019 年第 1 期。
16. 丁工：《中澳摩擦原因何在，中国又该怎么办？》，《中国对外贸易》2018 年第 4 期。
17. Bruce Gilley. The Rise of the Middle Pow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12.
18. Colin Bradford. Seven new laws for the g20 Era, *Foreign Policy*, May 29, 2011.
19. Kirsty Needham. Australia is wrong, we are friends to the Pacific says Chin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9, 2018.
20. Michael Fullilove. Australia must shed self - doubt over its place in the new asia, *The Australians*, May 9, 2018.

责任编辑：谷 岳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 年 1 月)				
世 界	2.8	-3.5	5.5	4.2
发达国家	1.6	-4.9	4.3	3.1
美 国	2.2	-3.4	5.1	2.5
欧元区	1.3	-7.2	4.2	3.6
日 本	0.7	-5.1	3.1	2.4
发展中国家	3.6	-2.4	6.3	5.0
印 度	4.2	-8.0	11.5	6.8
俄罗斯	1.3	-3.6	3.0	3.9
巴 西	1.1	-4.5	3.6	2.6
世界银行(WB,2021 年 1 月)				
世 界	2.3	-4.3	4.0	3.8
发达国家	1.6	-5.4	3.3	3.5
发展中国家	3.6	-2.6	5.0	4.2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1 年 2 月)				
世 界	2.5	-3.8	5.0	4.0
美 国	2.2	-3.5	4.7	3.6
欧元区	1.3	-6.8	4.4	4.1
日 本	0.7	-5.1	2.3	2.3
印 度	4.2	-7.5	11.1	6.2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世 界	1.0	-9.6	8.1	6.3
发达国家	1.4	-10.1	7.5	6.1
发展中国家	0.3	-8.9	9.2	6.7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1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估计值	2021 年 预测值	2022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 年 1 月)				
世 界				
发达国家	1.4	0.7	1.3	1.5
发展中国家	5.1	5.0	4.2	4.2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1 年 2 月)				
世 界	2.7	2.1	2.5	2.6
美 国	1.8	1.3	2.3	2.2
欧元区	1.2	0.3	1.2	1.2
日 本	0.5	0.0	-0.2	0.4
印 度	4.8	6.3	4.7	5.1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0 年		1.7	0.5	2.6
	1 月	2.0	1.5	2.8
	2 月	2.1	1.2	2.6
	3 月	2.0	0.8	2.7
	4 月	1.7	0.1	2.5
	5 月	1.3	0.0	2.2
	6 月	1.6	0.3	2.4
	7 月	1.7	0.4	2.7
	8 月	1.6	0.2	2.5
	9 月	1.6	0.1	2.6
	10 月	1.6	0.1	2.6
	11 月	1.5	0.2	2.6
	12 月	1.2	0.1	2.5
2021 年				
	1 月	1.6	0.4	2.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0 年		-3.9	-7.2	-0.9			
	1 月	-4.1	-1.2	-6.8	50.4	50.8	50.8
	2 月	-3.5	-1.2	-6.1	47.1	43.5	45.2
	3 月	-5.2	-7.0	-2.9	47.3	45.0	43.3
	4 月	-14.5	-19.2	-8.8	39.6	32.5	31.5
	5 月	-12.1	-18.0	-5.5	42.4	39.1	36.4
	6 月	-6.4	-11.8	0.1	47.9	47.3	46.8
	7 月	-2.9	-7.7	1.3	50.6	52.0	51.2
	8 月	-1.7	-6.3	2.8	51.8	53.6	52.8
	9 月	-0.6	-5.7	4.5	52.4	53.7	53.8
	10 月	0.6	-3.5	4.9	53.0	54.3	54.9
	11 月	1.2	-2.7	5.3	53.8	55.3	55.1
	12 月	2.3	-2.0	6.3	53.8	54.9	54.4
2021 年							
	1 月				53.5	54.0	54.1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8 年		3.0	2.7	1.8
	4 季度	1.3	1.6	-0.9
2019 年		2.2	2.4	2.3
	1 季度	2.9	1.8	2.5
	2 季度	1.5	3.7	5.0
	3 季度	2.6	2.7	2.1
2020 年	4 季度	2.4	1.6	2.4
		-3.5	-3.9	1.1
	1 季度	-5.0	-6.9	1.3
	2 季度	-31.4	-33.2	2.5
	3 季度	33.4	41.0	-4.8
	4 季度	4.1	2.4	-1.1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5.2	3.0	4.1
	4 季度	2.6	2.8	4.1
2019 年		1.9	-0.1	1.1
	1 季度	2.9	1.8	-2.1
	2 季度	-0.4	-4.5	1.7
	3 季度	2.4	0.8	0.5
2020 年	4 季度	1.0	3.4	-7.5
		-1.8	-13.0	-9.3
	1 季度	-1.4	-9.5	-15.0
	2 季度	-29.2	-64.4	-54.1
	3 季度	31.3	59.6	93.1
	4 季度	19.1	21.8	29.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8 年		3.0	2.7	1.8
	4 季度	2.5	2.4	1.5
2019 年		2.2	2.4	2.3
	1 季度	2.3	2.3	1.7
	2 季度	2.0	2.4	2.3
	3 季度	2.1	2.5	2.2
2020 年	4 季度	2.3	2.5	3.0
		-3.5	-3.9	1.1
	1 季度	0.3	0.2	2.7
	2 季度	-9.0	-10.2	2.1
	3 季度	-2.8	-2.8	0.3
	4 季度	-2.4	-2.6	-0.6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8 年		5.2	3.0	4.1	2020 年	21264		-13.0	27716		-9.3	-6452
	4 季度	4.0	0.5	3.0	1 月	2091	-1.2	-0.6	2531	-1.6	-2.4	-440
2019 年		1.9	-0.1	1.1	2 月	2094	0.2	-0.7	2471	-2.4	-4.3	-377
	1 季度	2.7	0.3	2.4	3 月	1864	-11.0	-12.5	2332	-5.6	-11.0	-467
	2 季度	1.5	-1.3	2.9	4 月	1489	-20.1	-28.9	2014	-13.6	-22.1	-525
	3 季度	1.9	0.2	1.0	5 月	1438	-3.4	-32.4	2000	-0.7	-24.3	-562
	4 季度	1.5	0.4	-1.9	6 月	1574	9.5	-24.8	2093	4.6	-19.8	-519
2020 年		-1.8	-13.0	-9.3	7 月	1699	7.9	-19.3	2319	10.8	-11.3	-621
	1 季度	0.4	-2.6	-5.3	8 月	1737	2.2	-17.5	2392	3.2	-8.5	-656
	2 季度	-7.8	-23.9	-22.4	9 月	1778	2.4	-15.0	2406	0.6	-6.4	-627
	3 季度	-1.9	-14.6	-8.6	10 月	1818	2.2	-13.6	2456	2.1	-3.1	-638
	4 季度	2.2	-11.0	-0.6	11 月	1838	1.1	-12.7	2528	2.9	0.5	-690
					12 月	1900	3.4	-10.2	2566	1.5	-0.2	-66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0 劳动力市场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20 年		2.6		8.1	-933.7	2018 年		2234	-1944	4178		
	1 月			3.5	31.5		3 季度	1106	503	603		
	2 月			3.5	28.9		4 季度	730	-707	1437		
	3 月	-0.3	0.9	4.4	-168.3	2019 年		2614	936	1678		
	4 月			14.8	-2067.9		1 季度	768	-333	1101		
	5 月			13.3	283.3		2 季度	680	889	-209		
	6 月	10.6	2.9	11.1	484.6		3 季度	486	-28	514		
	7 月			10.2	172.6		4 季度	681	408	273		
	8 月			8.4	158.3	2020 年						
	9 月	5.1	4.2	7.8	71.6		1 季度	388	-78	466		
	10 月			6.9	68.0		2 季度	205	675	-470		
	11 月			6.7	26.4		3 季度	410	416	-6		
	12 月	-4.8	2.5	6.7	-22.7							
2021 年												
	1 月			6.3	3.9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8 年		1.9	1.5	1.2
	4 季度	0.5	0.4	0.4
2019 年		1.3	1.3	1.9
	1 季度	0.5	0.6	0.6
	2 季度	0.2	0.2	0.4
	3 季度	0.2	0.3	0.6
	4 季度	0.1	0.1	0.3
2020 年		-6.8		
	1 季度	-3.7	-4.5	-0.6
	2 季度	-11.7	-12.4	-2.2
	3 季度	12.4	13.9	4.8
	4 季度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3 季度	0.5	0.1	0.9
	4 季度	4.7	1.0	2.7
2019 年		5.8	2.5	3.9
	1 季度	-2.1	1.1	-0.8
	2 季度	6.8	0.0	3.3
	3 季度	-5.4	0.6	-2.2
	4 季度	6.2	0.0	2.2
2020 年				
	1 季度	-5.8	-3.8	-2.9
	2 季度	-15.9	-18.9	-18.2
	3 季度	13.6	16.8	12.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19 年			0.1	7.5	1226.8
	12 月	0.0	-0.1	7.4	1215.5
2020 年					
	1 月			7.3	1211.9
	2 月			7.2	1189.3
	3 月	-3.5	-3.3	7.4	1205.4
	4 月			7.3	1171.9
	5 月			7.6	1219.1
	6 月	-9.0	-12.1	7.9	1278.2
	7 月			8.6	1403.4
	8 月			8.6	1413.3
	9 月	11.3	-2.1	8.6	1404.6
	10 月			8.4	1384.9
	11 月			8.3	1361.6
	12 月	-1.0		8.3	1367.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8 年		1.9	1.5	1.2
	4 季度	1.2	1.1	1.0
2019 年		1.3	1.3	1.9
	1 季度	1.5	1.2	1.7
	2 季度	1.3	1.3	1.6
	3 季度	1.4	1.6	2.2
	4 季度	1.0	1.2	2.0
2020 年		-6.8		
	1 季度	-3.2	-3.9	0.8
	2 季度	-14.7	-16.0	-1.9
	3 季度	-4.3	-4.6	2.2
	4 季度	-5.0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3.2	3.6	3.7
	3 季度	3.4	3.1	4.0
	4 季度	7.4	2.0	4.9
2019 年		5.8	2.5	3.9
	1 季度	4.4	3.2	4.0
	2 季度	10.0	2.3	6.2
	3 季度	3.5	2.8	2.9
	4 季度	5.0	1.8	2.5
2020 年				
	1 季度	1.1	-3.1	0.3
	2 季度	-20.4	-21.5	-20.6
	3 季度	-4.3	-8.9	-8.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9 年	23477		2.8	21267		1.6	2210
	12 月	1975	1.3	1741	-0.8	1.3	234
2020 年							
	1 月	1970	-0.3	1780	2.2	-0.2	190
	2 月	1987	0.8	1730	-2.8	-1.7	256
	3 月	1829	-7.9	1563	-9.6	-10.2	266
	4 月	1355	-25.9	1355	-13.3	-25.4	0
	5 月	1479	9.1	1396	3.1	-26.6	82
	6 月	1637	10.7	1479	5.9	-12.2	157
	7 月	1729	5.7	1544	4.4	-14.4	186
	8 月	1760	1.8	1552	0.5	-13.4	208
	9 月	1824	3.7	1595	2.8	-6.9	229
	10 月	1860	1.9	1609	0.8	-11.6	251
	11 月	1894	1.9	1645	2.3	-4.4	249
	12 月	1916	1.1	1640	-0.3	-1.4	275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19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欧元					单位:%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2019 年		967	247	720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12 月	- 945	- 1605	660	2018 年		0. 6	0. 3
2020 年		1663	461	1202	4 季度		- 0. 2	0. 1
	1 月	- 56	25	- 81	2019 年		0. 3	- 0. 3
	2 月	- 75	187	- 262	1 季度		0. 3	- 0. 1
	3 月	- 467	- 543	75	2 季度		0. 6	0. 4
	4 月	287	- 53	340	3 季度		1. 3	0. 9
	5 月	1657	1309	348	4 季度		- 1. 1	- 2. 4
	6 月	- 208	- 439	231	2020 年		- 4. 8	- 5. 9
	7 月	399	641	- 242	1 季度		- 2. 0	- 2. 7
	8 月	- 75	164	- 239	2 季度		- 10. 3	- 11. 1
	9 月	- 483	- 413	- 70	3 季度		- 5. 8	- 7. 3
	10 月	- 47	132	- 179	4 季度		- 1. 2	- 2. 4
	11 月	1006	348	658				
	12 月	- 276	- 899	623				

注:(1)指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8 年		0. 6	0. 3	1. 0
4 季度		0. 5	0. 1	0. 8
2019 年		0. 3	- 0. 3	1. 9
1 季度		0. 6	- 0. 1	0. 4
2 季度		0. 1	0. 4	0. 6
3 季度		0. 2	0. 5	0. 8
4 季度		- 1. 8	- 3. 1	0. 4
2020 年		- 4. 8	- 5. 9	2. 7
1 季度		- 0. 6	- 0. 6	- 0. 3
2 季度		- 8. 3	- 8. 4	0. 2
3 季度		5. 3	5. 1	2. 8
4 季度		3. 0	2. 2	2. 0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 2	3. 8	3. 8
4 季度		2. 5	1. 8	4. 2
2019 年		0. 9	- 1. 4	- 0. 4
1 季度		0. 4	- 1. 6	- 3. 9
2 季度		0. 2	- 0. 1	1. 7
3 季度		0. 9	- 0. 5	0. 9
4 季度		- 3. 1	0. 2	- 3. 2
2020 年		- 4. 1	- 12. 3	- 6. 8
1 季度		0. 4	- 5. 3	- 3. 1
2 季度		- 3. 3	- 17. 2	1. 3
3 季度		- 2. 2	7. 4	- 8. 2
4 季度		3. 2	11. 1	4. 1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8 年		0. 2	3. 8	3. 8
4 季度		0. 2	1. 8	5. 1
2019 年		0. 9	- 1. 4	- 0. 4
1 季度		0. 5	- 1. 3	- 0. 4
2 季度		0. 5	- 2. 0	0. 7
3 季度		4. 4	- 0. 4	2. 9
4 季度		- 1. 6	- 2. 0	- 4. 5
2020 年		- 4. 1	- 12. 3	- 6. 8
1 季度		- 1. 6	- 6. 0	- 4. 0
2 季度		- 5. 3	- 22. 0	- 3. 9
3 季度		- 8. 0	- 15. 4	- 12. 9
4 季度		- 2. 0	- 6. 2	- 6. 2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9 年		- 1. 7	1. 60	2. 4
	12 月	- 3. 0	1. 57	2. 2
2020 年			1. 20	2. 8
	1 月	- 4. 7	1. 49	2. 4
	2 月	- 4. 6	1. 45	2. 4
	3 月	- 4. 8	1. 39	2. 5
	4 月	- 12. 8	1. 32	2. 6
	5 月	- 17. 7	1. 20	2. 9
	6 月	- 10. 4	1. 11	2. 8
	7 月	- 11. 0	1. 08	2. 9
	8 月	- 5. 4	1. 04	3. 0
	9 月	- 5. 8	1. 03	3. 0
	10 月	- 2. 3	1. 04	3. 1
	11 月	- 1. 0	1. 06	2. 9
	12 月		1. 06	2. 9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20 年	684066		-11.1	677369		-13.8	6697
1 月	58495	-5.3	-2.6	61449	-3.4	-3.6	-2954
2 月	60570	3.5	-1.0	56899	-7.4	-13.9	3670
3 月	58215	-3.9	-11.7	60611	6.5	-5.0	-2396
4 月	51980	-10.7	-21.9	61221	1.0	-7.1	-9241
5 月	49022	-5.7	-28.3	54254	-11.4	-26.1	-5232
6 月	50079	2.2	-26.2	53365	-1.6	-14.4	-3286
7 月	53385	6.6	-19.2	52057	-2.5	-22.3	1328
8 月	56459	5.8	-14.8	52742	1.3	-20.7	3717
9 月	59010	4.5	-4.9	54303	3.0	-17.4	4707
10 月	60645	2.8	-0.2	56158	3.4	-13.2	4487
11 月	60771	0.2	-4.2	54851	-2.3	-11.1	5920
12 月	60959	0.3	2.0	55836	1.8	-11.6	5123
2021 年							
1 月	63620	4.4	6.4	59692	6.9	-9.5	3928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9 年		39637	274951	-235314
	12 月	7679	29146	-21467
2020 年		73113	187753	-114640
	1 月	-2085	18020	-20105
	2 月	749	13447	-12698
	3 月	3599	23043	-19444
	4 月	-420	17346	-17766
	5 月	2985	13398	-10413
	6 月	48965	30920	18045
	7 月	-483	20268	-20751
	8 月	4045	9678	-5633
	9 月	6188	7753	-1565
	10 月	-1879	6655	-8534
	11 月	4038	8536	-4498
	12 月	7410	18687	-11277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2.4	1.3	0.8	1.8	6.1	2.5
	4 季度	2.3	1.2	1.1	1.7	5.6	2.7
2019 年		1.9	1.5	0.2	1.4	5.0	1.3
	1 季度	1.7	1.7	0.0	1.2	5.7	0.4
	2 季度	2.1	1.5	0.9	1.5	5.2	1.1
	3 季度	1.9	1.4	0.1	1.3	4.4	1.5
	4 季度	1.7	1.2	-0.5	1.6	4.1	2.1
2020 年		-9.9					-3.2
	1 季度	-0.3	-2.2	0.1	-0.3	3.1	1.6
	2 季度	-12.5	-21.0	-17.5	-10.9	-23.9	-8.0
	3 季度	-5.2	-8.7	-6.0	-3.9	-7.5	-3.4
	4 季度	-7.8					-3.1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8 年		2.7	2.1	2.9	2.8	7.1	5.2
	4 季度	3.1	1.3	1.1	2.1	7.3	5.2
2019 年		2.0	0.0	-1.2	2.9	7.0	5.0
	1 季度	1.8	1.4	0.7	1.9	6.8	5.1
	2 季度	2.1	-0.9	0.4	2.9	6.7	5.1
	3 季度	2.0	0.0	-2.8	3.3	7.3	5.0
	4 季度	2.3	-0.6	-3.0	3.7	6.8	5.0
2020 年		-1.0	-8.3	-6.2	3.1	2.8	-2.0
	1 季度	1.4	-1.4	-9.1	2.5	3.7	3.0
	2 季度	-2.7	-18.7	-9.0	0.4	0.4	-5.3
	3 季度	-1.1	-8.6	-3.6	4.3	2.7	-3.5
	4 季度	-1.4	-4.5	-3.0	5.1	4.5	-2.1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0 年		9.5	4.4	29.2		10.4	5.8
	1 月	5.5	3.9		11.2	7.2	4.7
	2 月	5.6	4.0		11.6	7.8	4.6
	3 月	7.8	4.0	30.1	12.2	8.8	4.7
	4 月	13.0	4.0		12.6	23.5	5.8
	5 月	13.7	4.1		12.9	21.7	6.1
	6 月	12.3	4.1	23.3	13.3	10.2	6.2
	7 月	10.9	4.3		13.8	7.4	6.3
	8 月	10.2	4.5		14.4	8.4	6.4
	9 月	9.0	4.8	30.8	14.6	6.7	6.3
	10 月	8.9	4.9		14.3	7.0	6.3
	11 月	8.5	5.0		14.1	6.5	6.1
	12 月	8.8	5.1	32.5		9.1	5.9
2021 年							
	1 月	9.4				6.5	5.8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20 年		4.0	4.4	5.5	3.9	2.5	6.0
	1 月	4.0	3.8	3.4	3.7		
	2 月	3.3	3.6	3.7	3.7		
	3 月	3.8	2.9	4.2	3.8	2.2	5.0
	4 月	3.8	4.7	5.2	4.1		
	5 月	4.5	4.2	5.9	4.2		
	6 月	4.3	5.5	6.2	4.0	2.7	
	7 月	4.2	5.4	6.1	3.9		
	8 月	3.2	5.2	6.1	3.8		
	9 月	3.9	5.1	6.4	3.8	2.5	7.1
	10 月	4.2	4.7	6.4	3.8		
	11 月	4.1	4.4	6.3	3.8		
	12 月	4.6	3.8	6.6	3.8	2.4	
2021 年							
	1 月	5.4		7.0			

注: (1) 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
(2) 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3) 越南为季度数据, 印尼为半年度数据。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3907	4137	-230	4033	6347	-2314
1 月	356.2	355.8	0.4	369.5	542.2	-172.7
2 月	335.3	345.4	-10.1	355.6	505.7	-150.1
3 月	345.3	361.7	-16.4	353.0	513.6	-160.6
4 月	231.3	264.2	-32.9	295.2	367.8	-72.6
5 月	243.8	252.3	-8.5	267.7	361.5	-93.7
6 月	303.3	328.2	-24.9	306.0	480.9	-174.9
7 月	320.7	354.2	-33.5	321.4	516.8	-195.4
8 月	329.7	363.2	-33.5	303.7	533.0	-229.3
9 月	352.8	375.1	-22.2	336.8	644.9	-308.2
10 月	361.1	391.5	-30.5	371.1	639.8	-268.7
11 月	356.2	375.9	-19.8	375.8	642.1	-266.3
12 月	371.2	369.6	1.6	377.6	598.8	-221.2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858	689	170	2128	1605	523
1 月	70.1	71.6	-1.5	145.4	161.8	-16.4
2 月	72.8	63.3	9.5	157.0	132.6	24.4
3 月	70.9	56.5	14.4	188.1	145.2	42.9
4 月	28.4	47.4	-19.0	183.1	116.1	67.0
5 月	56.0	47.2	8.7	179.4	149.7	29.7
6 月	67.7	40.6	27.1	179.1	104.5	74.6
7 月	73.1	50.8	22.3	196.0	115.0	81.0
8 月	75.4	52.9	22.5	177.4	111.3	66.1
9 月	80.9	61.0	19.9	184.6	123.0	61.6
10 月	90.6	68.7	21.9	178.6	123.8	54.7
11 月	88.8	65.5	23.3	175.3	138.0	37.3
12 月	83.8	63.0	20.8	183.7	184.1	-0.4
2021 年						
1 月				148.1	159.3	-11.3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2754	3685	-931	3313	2398	916
1 月	258.7	411.7	-153.0	305.6	171.3	134.4
2 月	277.3	378.8	-101.6	286.9	184.8	102.1
3 月	213.8	311.7	-97.9	299.9	204.7	95.2
4 月	102.7	171.2	-68.5	249.4	176.6	72.8
5 月	191.0	222.0	-31.0	209.8	173.0	36.8
6 月	219.1	211.1	7.9	245.1	191.6	53.5
7 月	236.4	284.7	-48.3	244.4	197.1	47.3
8 月	227.0	294.7	-67.7	231.9	199.5	32.3
9 月	275.8	303.1	-27.3	305.1	204.5	100.5
10 月	248.2	336.0	-87.8	282.3	217.9	64.4
11 月	235.2	333.9	-98.7	298.0	227.2	70.8
12 月	271.5	425.9	-154.4	355.0	249.5	105.6
2021 年						
1 月	274.5	419.9	-145.4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5129	4672	457	4177	3832	345
1 月	431.1	427.2	3.9	335.9	360.7	-24.8
2 月	409.2	370.0	39.2	365.9	337.2	28.7
3 月	462.0	418.0	44.1	383.4	350.1	33.4
4 月	363.0	379.3	-16.3	233.9	264.7	-30.9
5 月	348.4	346.5	2.0	180.7	215.9	-35.2
6 月	392.1	357.7	34.4	330.8	275.3	55.5
7 月	427.9	387.7	40.3	356.6	298.6	58.0
8 月	394.9	357.6	37.3	369.8	308.6	61.2
9 月	478.6	393.6	85.0	385.5	341.6	43.8
10 月	448.8	390.8	58.0	419.5	357.2	62.2
11 月	458.4	399.4	59.0	383.2	352.9	30.3
12 月	514.1	444.6	69.4	431.6	369.0	62.6
2021 年						
1 月	480.0	440.5	39.5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5488	5698	-210	3454	2866	588
1 月	366.0	405.2	-39.2	250.5	216.1	34.4
2 月	315.9	367.7	-51.9	253.8	220.8	33.0
3 月	445.3	482.0	-36.7	282.7	254.8	27.8
4 月	443.9	452.5	-8.6	252.4	229.7	22.7
5 月	460.7	443.9	16.8	270.0	222.8	47.2
6 月	426.9	457.8	-31.0	271.3	222.9	48.4
7 月	461.0	477.3	-16.3	282.0	228.3	53.7
8 月	495.6	482.6	13.0	311.7	247.1	64.7
9 月	545.7	518.2	27.5	307.1	235.8	71.4
10 月	472.5	504.0	-31.6	322.3	247.7	74.6
11 月	523.0	531.9	-8.9	319.9	267.2	52.7
12 月	531.5	574.5	-43.0	330.0	272.4	57.6
2021 年						
1 月				342.7	280.8	61.9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20 年	2706	2529	177	1631	1416	215
1 月	183.2	186.0	-2.8	136.3	142.7	-6.4
2 月	112.8	89.3	23.5	140.6	115.5	25.1
3 月	241.3	221.5	19.8	140.7	133.5	7.2
4 月	175.8	185.2	-9.4	121.6	125.4	-3.8
5 月	191.9	181.8	10.1	104.5	84.4	20.1
6 月	225.6	207.1	18.5	120.1	107.6	12.5
7 月	248.7	221.0	27.7	137.0	104.6	32.4
8 月	265.0	230.0	35.0	131.0	107.4	23.5
9 月	271.6	242.0	29.6	139.6	115.7	23.9
10 月	272.6	243.2	29.4	143.6	107.9	35.8
11 月	252.4	246.9	5.5	152.8	126.6	26.1
12 月	276.5	279.0	-2.5	165.4	144.4	21.0
2021 年						
1 月	285.5	264.6	20.9	153.0	133.4	19.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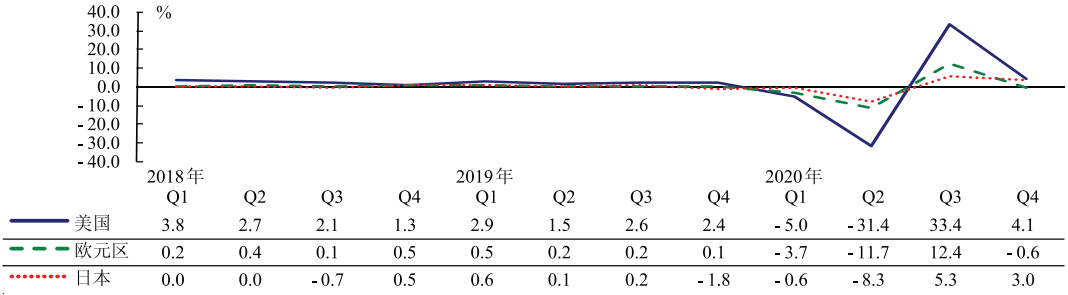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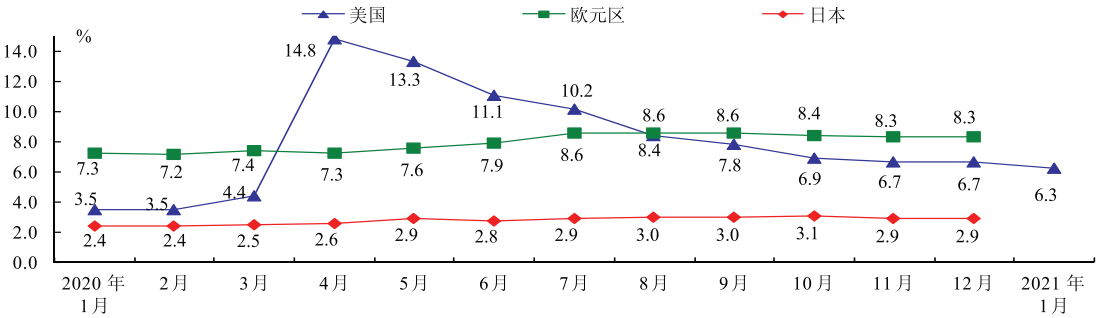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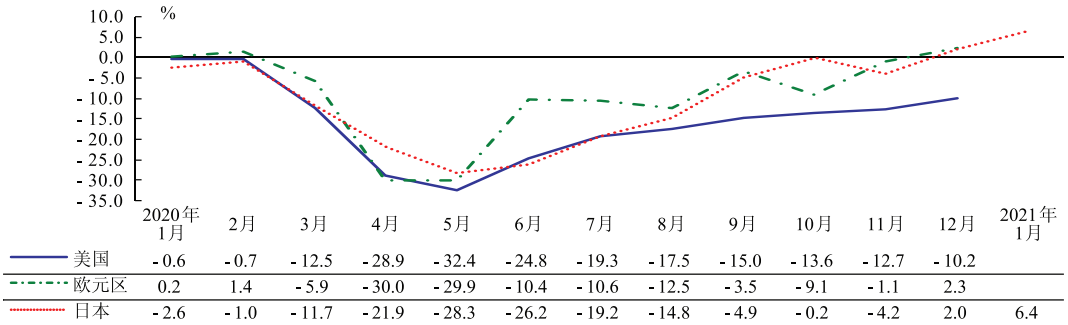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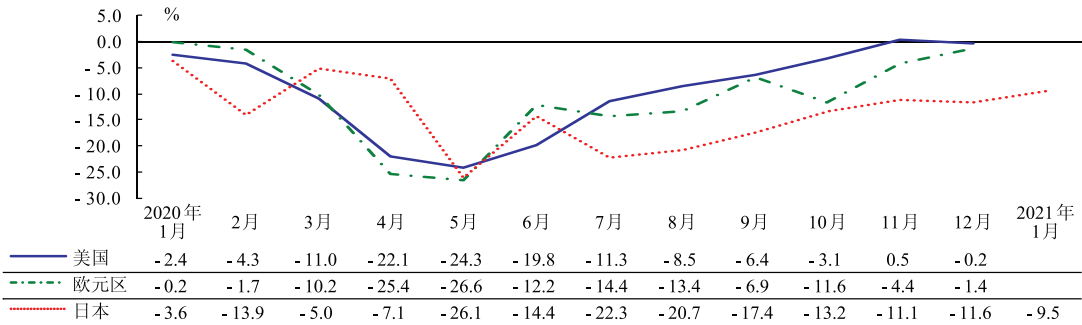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Abandon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Ideological Prejudice to Correctly Treat and Handle China-U. S. Relations

Zeng Peiyan

It is completely wrong to treat and handle China-US relations with the prejudice of Cold War viewing and ideology. Firstly,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systems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evitably move toward confrontation. Secondly,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have overturned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the “Thucydides Trap”. Thirdly, China is a participant and contributor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not a challenger and disruptor. Fourthly, China’s development brings opportunities rather than threats to the world.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restarting and improving the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olidate mutual trust through reshaping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deepen mutual trust through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so as to achieve non-conflict, non-confrontation,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ial Security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Chen Bingcai

The foreign-related financial security iss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security issues of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the security issues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ssets or foreign exchange assets, and the security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The external cause of China’s foreign-related financial security issues is that the domestic currency does not hav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a reserve currenc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reserve currency from outside, which is bound to lack security; The credit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lies on the endorsement of reserve currencies such as the U. S. dollar, and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once relied on the U. S. dollar surplus; The United States can use US dollar accounts to impose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restrictions, freezes and other sanctions on funds, asset transactions, cross-border payment settlements, etc., and even eliminate the account system. The internal reason is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uppress and sanction; I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has improperly handled on 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system,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the reserve currency funds are allowed to enter and exit completely without restriction, there is bound to be the possibility of a financial crisis; The im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has led to a lack of security in foreign-related finance. The resolution of foreign-related financial security issues should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ssets through currency swaps and diversified investments; the second is to establish a trading and payment settlement system by advocating sovereign currency pricing, payment, settlement, financ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ystem design; The third is to grasp the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the fourth is enhance the basi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3) Global Changes and Asian Economic &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Zhang Yansheng, Lu Xinhong, Liu Xiangdong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rising in the east and falling in the west is notable. The status of Asian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

constantly rising. Especially under the COVID-19, East Asian economies took the lead in recovering and have become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sia has always been a key area for China to manage its neighboring diplomacy. How to use this area well and actively create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a period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shape and develop global partnerships and deepen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 will help exert China's leadership as a major country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ied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global pandemic of the COVID-19,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y trends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e new ideas and new paths for A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win the China-US strategic gam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Asia. The free trade area strate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strategic commanding heights of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it is a general tren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free trade areas. Analyz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Asian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 will help take precautions, and have early plans for striving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major issues, it puts forward the urgent major issues and the new ideas of cooperation whi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hina can gain plans and suggestions.

(4)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Ni Hongfu, Fan Zijie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rad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possible comprehensiv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expor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export advantag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uffered relatively large negative impacts in the China-US trade frictions, China's export concentration rate has declined,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changed much; The total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ead to a decrease in the output shar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le the output share of primary industrie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has increased; Reduction in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output that is more severely impacted by tariffs, which will lead to a decrease in the output share of the related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ts strategic focus and strategic self-confidence, and actively use international rules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s, meanwhile, further deepen the supply-side reform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5) Korea's Regulatory Sandbox Mechanism: Policy Framework,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Enlightenments

Yin Zhentao, Fan Yunpeng, Fei Ya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e and digital economy,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made the fintech industry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The Regulatory Sandbox mechanism has formed a complete set of operating model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s consisting of process desig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ccess standards, evaluation mechanism,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xit standards.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also continuously improved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 Based on the Korean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mulate a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ulatory Sandbox, clarify the access system, evalu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exit mechanism and risk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foster the coordinated ecosystem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fintech industry.

(6)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Countermeasures Driven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Yu Chang, Deng Zhou

Under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has promoted the highlighting of innovative functions, enhanced value-added capabilities and upgrades of factor input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lative status. The use of new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is reconstruct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backflow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link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increas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caused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face more uncertain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limb to the middle-high level of the value chain. China should beware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spond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 up,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deepening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7) Th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General Trends and New Changes

Ma Yingying, Cui Xiaomin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eep adjustment. With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tide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the existing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structure has been greatly challenged, and it i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restructur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ve change of various countries' factor co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ls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Under the mutual game of multiple forces, the futur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will show four characteristics: (1) Regional agglomeration driven by market and final demand orientation; (2) Supplier diversification and key industry localization driven by safety orientation; (3) Gradient transfer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driven by cost and technology orientation; (4)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refined products of service industry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Middle Powers Are the Key Targets for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Ding Gong

In recent years,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cooperation model for building consensus among multiple parties and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 Considering that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 project, China's advocacy and promotion of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und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s obviously not suitable for the average effort of "wild flooding irrig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and achieve all-win situation for multiple parties, China and relevant parties are developing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medium-powered countries as the priority direction and key target of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By giving play to the unique rol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medium powers, the medium powers will be turned into the fulcrum of the "The Five-Connectivity Program" layou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vicious friction an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but also enhance and optimize the resources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Editor: Zhao Ze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2021 年重点选题包括：新形势下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研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化发展走势相关问题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美、中欧、CPTTP、RCEP）；数字经济的影响与发展对策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研究；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研究；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优化研究等。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合作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等合作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稿件要求如下：

1. 来稿具有学术性和创新性。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83366113